

综合类

清代北海事略

范翔宇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设置了“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后人多以为这是北海行政区域得名的由来，其实这是误会。因为，这个“北海镇标及城守营”不是设在今北海市区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设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内，清代的廉州府城。后因海防扩展，改设在今廉州镇乾江圩，时称乾体营。“镇”，是清代的军队编制单位，每镇兵力为一万二千余人。“镇”的长官是总兵官，也称“镇台”。“标”，是清代兵制，也是绿营兵的通称，因其由总兵官统率，故称“镇标”。由此可知，康熙元年的“北海镇标”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名称，而是一个设在廉州府城的军事单位。

康熙四年（1665年），清政府令廉州府沿海设置墩台，作边防警讯之用，北海冠头岭也列其中。北海边（海）防地位之重要不会因名称出现先后而被忽略。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经康熙帝朱批：“准澳门外国商船往南洋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但严禁外国船夹带中国人，及中国商人偷往外国贸易”（《清实录·圣祖》）。中国商船往安南，必经廉州湾沿线码头港口，这是“今北海港”商贸活动的早期记录。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政府在广东沿海建炮台116座，北海冠头岭炮台是其中之一（时属广东辖）。乾隆二年（1737年），广东粤海关在合浦设廉州口海关，兼辖山口、钦州两小口，后又增设高德（今北海高德镇）、西场、沙岗海关分卡。高德海关分卡是北海海关机构设置的早期记录。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政府“禁海”登峰造极，制订了严厉的“禁海”章程，其中有“将溇洲、斜阳二岛居住之无籍贫民逐回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烧毁”之条款，并“将渔船编号登记丁口，实行连环互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从军机大臣议：因溇洲岛飓风猛烈，难盖兵房，撤销岛上官兵驻防制，改由水师轮番巡查制，巡查范围扩至斜阳岛。

嘉庆元年（1796年）十一月，清廷将高、廉、雷、琼洋面列为巡防捕盗巡查

西路，涠洲岛设兵轮巡缉站。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南康圩（今属北海铁山港区）天地会陈公道聚众准备起事，不幸事泄被捕，后处斩。嘉庆十四年（1809年）为断绝海盗粮食来源，从雷州、廉州（北海）开往琼州的米船均配兵员押运，每船配兵七八名，以防海盗抢劫。

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道光皇帝批喻：因合浦南沥（今北海市区）外洋多有海盗船以涠洲岛为据点，着令廉州府与安南（今越南，时为清朝藩属）合力会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月，安南巨盗头目阮保等70多人在冠头岭外洋游弋窥伺时被生擒。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国辉格党内阁开会讨论侵华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史称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即由此起。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商人开辟了北海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运输航线。六年后，即咸丰元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建艚船航行于澳门、北海之间。这可以说是民间的“边贸”往来吧。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添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个口岸，准英国船于口岸停泊装卸货物。北海自此进入了多事之秋。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广东肇庆府土、客械斗，清廷派兵镇压，并将2万多名客民逐出散至高、雷、廉、琼等地，外国传教士趁机混在其中，进入涠洲岛。

同治六年（1867年），法国天主教父错士在涠洲岛建立教堂。同治九年，清政府在北海开设了森昌成信局，这是北海最早的邮政业。是年，发生了北海商民殴杀抽厘官沈茂兰事件。同治十年（1891年）九月二十日，广东北海海关成立，这是一个常关建制，归粤海关监督经理。北海海关成立，标志着北海区域行政功能日趋完善配套齐备，具有了多种城市管理职能。北海海关规定：“凡为外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在北海或广州报关”（《续通考》）。

北海海关成立之初，各种设施及制度尚未成熟，难免有监管疏漏之处。为此，廉州府衙门向朝廷建议，加强北海海关的职能及扩大监管范围。此一建议得到了同治帝的批准。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初七，同治帝在廉州府奏折上朱批：近年雷、廉各税收日绌，皆因北海地方无所稽查，易于绕避。嗣后以北海为总汇，

设关征税，如有进、出货，按大关税则往收。并于钦州、电白县水东、石城县暗铺、遂溪县赤坎、海康县雷州及吴川、石城、遂溪三县交界之石门头六处设立北海分卡稽征，亦按大关税则征收。又于钦州平良、长墩、防城三处设立“北海稽查子卡”（《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了《越法构和同盟条约》，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否定中国对越南拥有主权，越南脱离同中国的关系。北海由后方变成边（海）防前沿，令力行保甲、团练加强对越南沿边的防范。

从上述史籍辑录中可以看出，清同治年间是“北海”一词独立确认之始，首先是北海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北海海关成立及其监管区域的确定：西起防城，东至海康雷州都纳入了北海海关的征管范围。这时，北海方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城市。在北海的一些地方史志中，把北海口岸对外开放记述为光绪二年（1876年），这是把北海口岸对外开放混同海关成立的误记，北海口岸对外开放应是同治二年，时间后延了十三年。是把北海正式开埠及新关成立当作是口岸开放导致的差错。同治九年，北海发生了商民杀死抽厘官沈茂兰、捣毁税卡的事件。而在一些地方史料中又错记为同治八年。

光绪元年（1875年），北海市区内首家书院——香坪书院建立，该书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靖海区公立香坪学堂。光绪二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涠洲岛盛圻村建天主教堂。光绪三年二月，北海新关开办，二月十九日北海正式开埠。准口岸作为外国领事官驻扎处，在此之前，英国于正月初四在北海设立领事馆，七日设立海关税务司，委任李华达为税务司官员。同年，北海高广恒银号代理北海海关收税。后该银号倒闭，改由永安、兆康、陈有合、海记、慎裕等银号轮流代理收税，直至清末。是年，北海海关出口货值银元2470两，进口货值7900两，逆差5430两。此后，北海海关税收成为清朝廷的重要财源。至宣统三年（1911年），北海海关进出口总额达银元106601558两，其中出口35336243两，进口71265315两，逆差35929072两。

光绪年间，各种洋教传入北海渐多，教民纠纷也日增。光绪二年（1876年），

继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涠洲岛建立天主教堂之后，光绪五年（1875年）六月，北海教民周朝栋私买房屋企图建天主教堂，群众反对，告官后，官府批示周某退还房产。光绪六年，法国传教士在北海市区建立教堂。十三年（188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在北海市区修建立礼拜堂和普仁医院，华文男子学校和圣公会廉北牧区。十五年（1889年），在普仁医院左侧设麻疯病诊室。二十六年，法国教会在北海市区开办“法国医院”。德国教会在崩沙口建教堂，附设德华学校。此间，曾发生过多起教民与当地百姓冲突事件。如合浦考棚街教案引发的德国军舰闯入北海港，逼官府赔偿银元6000两，并以廉州同善堂抵押。到了宣统三年间，美国的新约教会又进入北海。

光绪六年，英国货船“海南号”开辟了北海至香港的定期货运，客轮航线。同年，英国人对北海港进行了详细的勘测，并绘制了北海港地图。最令国人难以容忍的是，英国海军竟于光绪七年在伦敦把北海港地图公开展出。英国海军的这一行径，已赤裸裸地显露了对北海的野心。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曾国荃划拨铁甲兵舰8艘、拖船2艘到北海驻防。十年三月北海官办电报子局成立。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兵舰炮击北海海岸。为了加强防御，廉州总兵官移驻北海，并修建了自冠头岭至乾体港沿线的土垒战壕。光绪十二年五月，裁广东阳江镇水师总兵，改设北海镇总兵，驻廉州。阳江镇标右营改为北海镇标右营驻廉州。高州镇之龙门协、钦州营、灵山营、雷州营、徐闻营、石城营均属北海镇管辖。十三年，清政府调整北海的军事部署，从廉州营拨千总2员，把总3员，外委6员，额外委2员建立北海镇左营；又从阳江镇标左营拨水师千总1员，把总1员，外委3员，额外委1员建立北海镇标右营。这是北海军事布防最强盛的时期，拥有强大的海防力量，承担东起雷州，西至防城的海防御敌任务。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为了打击奸商勒价包收桂皮的垄断行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批准，今后两广关卡不准再收取桂皮贸易的厘、税。“唯至粤海、北海两关出口时，完纳正税”。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龙门协水师两营改归北海镇总兵管辖。

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海出口广西丝绸5400余斤。是年，北海开始有外轮专门运送出洋华工（俗称“卖猪仔”），每船数百人至千余人。以德国船“威咯号”为始作俑者，专门贩运出洋华工，直驶苏门答腊。洋人为此专在北海设立接运机构，有专人负责，期间成为一个“产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北海运往苏门答腊华工为2879人，次年为3380人，至宣统二年（1910年），荷兰船“共班娜号”由苏门答腊载华工336人回国，在北海上岸。光绪十六年，北海开办保太和号民信局。十八年北海海关征税25万余两银元。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邦盛为广东北海镇标总兵官，二十四年因镇压天地会有功，于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被清廷赐赏“巴图鲁”（即满洲勇士）名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合浦、涠洲岛遭飓风，沉船百余艘，溺死数百人。同年，北海、龙州、梧州三个通商口岸开办邮政业务，这是广西最早开展邮政业务的地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南康石头埠（今铁山港）煤矿开办，先期雇工200人，后用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劳动。六月，法国以永安教案为借口索要承办北海至南宁铁路，遭拒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人在北海设“法国信馆”，后又改称“安南北海邮局”。二十八年，清政府将设在香港的九龙司巡检移到涠洲岛，改名为涠洲司巡检。三十一年，北海海关贸易金额为30337两银元。三十二年八月，合浦、北海遭台风拔树倒房，屋无完瓦。是年，北海关税收达34832两银元。三十三年三月，北海巡检分局成立。宣统元年，北海设立商埠审判厅，检察厅。北海巡检分局升为正局。三年，北海电报分局成立。

此间，北海铁路的修建引发了国际纷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法国以传教士被杀相要挟，于当年二月十六日提出要取得广东北海至广西南宁铁路的建设权。同年十二月，为了抵制法国人对北海铁路修建权的逼索，由同盟会员牵头成立了邕北铁路筹备处，向民间广集资金修筑铁路，并声明不收洋股，为此法国领事馆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外务部正式拒绝了法国公使提出合办南宁至北海铁路的要求。是年，南康（今属铁山港区）设邮政代办所。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广东钦廉道郭人漳兴修了廉州至北海的公路。同年，北海保兴商行与英商合办保兴电业公司，用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普仁医院原用的柴油机发电，仅供部分市区照明之用。宣统三年（1911年），北海设邮电子局。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合浦同盟会会员罗侃廷率300余人起义，并策动驻防新军起义，北海镇总兵陆建章逃跑。十月初十，驻北海旧军二十一营兵变，革命军被逼撤出北海。二十六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协字军两标至北海平息兵变，北海由此彻底脱离了封建帝制社会，走向共和。

民国时期报札记述下的北海实景

黄明堂截获敌舰

日前申葆藩勾引桂军及邓本殷等侵犯廉灵边境，迭被黄总司令明堂击退。经前报，本月四日复有敌舰一艘名广威号，由陈荣廷统带，满载军用物品，经过涠洲墩洋面，偷运入钦接济申部，竟图反攻廉北，被黄部探悉，立派巡舰东兴号前往截缉，当将该舰扣留并拿获逆酋陈荣廷等多人，起获枪枝百余杆，子弹多箱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8月17日）

黄明堂进攻防城之准备

申葆藩、冯铭楷、黄志桓、苏慎初等纠集余部，盘踞钦州，图犯廉属。闻邓本殷亦助兵两营，然合计不足2000人之数。现申等进行颇亟，部队早由防城向廉州开拔，目下布驻于石康总江口一带，但南路讨贼总司令黄明堂早已侦得消息，业将所部3000余人扼罗成江驻扎，严为戒备，双方相距或7、8里不等。总司令部则设于廉城内，并于北海设立行营，以为后方策应。现黄总司令以申等谋犯廉境，殊属不知自量，应立予痛击，直捣防城，扫其巢穴，免为地方之患，决定实行进攻。经准备干粮数袋千斤，俾得裹粮尚征，以利军行，一俟准备齐全，即行进击。前日大本营已解济子弹20万发，并拨出巡舰2艘，交黄调遣矣。又副司令欧阳氏（系黄之夫人）尤为骁勇善战，凡遇战事，则乌衣黑裤，头裹黑巾，躬临火线指挥，故军士莫不勇气百倍，想一经进击，申等定必望风披靡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8月18日[三]）

黄明堂忠告钦廉父老书

南路讨贼军总司令黄明堂忠告钦廉父老书云：窃明堂奔走革命二十年于兹，患难余生，饱经世变，向以救国卫民为前提，锄奸讨贼为职志，赴汤蹈火，不避身危。去年讨贼军兴，进兵廉北，深荷各界父老箠食壶浆，相迎道左，三军感泣，莫可名言。方幸天心厌乱，养休边陲，与吾父老同谋幸福，不图申氏葆藩，认贼作父，甘为戎首，勾结西匪，侵犯灵山。推其用心，无非谋占地盘，以图私人权利，糜烂地方，悍然不顾。凡有血气之士，无不疾首痛心。明堂虽不能造福桑梓，宁忍贻害乡邦？乃申氏冥顽不灵，复勾结邓本殷、冯铭楷、黄志桓诸逆，进逼廉城，势不至扰乱全粤不止。岂知西北两江完全肃清，东江逆军相继败亡，跳梁小丑何关大局。诚恐我钦廉父老，不明真相，间有受彼诱惑，援助逆军，以致战事牵连。当局为战乱救民起见，势必增派大兵进剿。言念及此，殊切杞忧，该逆明知败亡，而为孤注一掷，意在乘机搜索巨款，以为逃亡海外之资。我父老兄弟生长钦廉，或躬耕食力，或经商糊口，父母妻室，团聚一隅，而能效诸逆逃亡海外乎。明堂奉大元帅命令，克期收复钦灵，现亲率劲旅扫除妖气，誓登我父老于衽席之上，奠定乡邦，如磐石之安，渠魁弗容，稽从罔治。望我父老兄弟，各安生业，勿被叛党诱惑，勿为逆军利用。明堂敬恭桑梓，始终不渝，自当竭力保护，以符我父老属望之殷。如有甘心附逆，抵抗义师，将来大军云集，战祸蔓延，有非明堂所忍言者也。谨此忠告，诸希垂察。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8月27日[三]）

钦廉军事近况

北海快函，关于南路讨贼军战纪极详摘录如下：（一）真文两日，廉灵无战事发生；（二）元晨我军李司令绮庵、梁司令仁兴各部反攻灵山，激战至寒午，即占领城外故衣街，即六峰山、香炉岭各要隘。删午敌军援队约千余人，由南乡开到，我军遂变更计划，暂退茶亭一带，距灵约十里。铣早我军大队由龙门赴援，敌势不支，退入城内，现已严密包围，并派炮队前往助攻；（三）桂军谭浩清删

日抵钦，日间当有剧烈战事发生。邓本殷亦亲率二千余人，兵舰两艘在钦属之船厂、犀牛脚等处，准备袭攻北海，扰我后方；（四）此次桂孽，以全力犯我廉灵，战线延长二百余里，敌军共计万余人。黄总司令现已由雷州调回第三路黄擎汉全部数千人加入前敌，向敌军主力军猛烈反攻；（五）黄总司令拟亲率大队进攻钦州，诚恐敌人扰我后方，已商请莫雄旅长派队来廉协同防守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8月28日[三]）

北海归客谈

顷据最近由北海返省者所述，合浦城自被申葆藩引西军来犯后，黄总司令明堂特令所部严守，养精蓄锐，以备袭击。至今两方相持已满一月，信息隔绝，人民苦饥。平素贮有米粮之店户，尚可藉以度活，一般贫民，日中只靠县署每给军米八两，迨为时已久，仅发四两，多有县城出而觅食者。幸22日黄军见申军之在城外者已无斗志，遂密集所部，于是夜衔枚出城猛向申军袭击，敌从梦中惊觉，以事出意外，各自夺路狂奔，黄部奋勇追击，当堂击毙申军约200余名，并轰伤无数，拾获军用品物甚多。申军刻下退据五里亭，黄军现拟乘胜追击，不日当有大战。至黄部之在北海者，初因申西两军侵廉甚急，而各种子弹又亟待补充，遂主张安全退出北海，驰赴安铺搜集军实，实行夹击申军，故邓本殷得乘虚派兵二营，暨兵舰四艘，入侵北海。该埠商务之日前准备复业者，多因廉城战事未告结束，货物不敢搬回应市，情形非常冷淡，但现虽风鹤频惊，地方仍算安靖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10月3日[六]）

黄明堂任钦廉绥靖处长

钦廉方面，自申葆藩、邓本殷等侵扰后地方历受摧残，加以残军土匪随处皆是，又与桂境毗连，非亟图肃清，无以靖边陲。大元帅特任南路讨贼军总司令黄明堂为钦廉绥靖处长，以专责成，限令刻日安定钦廉，勿使寇氛滋长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2年10月13日）

黄明堂克复合浦

黄明堂前以吕春荣勾通申葆藩、邓本殷人寇钦廉，为谋军略上之安全起见，

特退守化县、电白一带，再图反攻，惟以子弹缺乏，不能如愿。日前特派参谋、军需 2 人来省，请领后，又派副官某持黄亲笔函来省坐催，闻已发出子弹八万，解赴水东，黄氏得此，即下令进攻，已将距东数 10 余里之合浦地方攻克，黄氏经电省锦荣街该军驻省办事处知照矣。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2 年 10 月 25 日〔六〕）

北海筹办钦廉日报之情形

钦廉地居百粤之南，距省穹远，交通不便，为南粤西南门户。民国以后，每次政变，钦廉首受殃及。近数十年来，多出宿将及革命健儿，如刘永福（即黑旗军领袖）之大败法人于谅山。辛亥革命之镇南关河口二役，均在党国历史有莫大光荣。近如陈主席铭枢、邓参谋长世增、陈军长济棠等，均钦廉革命健儿。商务方面，虽有东兴、北海二商埠，惜皆仰香港之鼻息，航行每月多至 2、3 次，民众憾感不足。对于宣传刊物，复如凤毛麟角，遂至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近来钦廉留学同人日益增加，知非组织日报，传达消息，宣传党义，使民众明瞭本党主义不可。故由留京同学庞安民君，留省同学罗光繁、蔡振玮等，发起筹办一钦廉日报于北海，暂定资本一万元。章程及各部人员均筹备妥当，已向在省要人陈主席铭枢、邓参谋长世增、陈军长济棠、香师长翰屏捐助。闻各要人异常踊跃认股，想该报不日当可出世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1929 年 1 月 15 日）

北海商民呈请在广州湾设海关

（请仿照拱北、九龙两关成例设立）

（神州社）北海商民，近以该处生意日益冷淡原因，实以地近广州湾，该处并无税率，故商人多往购办货物，致受影响。昨特联行呈请省府，仿照澳门之设拱北、香港之设九龙往例，设立广州湾征收进出口税，商人必就轻避重，北海商业或能补救于万一。兹将其原呈录下：为国税商业，损失两关，呈请设法维持，以裕饷源而维商业事。窃念北海毗连西粤，界接越南，临岸交通由来已久，商业虽非繁兴，尚未失商埠名目。乃自法租界广州湾开关以来，影响所及，生意日衰，

今竟一落千丈，俨如江河日下。缘彼埠持无税主义，各客趋附，争先恐后，是故商埠日臻发展。既夺商人利市，复碍政府餉糈，夫外洋舶来货品，尽属聚汇于香江。东、西两省所需莫不向港购买，若运两粤之上游，不由省税必经梧关，转入高雷廉琼，非归琼纳，亦莅北输，国税征收，向称周密。今该埠无税，大可招徕前西粤之循省梧而港办者，今转向该埠购买，由汽车运上玉林，出贵县，直达全省堂奥。故不经粤海正税，复绕越以避梧关，南区各属更趋若惊，港汉分歧，四通八达，大装小载，运入乡村，琼北两关，几同虚设。现麻章虽设陆税，仍难杜绝私运，涓涓不塞，固成江河，破牢亡羊，宜思补救，亟应奋发主权，尚可挽狂澜于既倒。仿照澳门之设拱北、香港之设九龙，设关立卡，照例征收，不料入口之赋税，只征出口之输，将既无交涉之嫌疑，收回国家之正税。虽则商人惟利是趋，无不就轻避重，若税质彼此差分，断无舍近而图远，商业从此复振，餉源益见增加。查该埠比邻有名为山狗窝者，隶属徐闻，凡由广州湾出口运入高雷廉琼各属内地者，来往帆船莫不经此，可否先于此处暂设巡舰堵截征收，以杜偷运，后再派员踏勘适中地点，建立海关。庶几生理餉源，不无裨益，是否有当，伏冀钧裁，只为批示，不胜屏营之至，谨呈。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8 年 9 月 3 日）

合浦县兵围搜匪首黄三擒获枪一枝及窝家匪妇

黄三擒为合浦著匪，日前因掳去香师长太夫人，故该县长对于黄匪之踪迹，极为注意。月之某日，合浦县署据密报要匪罗光芳、罗光清等，纠党麇聚总江口墟同芳烟馆及张屋园两处，当即派县兵一排、警卫队一排，于是日深夜 12 时许，驰往该墟分别围捕。惜因地形不熟，户屋甚密，匪徒一面开枪抵抗，一面由后门逃逸，致被漏网。只获土七九枪一枝及窝家与匪妇 11 名口，并搜获匪首黄三擒致罗光清函二件，一并带回县署研讯。兹将该县县兵连连长伍棣中，呈报督队前往围捕经过情形之原呈照录于后，呈为呈报事。据密探报称，刻有要匪罗光清、罗光芳等纠党十余，有手枪 7、8 枝，土七九步枪一枝，麇聚于总江口墟同芳烟馆及张屋园两处等语，据此。连长即于是日下午 12 时，率带士兵 40 名，会同第

二团机关枪连、警卫队，随同该密探前往，将该同芳烟馆、张屋园两处匪巢分头包围，职连与机关枪连担任张屋园，警卫队担任同芳烟馆。至翌晨五时，连长即率卫队由正门直入，该匪等尚在吸烟闹热中，窥见兵到，即开枪射击，各兵士遂即向前猛进，当场缴获土七九步枪一杆，相持片刻，匪势不支，遂向屋之后尾逃逸，可恨地形不熟、房屋林立，一时布置未周，卒被漏网。只将窝家罗济五、陈淦祖、吴颢中、罗氏、罗韩氏、何氏、林氏等七名口押解回来。后又会同警卫队将同芳烟馆遍行搜索，拾获匪首黄三楂致罗光清函二件，其函中用语均属匪人行动。旋将住在该屋之陈立英、蔡秀芳（花名绞索八）及罗光芳之妻凌氏、胞妹罗氏4名口捆绑解回。随在罗光芳之胞妹罗氏身上搜获子弹八颗，理合将经过情形及匪函二封、土七九步枪一杆、子弹八颗，犯人罗济五、陈淦祖、吴颢中、罗氏、罗韩氏、何氏、林氏、陈立英、蔡秀芳、罗凌氏、罗氏共11人，备文呈解钧署察核讯办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8年9月26日）

合浦县严禁跳岭头恶习

奸淫烟赌相因而生 风俗治安两俱妨害

合浦县属上八团各处，每年值秋冬之交，一般无知愚民向有跳岭头之迷信恶习，乡曲间豪劣神棍复乘机蛊惑，敛财肥己，以至土匪伺隙蠢动，滋扰不堪。昨合浦县署据北塞乡警卫队小队长余日骧呈请严禁。该署据呈后，以此种恶习亟应严厉禁止，特出示厉禁。其布告如下：为布告事，案据北塞乡警卫队小队长余日骧呈称，查地方庙产，经钟县长准拨充为学款，以破除迷信，而培育人才。乃近查有不良之徒，蛊惑愚民，拟恢复跳岭头之陋习。豪劣神棍相继蠢动，因而把持学租，暗捐巨款，以备跳庙，声势汹汹，已有一发不可复遏之势，若不呈请禁止，实恐再蹈保神匪党之祸。兹因跳岭头之期在即，迫祸恳乞颁布严禁，以维学务，而革颓风，等情据此。查游神赛会，败俗伤风，久经原为厉禁。该乡跳岭头之举，男女杂沓，良歹混聚，奸淫烟赌，相因而生，弊之所及，非但于风俗金融大有妨害，而于治安秩序尤属堪虞，况此种恶习，业由钟前县长禁革，并将所有神款拨

充校费在案，其浊最良，其事至善，自应长此恪守，毋稍或渝。倘有再行作俑，愚弄无知，便是有意祸害地方，希图不轨，自应重申禁令，以免死灰复燃。据呈前情，除指令外，合行布告，仰各商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如有敢倡为跳岭头及其他迎神赛会等各种迷信之举，一经查觉，定必严予惩办，以儆效尤，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布。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8 年 9 月 26 日）

合浦商民呈请弛禁省毫入口

合浦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谭翹南、常务委员黄砾广昨呈省府，请弛禁省毫入口，原呈略云：现据廉城商店华益号等，北海商店贞泰号共千余号联呈诉称，为断绝来源，涸可立待，吁请转呈恩恤商艰，弛禁省毫入口，以维国饷，而资周转事。商民萃处廉北，各业荣生，溯八属银毫销减后，市面现金顿减其半，周转时虞不敷，生意将陷绝境，幸有中山银毫随时运入，及北海文行纸币互相兑换，市面稍资挹注，虽未尽谓流通，亦算调剂有着。詎通行未久，又奉禁运省毫入口之令，加以各项征收机关，更指定收受地名券，其他大洋及各种纸币，一概拒而不纳。查各机关征收月费，须数十万元始敷应付，地方货物出少人多，不能相抵。内既罗掘已空，外无运入接济，真是坐而待毙，欲个索我于枯鱼之肆者，乌可得乎？商既周转无灵，纵不立时辍业，势必缩短货来，以图苟延残喘，国家税收亦必由此而锐减，经济停涸，关系非轻。若非准运调剂，图毙终难幸免，迫得沥隙。恳转呈省府恩准迅令北海海关弛禁银毫入口，以维时艰，以解倒悬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1929 年 10 月）

北海商店吁请弛禁银毫入口

银毫入北海并无禁令省府已据案批示知应

北海埠廉城商店、华益号、怡栈号、北海商店、贞泰号、钜兴祥等共千余号，日前曾联名投称，为断绝来源，涸可立待。特联名吁请政府恩恤商艰，弛禁省毫入口，以维国饷，而资周转。闻省府据呈后，以该商等所呈各节，系属实情，又以银毫出口一案，经于本年十月取消，经限制运入港澳。如北海埠需银毫周转，

尽可由省市带往，并无不准将银毫运入北海之禁令，当经批示知照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8 年 12 月 13 日）

北海商业谈

鸡鸭栏

北海市上所售之鸡鸭，概由钦廉、防城、灵山、合浦各属贩运而来，营此业者共四十余家，其资本最大者亦不及万，由数百元至数千元而已。最近因茶酒楼营业日旺，港商贩运日多，生意颇有起色，但获利甚微，每年所得亦仅及本生息之数耳。

唐洋家私店

制造家私之商店约计 30 余家，其中有专造西式者九家。所造中式家私多用杂木、酸枝等造成，此等木材多由钦、防、灵 3 县运至，质重价昂，每副需费 3、40 元，非寻常人家所能购用。各家私商店对于家私样式，又只墨守成规，极少改良。十余年来，款式从旧，无甚贸易，故近年来自有西式家私出售，人人乐于购用，中式家私似为落伍矣。据查中式家私商店营业递年锐减，今年多数恐不能维持现状，恐不必代远年长，将有淘汰之虞云。

蔗糖业

市上蔗糖之输出每年约计 40 万元有余，营业者四十几家，但因其制法不良，销路日见淡疏，有江河日下之势。近因洋糖输入，受一重大打击，至今所能运销者仅为香港，其余海防各地几乎无甚销场。若不从远设法改良制造，将来诚恐不堪问也。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8 年 11 月 7 日）

南区请裁撤北海梅菴两市改警局

行政归并县治警局 设公安工程二科

（专访）北海、梅菴、陈村、九江四市，前经省府提出省务会议决议裁撤，并飭行民政厅转令各县长分别接收报核在案。昨省府复据南区善后委员陈铭枢呈请裁撤北海、梅菴两市，改设警察局，以省糜费，而苏民困。呈云：呈为呈请裁

撤北海、梅菪两市，改设警察局，以省糜费，而苏民困事。窃职此次在北海市开高、雷、阳、廉、钦地方行政会议，据北海市政筹备专员廖国彦提议略称，窃维举办市政，首重建设，而建设之始，需款浩繁，自非广开财源，实无以资设施，但北海地方原非殷富，近年市内商务，内因金融混乱，外受广州湾影响，益形衰落，商人营业十有九亏损。民困若此，何堪加重负担。此筹办经年，而一切建设未能按序进行之，实在情形也。现计市库收入月亏数百元，维持现状尚虞不足，何有余力从事建设之可能？较不如取消市制，归并县治，以减轻地方负担之为愈，惟事关变制，应请提出会议公决。又据茂名县长黄咏台提案称，梅菪市区奉令撤销旋即恢复，此等劣为，职县何敢妄参。惟自接任以来，梅菪市民来谒，均有不愿改市之意。职县内察民情，外观地理，查梅菪捐税收入仅 1400 元左右，经费不足，设备维艰，其不宜设市者一；人口不满 2 万，远不如佛山人口 30 余万、九江人口 20 余万，其不宜设市者二；商业衰落，远不如江门、汕头等市之繁盛，其不宜设市者三。是以前民政厅长提议撤销，不为无因。且自改市后，市民自分畛域，以致附近 36 乡于办团无所款助，全属基干队成立，独此一区缺如，而 36 乡又不欲划归市区，增其负担。至梅菪钱粮，均向由职县所派出司事粮役催征，须俟市政专员协助，不能直接行使职权，亦一障碍。所有梅菪应否设市缘由，理合提出会议，敬候公决各等情形，据此当经提付会议，查谓北海、梅菪情形，不合市区条件，虽期成立，应请政府照准裁撤，改设警察局，直隶县署，以省糜费等语。职县详加考核，北海、梅菪两市商务衰落，财力薄弱，实无设市之可能，而区域狭小，事务简单，尤无设市之必要。该专员、县长等所称系属实在情形。职署前请撤销该二市改隶县治，亦以其徒增市民负担，无裨实际，应恳照准。将北海、梅菪两市裁撤，归并县治，改设警察局，缩小组织，设公安、工程 2 科，以省糜费，而苏民困。所有行政会议议决，呈请裁撤北海、梅菪两市，改设警察局各缘由，理合录案备文呈请察核施行，实为公便，谨呈广东省政府兼广东南区善后委员陈铭枢。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1928 年 11 月）

北海商业冷淡之原因

自我国今春关税增征后，吾粤内地商业，凡可以对外直接贸易者不无增加，惟北海则反形冷淡，商业经营较去年仅得三分之一。此中原因，据当地商人言，商业冷落主因，殆由广州湾现时仍为法国租借地，货物入口向不课税，且华境地名赤坎一带，向不设立洋关，以稽查货品入境，按章逐一征税，仅设常关于华洋交界区境，以为征缴，但常关征税手续向来笼统，与洋关之截查货品，无论大小，必须逐一按照厘金章程收缴者，精细不同，但因手续笼统，且更可以情面而出，故课税之额，不无出入。商人之运货入口者，多取道于此，以为尝试。故凡安铺、石城、壶洞等地商人，向来皆自北海购办货物者，现已一致改道广州湾，避过入口时之海关新章新税，人人存此心理，故北海埠入口商业之冷淡实由于此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2月3日）

第十师廉州剿匪详情

（剿匪委员之报告）

（本报专访）廉州匪患不让雷、琼，啸众数百，视为常事。现在合浦县上八团匪患渐告肃清，查近日合、博、廉三属交界之平山、周屋、大墟、高岭、长恩陂、青草陂一带，麇集土匪约有7,800人。计闻匪首刘明光人百余，枪70枝；梁南才人百余，枪40枝；庞耀庭人200余，枪八十枝；罗寿堂人300余，枪200枝，粉砲1门；龙得才人50余，枪30枝。该匪等声势汹汹，所过村落庐舍为墟。陈师长据报，即调动部队严为痛剿，一路集中公馆，一路集中山口，由师部合浦县长政治部派一员为剿匪委员，随同军队出发。各部按期到达预定地点，协同进剿，务在歼灭，如果逃窜，则决定跟踪追剿，以绝根株。一面会商俞指挥作栢在钦属认真剿匪，从此钦廉匪患，或可肃清，地方善后当须设法恢复耳。兹将该师派出剿匪委员自前方寄回之报告，披露于下：（上略）秀峰等奉派出席合、灵二属剿匪协会，遵于24日早会同由城起程，是日抵常乐，翌日到张黄，26日住龙门，同日午后2时始达小江。经与余司令晤叙，查小江自遭匪祸，全市被焚，幸免者仅店铺3间，庙宇2间而已。现铺户修复者，尚未及全市商店十分之二，满

目荒凉，殊堪浩叹。当兹大军聚集，房屋有限，并无适当住所，暂寓于淮友家……再查余司令部队，除驻防小江墟外，拨调一营分驻距墟 20 余里之街口坡，因匪首李耀明等股匪前次攻占距墟 20 余里之百寿村宋姓家，现尚踞住该屋，坚壁高垒，以抗官军。故预布犄角之势，一面调集各处民团，分途堵截，然后进兵攻剿，以期一网尽擒，扑灭尽殆，以安地方。观此，廉属匪风之猖獗，亦可想而知矣。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5 年 2 月 17 日）

北海各界欢送第十师移防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去岁奉令收复南路后即驻防钦廉、北海一带，从事训练军队，肃清土匪，一切地方建设事业，皆能依党义努力进行，军民感情异常融洽。此次奉令调省，预备北伐，北海各团体、各机关特发起欢送大会。月前 24 日在吴园前旷地举行开会欢送，计参加团体等人数不下数千。2 时开会，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毕，即由主席代表致欢送辞，举该师训练军队、保护人民、造福地方之种种事实，及该师政治部对民众种种宣传、组织与指导之工作，力勉继续奋斗，以冀实现救国主义，解救全国人民痛苦等语。继请陈师长铭枢、十一师邓副师长、政治部李主任演说，对于人民应如何拥护政府，求主义之实现，始能得真正之解放各义，发挥无遗，听众大为感动。后赠师部与政治部纪念旗各一面，并唱国民革命歌，高呼口号而散。又该师政治部在会场散发临别告钦廉民众传单，大意系勉励与希望该地民众，切实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 15 年 6 月 7 日）

市民请设中央分行维持金融拯救民生

（北海）（中国社）北海市商民前因邓逆本殷盘据时，滥铸劣毫，查其成色尽属伪币，市面受此影响，致各物日涨一日，人民痛苦不堪。近日廉江、安铺、灵山相继拒用伪币，影响所及，各处金融，顿生摇动。工商各界更形恐慌，商店停止交收，承饷纷请退办，新毫不能市物。北海市民为维持大局计，昨特发起组织北海市各界维持金融委员会，以资维持市面金融。该会这次会议议决除铅、铜、

铁、锡露面及哑板外省板银毫外，一律通用，违者罚办，但此办法，不过为权宜之计，终非万全之策。故根本办法非请政府派员来市不可，设立中央银行，推销纸币，吸收新毫，以拯民生，维持大局。昨特呈请省政府转咨财政部，迅予派员到海口市筹设中央分行，以拯救民生，维持金融云。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6年5月9日)

广州政治分会函请省政府查办北海市苛细杂捐案

北海市农民协会等团体电呈广州政治分会，请求取消苛细杂捐，以苏民困。昨政治分会转函省政府查明办理，兹录其原函如下：迳启者，现据北海市农民协会等电称，北海市政筹备员周昌荫新起苛细杂捐10余种，民不堪命。前经电呈在案，复多方请求取销，非惟不准，竟派武装警士威迫缴交。迫得依照党章，通请师部、政治部、师党部前来监视，开全市民众大会，数千人到会，共同表决，一致对于害商病民苛捐，誓难承认。除呈请十一师前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师党部迅予维持外，电请钧座抚恤民隐，速予拯救，不胜待命之至等情。呈经本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交广东省政府办理在案，原函复外，相应函达贵府查明办理。此致广东省政府、政治会议广州分会。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6年5月16日)

敬告全粤父老书

陈铭枢

铭枢遭无妄之灾，裹创负痛，待诊香江，与我父老兄弟姊妹别已两月矣！此两月中以桂系一、二野心家之故，背叛中央，祸延吾粤，使将士死伤于沙场，商傲扰于尘崖。吾父老兄弟姊妹之创深痛钜，有百倍于铭枢个人者，迄兹痛定思痛之余，不觉悲喜交集：喜者，喜吾粤人晓知大义，为国家保留一片干净土，即为地方斩除将来祸种，克以忍小痛而就远谋；悲者，悲吾人以狎比匪人之故，数年来敲吸刻削吾粤之不足，犹复重此巨大之残害以终也。

当铭枢呻吟卧榻之时，正桂系掀举叛旗之日，湘鄂噩耗传至岭海，黄绍竑挟彼方使命秘密入粤，利我粤人之素性忠厚，玩弄出兵以为叛人张目。铭枢深惟吾

粤祸乱之不宜再起也，于病痛之中发危苦之辞，力主吾粤不可先天下称兵以为 1、2 人之牺牲，适会伯南总指挥归自沪上，询谋佥同，揭櫫斡旋，轩然摇荡之大波一时暂告引息。未几武汉乱事既平，岭西仍然负固，铭枢与伯南总指挥仰体政府德意，委曲忠告，信使往远，劝其效忠党国，归顺中央，苦口危言不能促其一悟。而李宗仁、白崇禧则已间道南下，阻兵动众，众憾既往，百粤骚然，而铭枢等区区维护国家保卫地方之初心，遂终不能不出一战矣。此吾粤始终求避免战祸，而卒不得避免之事实始末，为吾父老兄弟姊妹所目睹心知者也。

兵凶战危，有生同苦，然欲避凶而趋吉，去危而得安，有拔本塞源之道在。所谓祸速而小，祸迟而大，此中消息盖不可不知也。此次中央讨叛兴师，及吾粤为维护国家保卫地方而作战。吾民浅近苟安之心理，或受反动之暗示宣传，而懵然以养痍贻患为得策，此种观念实为根本错误。夫革命之最高意义，在求人民之福利，而其先决条件则求国家之统一。统一云者，一切军政最高大权集中于中央，而定于一，就中尤在使手握兵权之武人，绝对不能自由称戈以图反抗。盖既有共同奉戴之统一政府，犹有特殊势力可挟持地方以对抗中央，此等恶例一开，则有兵者强力在手，何求不得，时时得设为口实，以求一逞。辗转师承，大乱安有已时，人民安有宁日。纵观吾国已往史籍，凡一朝代之兴，兵氛不靖，反者叠起，必几经戡定，始得百数十年之治平。唐自安史之乱，方镇擅权，逐节度者自为留后，夺政权者称兵犯阙，遂转相争，乱以至于亡，此外六朝五季权在州军，篡夺相寻，朝秦暮楚，生民之祸极矣。国民革命为解除人民痛苦，人民痛苦在兵至，岂能使北洋军阀时代之督军团再出现于今日，以为乱阶。吾粤为中华民国之一省，不能作少数野心家之争夺杀伐场，吾粤更为革命之策源地，不能作反革命之策源地。向使桂系竭其瘠牛僮豚之力，吾人缩手相让，使得长驱束下，据有两粤以与天下争衡，即就吾狭小一隅祸福言，当复至何境地，此为全体之统一及为地方永久之治安，不得已而为此一战，所愿与吾父老兄弟姊妹披沥以告者也。

回忆民国 13 年冬，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屯兵西省，徘徊观望于南北，铭枢惧其复为陈炳焜、莫荣新、沈鸿英之续也，衔政府之命晓以大义，介绍其加

入本党，此为李、白等参加国民革命战线之始，此后与白崇禧过从尤密，凡奔走国事，必挽与偕行，几几无役不与。北伐告成之后，白崇禧拥兵在北，与某某反动军阀勾结，图不利于中枢，同时武汉方面亦有聚鬼曹社之谋。铭枢驰驱南北，尽力调停，虽知貌合神离，未得要领，然铭枢终以彼辈既同隶青天白日旗下，必不至节外生枝，甘冒不韪，是以复命之日，尚保证其必无他图，中央亦涣然冰释矣。铭枢始终不信同在一党之下有所谓某派某系之存，同在一国之中有所谓省城地方之别。所谓桂系者，乃指李、白、黄及其少数死党而言，并无含广西省城之意，犹之北伐系因军阀踞在北方而立名，并非以北方地域人民为对象。此外广西全省人民，同为中华民国人民，广西军队同为中华民国军队。即事之初起，吾粤军亦有少数袍泽为混浊空气所蒙，被彼辈挟之而走，凡此皆为李、白、黄等所诬误，而不得以桂系论者也。故李、白、黄等削平之日，即桂系名辞消灭之时。惟铭枢援引叛人，累及党国，又不能察觉几先弭患未萌，致贻今日瞞脐之悔，扪心清夜，踧踖不安，此则欲于我父老兄弟姊妹之前引咎自忤者也。

抑铭枢犹有言者，人民苦于兵争久矣。求治之道必先完成中央之统一，所有国军尽奉还中央，同时地方驻在之国军与一省政治划然分离。然后一切设施始能自由发展，以往桂系之统治吾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视一省为个人之战利品，今后唯一主旨在不使地方成为个人势力之争夺场，使此战利品式之政治不再发生。人有惧言曰：建设廉洁政府。吾更进一解曰：建设廉洁法治政府。战利品式之政治不能划去，却无廉洁法治之可言。铭枢职司省政，誓奉此以为指归，苟力有不逮，当自绳劾以谢国人，息壤在彼，共听此言。

（摘自《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8年5月25日）

敌人炮口威胁下的北海

王河天

当我们抵达合浦县城时候，好似走进荒无人烟的境地，一座敌机浩劫后的死城！被炸的街道，残垣败壁，就是还有些完整的商店也门户紧闭。恐怖的空气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而且在第二天早上敌机八架又来狂炸。然而当我们跑到北海来，

以为在敌人炮口下的地方，危险性是更大的，谁料情形出于我们意外，不但没有觉得恐怖，却相反的，北海的安静是广东城市中所少看见。法兰西式的街道依然齐齐整整的，没有看见一间被炸的房屋，假使不是街上行人稀少，商门半闭，我几乎忘记了这是在敌人炮口威胁下的北海。为甚这里与敌人咫尺之近又有这样的安祥，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两天的视察，深深觉得北海潜伏着一种严重的危机。

一、北海目前的状况

北海是东京湾最大的商埠，海道南通安南，东到香港，是南路的重镇，也是广西出入的海口，英、法、德都有领事馆设此，可见商业的发达。在过去曾改为市，现已取消。全镇有 13 保，29,249 人，但因敌机威胁有许多市民已迁移乡间。虽然现在外国商船经常来往香港，而商店多已关门，有些也不敢购货，店门半掩半开的卖货尾，好像坐等时机似的，而且有些巨商已将货品寄放到外国领事馆或者外国人办的医院里，坐观动静。

政治的动员

北海行政方面，过去对于壮丁的训练与征兵有相当的成绩，并且这里青年看当兵为荣耀，曾有 55 名壮丁请缨杀敌。实施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组织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过现金慰问，每月每家给二元，创办出征军人子弟学校四所，免费读书。对教育方面，改私塾为民众学校。在督导区内，各校教师组织巡回教育队，在民众稠密的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在督导区内各校设立民众识字班，并且得抗先队同志的帮助，各乡都在顺利进行着。说到民众动员的工作，如破坏公路，与协助军队建筑工事，都相当踊跃，但是乡村保甲组织太不健全，民众动员工作还是不够。

二、北海救亡工作

在北海过去的救亡工作中，合浦县是最热烈最有成绩的地区，救亡团体整整有十个话剧社。但自敌人威胁北海合浦第一中学搬迁走后，救亡的工作也成尾声，不是因经费的困难，就是因环境的恶劣而逐渐停顿。现在只有第五区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与妇女抗敌同志会还有多少工作外，其余的团体已停止了。最近妇抗

会发动妓女卖花救国，结果得两百多元，她们将该款购慰劳品去慰劳防军与对防军献旗，鼓励守土战士。此外，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准备参加前方救护工作。

手车码头工友抗敌会

最值得我们安慰的就是防军政工队同志们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推动几百个码头手车工友组织，并参加抗敌同志会。手车工人以组为单位，组有组长，经常召集开会，在五一节实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他们因为生活关系，不懂得开会，在码头工友同志会成立的时候，选举干事，但他们不懂“干事”是什么意思，并且叫不惯，因此他们称工会的干事为“工头的工头”，这真是怪有趣味的称呼！

此外，还有理发工人抗敌同志会与民众夜校员生抗敌同志会，除每周出版壁报外，还没有什么工作表现。

三、北海的危机

北海虽然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平原海岸，随时都有被敌人登陆的可能，但是防军在“保卫国土是军人天职”的任务之下，已筑起许多坚强杀敌的工事，而北海当局更应该将全体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协助防军为保卫家乡而奋斗！

一区三公

可是北海最高的机关就是第五区署，警察局与北海镇公所对这种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并且他们本身磨擦很厉害。本来，后面两个机关都属区署指挥的，但警察局长以为他也是民政厅委任的，做事也没有和区署商量。镇公所以为是地方主人，有权有势，为所欲为，甚至因利益的冲突，警长打保长，因调戏女人事情警兵与自卫生团要械斗。最近镇长因走私关系诬告社训壮丁队李××十大罪状，总之这种种磨擦的事情，在汉奸挑拨之下更行加深，这是很危险的。

走私问题

有人说，广州之失是失于淡水走私，今天的北海有同样的现象。这里虽然有海关和少数的缉私人员，但是这里海岸线的长是防不胜防的，并且这里走私是有组织性的，有地方武装保护的走私。据调查所得，走私的后台老板是奸商，而一部份镇乡保长半公开地在电白寮、白虎头、高沙龙、龙潭、大观沙、南康、乐民、

婆围等处走私。北海第五区署曾扣留走私的高沙龙乡长。因为走私的关系，海关收入大减，仇货充斥于乡村小镇。如火油一项，在南康一箱只卖六七元，但在北海要卖二十余元。北海镇第二保壮丁队捉获走私货木油八桶，而镇长以大队长的名义强迫他们交出，后来镇长打赏第二保花红三十元毫券，说货已交还原主，其实这八桶木油怎样下落呢？他们不得而知。晚上我特别跑到海岸去视察防军与壮丁队放步哨，不经意地看见警察也在海滨，本来海滨没有警察的岗位，但是他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呢？后来调查才晓得他们也有另外的生意。北海走私是日趋严重，假使不设法消弭，也许北海的生命就断丧在走私的手里。

汉奸的活跃

自去年东兴破获汉奸麦某，供出在北海开金铺的老板邓子厉，汉奸伏法后，大家都注意到北海汉奸的活动，但因为这里环境复杂（有各国领事馆，有外国人开的医院），同时我们政治机构不严密，连警局对居民迁移登记的工作都停止了，更给汉奸活动的机会。汉奸破坏救亡工作，如妇女抗敌同志会组织妓女读书班，汉奸马上就去破坏，说政府想抽妓女去当兵，吓得她们不敢来念书。又如手车、码头工人有了组织，但被汉奸造谣威胁，弄得“抗敌”两个字都不敢提起。地方巨商准备过顺民生活，将货物寄储到外国领事馆内，同时准备北海沦陷的到临，与外国人组织难民救济会。并且自去年合益号老板庞宽甫购仇货——硫化石（15桶）案发生后，政府没有处置他，而奸商更明目张胆破坏抗战。

渔民救济问题

从敌舰进入东京湾后，首先受其打击的就是渔民，尤其是涠洲岛第二次沦陷敌手后，渔民死于敌手的不下二千人。现在他们不敢出海捕鱼，而靠海为活的渔民生活一天困难一天，并且敌人常以小惠来引诱渔民。我们受过去罗店海盐的教训，已注意渔民的救济，然在合浦党政军联席会议上，虽已经提出，可是没有结论，这也是严重的问题。

总括以上几点：北海是潜伏严重的危机，现在我们要克服这种危机，保卫北海。要：（一）党政机关人员的调整。（二）加强北海救亡工作的领导与实施战时

民众动员方案。(三)肃奸运动的开展。(四)彻底解决渔民救济问题。因为北海是南路的门户，也是保卫南宁的外围线，假使这几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北海的危机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摘自《救亡日报》民国28年5月27日)

北海解放初期的几项重大活动

张九阳

北海解放初期，以北海中学（解放前称合浦一中）为基干的进步师生，在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几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活动。

一、激动人心的晨呼宣传

1949年12月4日清晨，解放北海的枪声打响了，北海人民企盼已久的日子到来了。随着枪声的沉寂下来，北海终于解放了。满怀革命激情的北中师生回到校园，庆贺北海的新生，人民的解放。

然而，此时此刻，国民党的军舰还停泊在外沙岛海面，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飞临北海上空进行扫射、轰炸，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还在作困兽之斗，土匪活动猖獗，特务气焰嚣张，扬言要制造骚乱，进行暗杀活动。因而，人心摇动，社会不安定，市场萧条冷落，商店不敢开门营业，学校学生回校者寥寥。

师生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纷纷表示要开展声势浩大深入人心的宣传活动，教育和发动北海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拥护共产党，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于是，北中的部分进步师生，在北海军政委员会派驻北中的军代表彭景超为首的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由原北中合唱团为骨干的晨呼宣传队。该晨呼宣传队由苏善卿、吴廷贯两位老师带领，从12月8日起进行了达半个多月的宣传活动。每天清晨，晨曦初露，北海的街头巷尾便可听到晨呼队的口号声、歌声。当时高呼的口号是：

欢迎万里南征的人民解放军！

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

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北海！

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老百姓的救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拥护毛主席，建设新中国！

拥护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万岁！

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保护人民财产，发展工商事业！

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

没收官僚资本！

支援前线战争，解放大西南！

打到海南去，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

活捉卖国殃民的蒋介石！

彻底肃清国民党匪帮残余势力！

惩办战争罪犯！

联合苏联和一切新民主主义国家共同奋斗！

欢迎一切犯了错误的人改过自新！

欢迎伪政府的公教人员站到人民这边来！

建立北海人民政权，振兴北海工商经济！

建设新北海，建设新合浦！

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

当时高唱的歌曲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跟着毛泽东》

《你是灯塔》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团结就是力量》。

晨呼队还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194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宣布的“约法八章”的内容，向北海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政策，宣传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

晨呼队还排练了秧歌舞、播种舞、土风舞、活报剧《活捉蒋介石》沿街演出，队伍行进时，国旗、校旗、彩旗交相辉映，锣鼓喧天，口号声声，群众夹道观看并高呼口号回应，拍手称许。晨呼之外，还继之以晚呼，延长了宣传时间，扩展了宣传效果。

除北中宣传队外，新民中学、高凉中学、廉阳补习学校也有部分师生参加了晨呼宣传活动。

通过晨呼宣传活动，提高了北海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和新中国的认识，从而激发起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感情。

从此，北中及其他学校的师生纷纷回校复课，全市的店铺重新开门营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这次的晨呼宣传活动，北海市军政委员会出版的《时事简报》曾以显著的版面加以报道。

参加这次活动的北中同学计有高中三年级的邹才业、林辅球、冯祖毅等，高二级的张九阳、张芍楞、黄宏基、麦剑才、郭瑞万、罗光发、彭福娟、黄民圣、李耀西等，高一级的邹良谋、欧美霞、张文纪、陈铭熹等，初三级的庞辉、黄开平、詹正德、陈铭斌、易沛等，新民中学、高凉中学的何家英、唐世民、庞亮、钟礼观等老师，黄邦武、吴爱泰、张树恭、高大伦、安统齐等同学也参加了晨呼

宣传。

二、艰难惊险的征粮工作

早在北海解放之前，中共六万山区地委根据粤桂边区党委的指示，于1949年10月便建立了六万山区（地委）支前司令部及下属各级支前司令部，以迎接南下大军解放钦廉四属地区，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前线的供给工作。

为此，北海解放之初，受中共六万山区地委领导的北海军政委员会和合浦县人民政府决定，于1950年1月开始进行1949年度的秋季征粮工作（简称“秋征”）。此项工作主要是抽调中学的师生组成征粮工作队，利用寒假分赴各区乡进行。

北海中学的许多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组成了一个征粮工作大队，在北海军政委员会新任命的韩曦初校长、彭景超副校长、王普远教导主任、苏善卿老师的带领下开赴合浦廉州海门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征粮的意义目的，征粮政策，征收的对象，征收的比率等。学习期间，聆听了合浦和北海的领导人张进煊、谭俊、朱澜清、钟高鉴、伍朝汉、陈铭樵等的报告或讲话。

集训结束后还在合浦附城进行摸底调查。我和几位征粮工作队员到了合浦最大的地主王广轩家，了解其地租收入情况并确定对其征粮的数额。摸底调查后，北中征粮工作大队便开赴白花塘圩（今石湾镇）集结。

征粮队的到来，引发了当地反动地主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唆使土匪，于当天晚上，包围、袭击征粮队宿营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为了避免伤亡，队员们都从楼上转移到楼下，面对凶恶的敌人，大家从容镇定。当时有几位解放军外出采购生猪备办部队伙食，他们住在我们征粮队隔壁的圩公所，闻讯后以冲锋枪向土匪还击，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终于仓皇逃窜。翌日拂晓，征粮队领导便派遣李耀西同学，步行赶回合浦县城向县政府报告，在公安局领回步枪数枝，以作防卫之用。

土匪袭击时，有几位同学晾在楼上的衣服被枪弹洞穿，征粮工作的危险于此可见一斑。

由蒲国祥、张九阳、黄宏基、詹正德、张芍楞、彭福娟、罗光发、杨素贞等

同学组成的一个征粮小分队，在吴廷贯老师的带领下，配备了短枪前往石康镇、周江圩一带开展工作。面对随时有可能遭受土匪袭击的危险，我们决定不佩戴征粮工作队员证章，打扮成农民模样，身穿唐装，脚踏草鞋，武器掖在腰间。此一穿着打扮，竟然招致了一场误会和虚惊：石康乡公所的工作人员，用枪口顶住我们的胸口，把我们当成土匪缴了械，经派人交涉才化解了误会。此亦为征粮中所遇惊险之一例。

征粮工作由于开展于解放初期，农村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土匪尚未肃清，反动封建势力尚未打垮，征粮工作实质上是严肃、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征粮的全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动地主、富农的对抗和破坏，他们瞒报田产、装穷叫苦、恐吓群众，甚而勾结、指使武装匪徒袭击、杀害征粮工作队员，但其阴谋终未得逞，反而激励了师生的斗志，坚持艰苦深入的工作，教育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在群众的支持下，征粮工作队胜利完成1949年秋季征粮任务，有力支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准备解放海南岛的解放大军。

为了纪念征粮工作，陈书光同学设计了一枚有“秋征”字样的铜质征粮纪念章。吴廷贯老师创作了《征粮工作队之歌》，歌词为：“来呀同志我们大家整齐步伐向前进，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不怕那万苦千辛，我们是征粮工作队。从滨海的平原到崇山峻岭，从热闹的城市到偏僻的乡村，看我们的队伍多么伟大坚强，坚决进行革命的斗争。深入农村，结合群众，发动农民，消灭封建，彻底扫除反动势力，完成那秋征任务，我们是征粮工作队。”此歌在坚定征粮队的师生斗志，坚持胜利完成征粮任务方面，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曾在合浦附城征粮区队工作的师生们还编印了队员通信录，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继1949年秋征之后，部分师生又参加了北海所属各区乡1950年的夏征工作，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继续效力。

凭回忆，参加征粮工作的师生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庞亮、钟礼观、邹才业、冯祖毅、林辅球、郭瑞万、黄民圣、吴国枢、郑保洲、陈玉玲、曾能芳、李世荣、邹良谋、黄沛章、欧美霞、张文纪、陈铭熹、庞辉、黄开平、陈铭斌、林冠勋、

陈雪华、易沛、黄邦武、吴爱泰、张树恭、安统齐、高大伦等。

经过征粮工作的锻炼，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为部队或地方的骨干。

三、尖锐复杂的剿匪斗争

合浦、北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驻粤部队和广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的指示，在一些地区展开了剿匪。经过1950年上半年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大部分股匪被歼，但是，当时土地改革尚未进行，滋生匪患的基础尚未摧垮，不少匪首尚未缉拿归案，钦廉地区匪患仍然严重，尤以合浦、灵山一带最为猖獗。

1950年10月中旬，钦廉地委书记温焯华、地委宣传部长林施均通知北中的钟礼观、麦剑才、郭瑞万、张九阳、黄宏基、李志滔、郑乃棠共七位师生到地委报到，参加剿匪工作。

温焯华书记首先给我们交代了任务：配合人民解放军43军127师清剿土匪。该师原驻扎在广东廉江，10月1日西进，抵达合浦。接着，温书记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武装入侵朝鲜的同时，其第七舰队非法开进了台湾海峡。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反攻大陆，在华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加紧了对大陆沿海的侦察骚扰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潜藏在境内的匪特也以为时机已到，积极扩展武装，疯狂进行破坏。一个时期，出现了人心不安，政权不稳的紧张局面。很显然，若不加紧肃清匪患，不仅影响治安，而且直接关系到国防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听了温书记的讲话，大家心情非常激动，都表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坚决完成任务。温书记指示后，林部长也讲了话，他说，你们七位师生的具体任务是配合127师379团进剿合浦乌家圩以南之沙岗、西场及其沿海一带的股匪，你们既要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又要当好解放军的翻译，他们大多数是北方人，语言不通，情况也不熟悉，要靠你们的配合，带路，当翻译，了解情况，才不会变成瞎子聋子，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是保证剿匪胜利的重要条件啊！你们有文化，觉悟又比较高，北海刚解放你们就积极参加宣传（晨呼）、征粮，你们大多数还是团员，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同我们一起参加剿匪的还有由钦廉地委、专署从各地调来的机关干部和青年学生。当天晚上我们背起背包，步行到达合浦县城廉州镇。翌日清晨，我们一行七人冒着蒙蒙细雨，踏上泥泞的征途，经过数小时的跋涉抵达沙岗圩，当即与进驻沙岗的379团干部战士汇合，听取了当地匪情的介绍。土匪的活动规律是：我剿匪窜，行踪不定，时伏时起，或聚或散，增大了我军清剿的困难。土匪活动猖獗，气焰嚣张，不但烧杀抢掠，而且威逼利诱农民为匪以壮大声势。大军一到，土匪便化整为零，下海逃遁；大军未到达之处，土匪复又化零为整，大肆活动。有时，土匪为了显示其武器装备精良，特意选用洋枪连续向大军射击示威。面对我军的强大宣传攻势，土匪竟胆敢进行反宣传，同我军“对着干”。例如我军剿匪所到之处制作的“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标语，土匪竟敢在夜间把“土”字涂改为“共”字。土匪还向被胁迫为匪的农民恐吓，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严峻的形势，解放军和我们工作队沉着冷静应对，加大力度向群众宣传我军的剿匪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并宣布被胁迫为匪的农民群众只要登记自新，不再上当受骗当土匪，一律不予追究。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被胁迫为匪的农民纷纷向我军登记自新，一个圩日（三天一圩）前来登记自新者多达数百人。

为了扩大宣传面，增强宣传效果，我们在每个圩日都进行化装宣传，演出剿匪活报剧，麦剑才扮演村姑，虽是男扮女装，却也惟妙惟肖，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土匪常常散布谣言，欺骗恐吓群众，还向解放军、工作队封锁消息，企图置我们于瞎子聋子的境地。张九阳便通过他的一位曾在合浦廉中读初一、家在沙岗圩的同学了解到土匪散布的谣言和群众的顾虑。土匪散布的谣言是：共产党和解放军长不了，他们一走又是我们的天下，谁敢通共自新，下场就是全家杀绝。群众的顾虑是担心共产党的政策宽大无边，作恶多端的土匪得不到惩罚，将来群众还要遭殃。

根据获取的信息，反复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土匪不灭，决不收兵”、“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增强了群众“剿匪必胜，除匪必尽”的信心。

我们还向解放军首长及地方党政领导反映了群众的担心和要求，领导终于作出决定由当地政法部门执行，1950年11月初在沙岗圩处决了以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莫华雄为首的十三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从而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坚定了人民群众剿匪必胜的信心。

在剿匪中还遇到一些情况复杂不易处理的事情。沙岗、西场一带由于土匪长期盘踞为患，农民群众和土匪亲属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经常发生仇杀事件。有一天，剿匪大军的一位连长扣押了当地一个农民，原因是据举报他杀了人。顿时气氛紧张，某些群众不再同解放军、工作队接近。于是我们工作队便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其中缘由，原来这个农民的亲属被土匪杀害了，为了报复，他也把一个土匪的亲属杀了。弄清相互仇杀的原因后，我们便向部队领导作了汇报，建议对此事慎重处理。部队领导据此决定对那名农民进行批评教育，指出其不通过政法部门为了报复擅自杀人的错误，然后下令把他释放。如此处理之后，军民关系得以改善，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配合部队剿匪的工作于1950年11月底结束，离开部队时，379团政委单印章接见了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给七位师生各记小功一次，并发给了纪念品。

四、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

1950年12月北海、廉州两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二百多位青年学生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这是北海又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我们青年学生参加的部队，就是于1950年10月从廉江西进合浦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127师，它对外的代号是“南京部队一支队”。

其时，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我国的东北大门，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在此紧急关头，1950年11月3日，127师师长王东保、师政委宋维拭主持召开了师党委会，作出了“为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部队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为

部队开展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向现代化进军的需要，在廉州、北海等地征集一批知识青年入伍”的决定。

当时负责征集知识青年入伍，后来担任青干队队长的是孙树屏同志，部队剿匪期间他是127师民运科的干事，正在379团指导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他和我们几位配合部队剿匪的师生早就结下了战友情谊。在动员北海中学学生参军时，孙树屏同志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四位参加过剿匪的高三年级的同学：麦剑才、郭瑞万、张九阳、黄宏基。他真诚地动员我们带头参军，我们这四位同学也像先前参加剿匪工作一样，义不容辞，慨然应诺，成为参军的带头人。在我们的带动下，高三年级就有十多位男女同学报名参军，全校报名参军的达一百多人。

同时以南京部队一支队青年干部学校的名义对外张贴招生布告，一时间，合浦、北海的青年学生，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下，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女、兄弟姐妹结伴入伍的动人情景。例如张九阳的母亲送她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参军，陈驯莺的父亲送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入伍，梁广铨、梁广钰兄弟，潘浏远、潘浏远姐妹，陈永培、陈珍堂兄妹，刘彬、刘樱堂兄妹双双入伍，这种爱国、拥军、从军的热情和行动，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在这个参军热潮中，总共有五百多人报名，经过考核（考试）、政审、体检，先后有二百余人被批准后分两批入伍。

我们这支学生军，对外称“南京部队一支队青年干部学校学员”，对内称“一二七师教导大队青年干部队”（简称“青干队”）。一二七师教导大队下辖4个队，一队为军事干部队，二队为政治干部队，三队为青年干部队，四队为文化训练队。大队长为吴成彬，大队政委为许光，副大队长为李友成、胡学礼。

青干队首任队长是关光烈，第二任队长是贾殿宣，第三任队长是孙树屏，政治指导员是董世民，副队长是展戈平，副指导员是叶北流。

青干队编为三个分队，一分队为女子分队，二、三分队为男子分队。每分队先后由3个班扩充为4个班、5个班，全队先后为9个班、12个班、15个班。

为了使这一批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革命军人，大队领导进行了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课程设：人民解放军军史、革命军队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军队的纪律条例及队列训练等；政治课程设：中国民主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我军的光荣传统、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等，此外，还开设了文化、体育课程。

开学之初，许光政委亲自给我们上了“我军的光荣传统”课，他结合127师的历史对我们进行了传统教育，让我们懂得了127师的光荣历史。

127师是一支久经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后由朱德率领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1933年6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第1军团第2师，参加中央苏区的第1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是中央红军前卫师之一，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艰巨任务。抗日战争时，首战平型关。皖南事变后，转战于苏北、皖东、津浦路两侧地区，该师的战斗作风勇猛顽强，敢打硬仗恶仗，有铁军之称，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之一。

同学们听了许政委的课后，深受教育，决心在英雄部队里锤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经过8个月的紧张学习，127师青干队于1951年8月25日在广东茂名县（今高州市）县城举行了毕业典礼。

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团和师直单位，多数担任连队文化教员、卫生员，少数分配到师、团机关任参谋、干事、秘书。还有40位同志在学习期间被抽调到广东电白县参加土改，成为地方干部。

这一批青年学生兵在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熔炉里，经过严格的锻炼，进步很快，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为部队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机关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成为连队和机关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业到地方后，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他们都无愧于部队“青年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革命战士的称号。

(写于2004年5月28日)

北海市渔改工作记实

庞冠润

北海市于1949年12月4日解放，在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完成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等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后，进行了渔民民主改革工作（以下简称渔改）。1953年2月先在涠洲岛南湾港进行渔改试点工作，然后在市郊七个纯渔民乡铺开渔改工作，至同年7月20日结束。在南湾港渔改试点工作前，市委在土改复查结束阶段，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土改复查干部，组织起一支渔改工作队，集中训练，传达学习上级党委在沿海地区进行渔改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北海市渔民情况，学习布置北海市渔改工作步骤和实施方案，明确渔改的目的、要求，严格贯彻渔改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要根据实际和不同对象，采取“一条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通过试点练兵，总结经验，采用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以片带面的工作步骤，全面开展渔改工作。

一、基本情况

1. 北海市面临北部湾（前称东京湾），市属海岸线全长70华里（未含涠洲岛、斜阳岛），沿海的运输船以此为起点，有轮船直达海南岛、香港、广州，与越南只一海之隔，是国防要地，亦是北部湾海产品集散地。解放后（至1953年）每年海产品约十七万担左右。

2. 北部湾渔场属亚热带与热带气候，适应鱼类的繁殖，依据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分为三大渔场：涠洲西部一处，越南大阵海面东部一处（适合7至11月捕鱼），海南岛西部一处（适合10月至12月、正月捕鱼）。深海作业的渔民，旺季（即7月至11月）都到这几个渔场（约离岸70至80华里）去捕鱼。捕捞方法是两只船利用风力拖网捕捞。产鱼以黄鸡、红簪、蔡龙、银米为大宗。其次为红腊、红鱼、鳝鱼等。其他鱼类也有，其中最名贵的海产品是鳝鱼、地鱼、鱿鱼，副产品为带子、鳝肚、沙鱼翅等，当地俗语叫“宝货”。淡季（3至5月）到

来，这些拖船有部分到沿海商埠载货，有部分回埠停泊，修船补网，从事农业生产，有部分在近海港湾捕鱼。

小海作业的渔民占全市渔民人口的大多数，工具简陋，居住在沿海边沿，有的是半农半渔，有些是独立劳动者，有些是纯渔民。他们在离海岸不远、约十至三十华里的海滩或浅海捉鱼或摸螺，采用的生产方式有塞网、等网、拉网、塞箔、围网、围箔、挖沙虫、抛网、余蚝、打蚝蛎、余蟹、钓蟹、放章鱼煲等。平均每人每天最多捕获海产品5至10斤，有时少至一二斤。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平时多是吃杂粮，吃粥，如果几天连续刮大风、下暴雨，不能去做海时，生活就十分困苦了。解放后，虽经过放贷、救济，生产工具更新，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薄弱，没有剩余和积累，仍是仅可度日。

3. 市郊沿海7个乡纯渔民10,254人（另涠洲岛渔民2,255人）半渔半农三万人左右。7个乡纯渔民共有船、艇、排1,493只，网具3,547副，大、中、小钩979副，沙虫锹、鱼叉等234把（半渔民未计），另有浅海定置网具作业（网门、绞缙、塞箔）等155处。

4. 解放前，渔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封建地主、恶霸、帝国主义（日本与法帝）的压迫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渔船的烧、杀、抢，使渔业生产逐年下降。解放三年来，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运动，渔工与贫苦渔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房屋，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加入党、团组织，参加了人民政权建设，通过访贫问苦，回忆对比，扎根串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为渔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北海市地处边陲，与法帝统治的越南遥遥相望^①，土匪特务经常由海上潜入搞破坏活动。当时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进入复查阶段。

二、渔改工作过程

1. 这次渔改工作的目的是“完成改革，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执行的路线是“依靠渔工和贫苦独立劳动者，团结一般渔民（包括渔业资本家在内），坚决

打倒五方面敌人”。工作步骤和要求：一是训练干部，根据中央对沿海渔民工作批示的方针、政策及做法进行检查，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树立干部为渔民服务的观点，明确工作要求。二是管好生产，贯彻生产十大措施，宣传渔改的政治意义及方针政策，安定各阶层人士情绪，从大力领导生产入手，在此基础上扎根串连，进行回忆对比工作，从而提高渔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经过这些思想发动工作之后，成立渔协、渔工会，加强各级领导，发扬民主，搞好团结，开展对敌斗争，总结和布置生产工作。

2. 市委在土改复查结束阶段，抽调了一批“三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表现好、有经验的干部，组织一支渔改工作队，集中学习。学习渔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渔改工作的主要成果

1. 撤销了由政府管理的网门租及封建性的地租（大网地租）等海面专有权制度，把用海权交给渔民免租使用（仅1953年一年计算，渔民免交大网租约折大米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六斤）。

2. 贷款四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②给渔民装造大船54艘，购置拖网108张，解决了贫苦渔民及失业渔工540户、2700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3. 发放了临时的小额修船补网贷款一亿五千万，解决了数百户小艇渔民浅海作业的困难。

4. 发放了一批救济粮款，使一部分缺粮的贫苦渔民度过了饥荒。

5. 建设了濠洲岛及冠头岭灯塔各一座和飓风警报站一处，方便了渔民夜间作业，保证了生产安全。

6. 简便了渔盐、渔粮的供应手续，增设了两个合作社分销处，改善了水产市场管理，适当调整了鱼价。

7. 在白虎头、电白寮等处分配了土改的胜利果实一亿一千五百八十五万元及房屋69间，解决了700多户渔工及贫苦渔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及住房问题。

8. 在7个乡发动组织了妇代会，妇代会委员92人，会员1685人，提高了

妇女地位。

9. 在 6 个乡审查发展了民兵，同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10. 在 6 个乡渔村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支部 6 个，支部委员 28 人，共青团员 67 人。同时发展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宣传员 78 人，落实了党在渔村中的组织领导，为政权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1954 年 5 月“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同年 7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保证在尊重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就恢复印支和平问题，达成协议，法国军队撤出越南，越南全国解放。

②这里说的人民币金额是指 1948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币。1955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每一万元旧币折合一元新币。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和外国（地区）媒体

对北海市安置难民工作的反映

1978 年 3 月 21 日，首批难民船 3 艘 23 人，因越南当局掀起大规模的反华浪潮进入北海口岸。而大批进入北海口岸的越南难民，是在 1978 年 4 月中旬开始的，每天有六、七十艘 800 多人。直至 1979 年 12 月 31 日，从海上或陆地到达北海口岸的越南难民就达 66321 人。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 360 多名干部、医务人员投入接待安置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分阶段疏散中转安置到各地农林场的有 36,349 人。有 30012 人因不愿留在中国安置，经海上乘船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海上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民，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只能挤在船艇上睡，不少人露宿海滩、码头，甚至流落街头。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这一突如其来、如汹涌澎湃的洪水般的难民潮给予了高度重视，经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市政府于同年 5 月成立“北海市接待（安置）归侨领导小组”。当务之急是解决难民的栖身之所以及柴米油盐等生活供应问题。为此，市政府首先在西港口和地角周边，用竹木和油毡纸搭起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的简易棚，并安装有自来水和电灯，作为难民的临时接待处。当时，在北海市民购买粮、油、肉还凭票供应的情

况下，给难民免费供给每户木柴 50 公斤，每人每月大米 15 公斤，猪肉 0.5 公斤及糖、鱼、蔬菜和香皂、衣服、蚊帐、棉被等生活必需品。卫生防疫站派出 30 多名医生，为全部难民免费注射了疫苗。护送 632 名产妇免费入医院产婴，并发给营养品及婴儿衣物。为患病和受伤难民免费治疗。

根据“从实际出发，对口安置”的原则，安置在北海的难民 8715 人，其中，安置在侨港镇的（前称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7709 人；陶瓷厂 875 人；市区企业、学校 131 人。为了妥善解决难民重建新家园、安居乐业，了解到在难民中有部分过去是从北海、合浦、防城移居越南的华侨，世代以捕鱼为生。1979 年 6 月 2 日经国务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侨港镇）。华侨公社于 1980 年 4 月破土动工，兴建难民住宅公寓楼、渔船修造厂、冷冻厂、医院、幼儿园、学校及渔港工程等。在华侨公社动工前后，得到中央首批拨款 2809 万元，联合国难民署 4 次援助 78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305 万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越南当局掀起大规模反华浪潮，驱赶大批难民出境，震动了世界。许多国家新闻媒体广泛关注这次难民潮，纷纷派出记者前来进行采访。从 1978 年 6 月 13 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和《澳门日报》的记者前来北海采访，至 1978 年 6 月 23 日，有来自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联邦德国、丹麦、美国、法国、意大利、新西兰、加拿大、瑞士和香港、澳门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 74 人。报社、通讯社、电视台和刊物计 56 家。其中有世界知名的报刊：《纽约时报》、《每日新闻》、《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刊物》、《明镜周刊》、《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澳门日报》、《贝林时报》、《共和国报》、《卫报》、《悉尼报》、《解放报》、《二十四点钟》、《中西新闻》、《朝日新闻》、《堪萨斯城时报》和西班牙通讯社、联邦德国电视台、瑞士电视台等。以下摘录其中的一些报道和评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前丹麦首相保尔·哈特林和夫人一行，于 1981 年 9 月 3 日在民政部副部长王国权的陪同下，到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访问，他对北海市安置难民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广西北海市在

帮助难民自救、自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成果，使难民们同当地居民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在世界上做出了榜样”。（1981年9月7日香港《大公报》）

“盖尔特（联合国总会计师）说，功效亦不错，时间短，任务大，能按时完成项目，不简单，所以讲，功效亦很高，中国政府是实在的”（注：1982年6月11日至12日，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审计官盖尔特、皮奥索及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莫歌一行前来华侨公社审核援建项目执行情况）。（《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1983年8月7日）

“莫萨利（联合国难民署国际法律保护司司长）说：“我很早就想来广西北海参观，因难民署高级专员哈特林曾来看过，他赞扬北海是难民署的橱窗，是世界安置国的光辉榜样和典范，早已闻名于世。这次我有机会实地参观，感到北海安置难民的成果确实值得骄傲，你们的经验确实很好”。（《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1983年8月7日）

卡彭特（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北京代表）说：过去欧洲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难民情况，现在通过播放这部影片（注），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在安置难民方面确实取得显著成果（注：“中国广西北海市安置难民的电视纪录片”通过在日内瓦向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西德、南斯拉夫等国家播放，观众达4200多万）。（《广西侨报》1983年7月29日）

联合国难民署出版的《难民》杂志1985年1月号（总第13期）封面、底面彩色版配侨港镇冷冻厂难民干活生产照片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树立了无与伦比的榜样，这向来到中国领土的每一个难民提供了长期的避难权”。

UNHC 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概况报道：“这是居住在广西北海临时棚的难民，不久他们将得搬到由中国政府在附近为他们新建的五十幢楼房里（图片解说）。摄影 J·cuenod”第3页，整版。第4、5页整版图片并附解说：“中国医生在为定居在广西北海的难民儿童作体格检查”、“这个新建的医院的设备，是由丹麦难民委员会资助的”。

“1992年1月16日联合国难民署新任驻华代表方田一行到侨港镇检查难民

署援建项目和难民安置情况。参观后（方田）充分肯定了北海市安置难民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热情赞扬了联合国难民署援建项目发挥了积极作用。”（《北海日报》1991年1月21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视二台驻北京记者采访团马尔·舒尔茨、埃尔本、蒂尔曼等一行5人，于1985年3月17日至18日采访侨港镇。埃尔本说，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曾说过，北海市难民安置点是世界上难民安置的典范，通过采访，我们感到确实是如此。我到过东南亚许多地方，泰国的难民住茅棚；新加坡的难民放在海上不准上岸；马来西亚的难民被安置在两个小岛上；香港的难民被用铁丝网围起来，不准出来……。（《外事简报》1995年2月21日）

联合国难民署对外司司长于1984年9月8日参观华侨公社后说，亲自看到北海市地方安置难民良好，非常高兴，很受感动。（北海市政府《难民情况反映》1984年9月12日）

1992年7月10日应外交部邀请，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来我国访问，同行的难民署官员有亚太局局长卡彭特、高级专员特别助理三田村，《难民年鉴》主编萨瓦内，难民署驻北京代表方田。7月22日绪方贞子一行在国务院安难办副主任徐留根，区安办主任向大友、副主任张民保等陪同下，冒着风雨参观了侨港镇，并到两户难民家庭与难民亲切交谈。绪方贞子说，这次参观访问，使我了解到中国政府为安置难民尽了很大努力，我感到很满意。目前难民生活确实还存在不少困难，难民署将继续与中国政府合作，尽力帮助解决。（《广西侨报》1992年7月30日）

1984年10月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中国举办了一次讨论会，与会的共有8个来自不同国度的新闻工作者。《难民》杂志（注：联合国难民署用英文、法文两种文本，向世界各国免费发行）在1985年1月第13期封面、封底彩色报导北海市难民安置的成果图片，并开辟一个专栏，黑字标题写道：“中国的渔民”，在明显的标题中写着：“北海渔业社是难民安置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的范例。北海是中国政府最近对外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这一事实有助于上述情

况得以继续”。下面摘录的是他们在“专栏”报道的内容摘要：

“北海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我们采访一些愿意留在那里的难民。我曾几度采访过东南亚地区，而北海的难民是我所采访过的第一批不愿离开本地区的东南亚难民。那次访问留下的印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中国政府同联合国难民署一道，正组织有技术而又乐于从事生产活动的难民，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这在安置难民的努力中，可能是个例外。但是，北海渔村的成功证明，良好的愿望加上巧妙地使难民们适应新环境的做法，会创造出奇迹般的结果。干得好，中国。干得好，联合国难民署”。（《堪萨斯城时报》记者保罗·丘特科夫）

“我对中国处理难民问题有如下的印象：首先，在难民以及东道主中国间存在着一种有秩序、守纪律的气氛；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能如此顺从地被纳入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管理严格的社会里。其次，北海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接待我们的中国人士无意掩饰难民在某些方面难以适应的事实。那里的许多难民是渔民，他们以前就对这些地区有所了解。因此，他们同当地居民的融洽相对说来困难不多。中国无意对大批新的印支难民敞开大门，西方国家政府不应当主观为他们可以利用这张“中国牌”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并真诚地为这一地区谋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卫报》记者伊思·盖斯特）

“有人说，幸福的人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以来接受的27万越南难民知之甚少的原因。在访问清远国营农场和北海华侨公社时，人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生活上尽管不无问题，但较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难民却宽裕得多、幸福得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许许多多的幼儿童）。毫无疑问，这应首先归功于中国政府。同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政府作法相反，中国政府向难民们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尽管安置这些人肯定会带来许多困难。对联合国难民署来说，中国安置越南难民工作是卓越成功的。这种成功无可争议。”（《解放报》记者帕特里克·萨巴蒂尔）

（庞冠润写于2004年6月）

营盘、婆围乡渔改工作记实

合浦县第七区营盘乡和婆围乡^①是广西钦州地区十一个大小渔港中的二个，又是沿海的主要捕鱼港口之一。面临北部湾（前称东京湾）沿海地处边陲，与法属越南地区交界。北部湾渔场属亚热带与热带气候，适应鱼类的繁殖。钦州地委根据上级党委在沿海地区进行渔民民主改革（以下简称渔改）的指示，于1953年3月2日召开沿海，县委、军分区、公安处及贸易、银行、合作社、水产等部门负责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讨论了沿海渔民情况，作出钦州沿海地区渔改工作的部署。

合浦县营盘乡为渔改重点乡，由一名县委领导带队，率领渔改工作队干部25名，于1953年4月1日进乡开始工作，6月7日结束，历时66天。婆围乡渔改工作是在1953年6月12日开始，8月5日结束，历时55天。两乡的渔改工作过程记实如下。

营盘乡渔改工作情况

一、环境概况

全乡共有369户，1547人。其中，渔工16户、50人，贫苦独立劳动者147户、570人，富农4户、18人，地主8户、25人，其他阶层43户、172人。该乡营盘港为县内最好港口之一，南边临涠洲岛，东边临广东安铺，交通便利。全乡有水田101.7亩，旱田82.84亩，地1111.42亩，合共1295.66亩。生产主要以渔业为主。全乡渔业生产工具有：三角艇47只，竹筏146只，拖网45张，缯网45张，缯埠42个。有党员9名，青年团员9名，政治条件比别的乡强。

二、解放前情况

1. 政治压迫——国民党反动派在沿海设立水上联防队，名义上是保护渔民利益，实际上是侵犯渔民利益，时常凌辱渔民，抢夺渔民的鱼虾，至于抓丁、拉夫，渔民也难幸免，被拉去的青壮年不少，至今还有14人不知下落。土匪抢劫杀人则是常事，能统计出来的有：抢走船12只，杀死4人，烧毁房屋7间，封建把头的压迫也很残酷，匪霸戚有光就杀死3人，强奸妇女23人，抢走船只不

少。

2. 经济剥削——(1)秤头剥削。26两为一斤，但市面一斤是16两，计受秤头剥削去三分之一。(2)客头剥削。所谓客头，就是那些借钱给船主，船主的一切供销都归他经营，从中剥削渔民的人叫客头。客头都是属于地主的。其剥削情况是，利息按渔产的7%，送礼（最好的鱼类）按渔产品6%，收买鱼价比市面低10%~20%，秤头高33%，卖米盐给渔民价钱比市面高20%，只这方面受剥削就占总收入的40%~50%。为各种经济剥削中最残酷的一种。(3)海地租剥削——在海地7华里以内都被封建把头占为已有。故渔民下海捕鱼，一律要交租，否则被驱逐上岸，或遭受毒打辱骂。租额有好几种，如挖沙虫按产量收租10%，围网按产量收租25%，缙埠每年收租20斗谷，箔地每年收租40~50斗谷，屋地每年收租5斤大米，粪坑每年收1斤大米。(4)停泊费——外来船只到港口停泊，要交停泊费。(5)高利贷剥削——一般每月利息是20%。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把头、土匪恶霸压迫剥削下，苦不堪言，生活十分贫困。

三、渔改工作的过程

1. 营盘乡解放后，经过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等社会改革以后，没收地主土地、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和无房的农民，同时取消客头、改变秤头以及发放渔贷款等，农民和渔民都得到了不少利益，但渔业生产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2. 渔改经过。营盘乡为渔改重点乡，由县委一名领导率领渔改工作队干部25名，于1953年4月1日进乡开始工作，6月7日结束，历时66天。

工作步骤是：(1)首先了解各阶层思想和生活情况，表明来意，宣传成立区公所意义等。(2)召开区渔民代表会，成立渔民区公所，集中渔民要求，布置今后做法。(3)发放渔贷款，建立供销合作社，组织联运组，结合扎根串连思想发动工作。(4)开全乡控诉大会，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5)在控诉大会过后，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基础上，进行四查（查敌情、查阶级、查户口、查船只）结合划阶级。(6)整顿组织，把农民协会改为渔民协会，选举乡干部，

编渔民小组。(7)处理遗留问题。(8)渔改工作结束。

3. 渔改工作成绩。渔改工作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发放渔贷，解决渔民生产困难。分两批发放，第一批为三千八百万元，解决40户、170人生产工具困难。第二批发放九千七百七十万元，解决14户失业渔工生产和生活困难。因此，使全乡1953年增产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二斤渔产品。(2)健全和扩大供销合作社，解决渔民渔盐、吃米生活困难。渔改前全乡只有供销合作社一个，又因股金少，不能满足渔民的要求。渔改中从原有六百股扩大到一千股，健全机构，改变经营方法，渔民供销问题得以解决。(3)组织渔船成立联运组，稳定鱼价，增加收入。全乡47只三角艇自愿组合为8个组轮流运销，不但解决了船只困难，而且稳定了渔价，增加了收入。(4)设立飓风警报站，渔民出海安全有保障，减少死亡事故的发生。(5)成立渔民区公所和乡渔民协会。(6)通过诉苦挖根，对比回忆控诉大会等方式，渔民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

婆围乡渔改工作情况

婆围乡渔改工作是从1953年6月12日开始，8月5日结束。渔改工作队进乡后，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结合实际，解决群众当务之急。在渔改工作中，贷款二千四百二十万元，解决全乡140户贫困渔民的生产工具问题；发放救济粮和谷种折价二百二十万八千元，解决58户贫困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组织供销合作社，共有社员360户。修建堤围二处和组织发动群众除虫抗旱。

一、解放前情况

解放前，海面是由反动势力霸占为已有，民国初由邓春生掌握，民国后期，名义归为学校所管，但实际上是地主所把持。渔民下海，要交租，箔地每年每所交租250~300斤谷，竹筏每桨每年交租75斤~100斤谷。

在供销方面，受着三方面的剥削。一方面是秤头剥削，卖鱼时每斤26两，但市面秤是16两，被剥削三分之一。第二方面，是鱼价剥削，客头（大多是地主）先借钱给渔民，渔民捕得的鱼要卖给他：比市价低15%~20%。第三方面是货

物的剥削，渔民需要的货物，大部分都是由客头卖给，往往将物价抬高10%左右，从中剥削。

国民党反动派在沿海一带设有水上联防队和伪乡公所、自卫队等，名义上保护渔民，实际上是从中敲诈勒索，渔民稍一反抗便会大祸临头。加上征兵苛捐杂税等剥削，致使渔民日益贫困。全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晚餐吃干饭以外，其余时候每天吃的是杂粮、番薯、木薯、稀粥，如遇上刮大风暴雨不能出海捕鱼那生活就雪上加霜倒霉了。渔民出海生命无保障，碰上飓风，死亡的危险就在眼前，每年都有人死在海中。

二、解放后情况

解放后渔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退租退押、土地改革、土改复查等社会改革运动，建立了人民政权，分得土地和取回了海面权，改变秤头，发放渔贷款，成立渔委会，渔民贷款后投入购买生产工具。成立渔民协会，领导渔民进行生产，为以后成立渔业生产互助组，发展渔业生产，改善渔民生活，提供了基础。

三、生产概况

婆围乡渔业生产主要是使用竹筏、网、箔、钓等工具，其中以竹筏为主。生产季节以2、3、7、8、9、10月为旺月，1、4、5、6、11、12月为淡月。

在生产旺月季节，每月出海捕鱼（指竹筏）最多能出海11、12次，最少是3、4次，一般是7、8次。淡月时，每月最多是7、8次。一般是5、6次，最少时是3、4次。根据渔民统计，全年出海最多是92工（每工计1），一般是80工，最低是70工。每工收获按10斤鱼计算（扣除食用外），全年最多可得鱼900斤，一般是800斤、700斤，少数是600多斤。

箔地每年产量，有时可捕获鱼3000多斤（在解放前4、5年），有时却一斤鱼也捕获不到，据渔民说，箔地产量比竹筏高，危险性也较小，但工作辛苦。

出海捕鱼以南风为适宜，东南风次之，最怕是大北风（有死亡危险），其次是东北风，再次是西北风。船行最远70、80华里，一般的是3、40华里，最近

是10华里。朝出晚归，来回需时6小时左右。

注释：

①营盘乡和婆围乡原属合浦县管辖，1995年2月作为营盘镇划为北海市铁山港区管辖。

②这里说的人民币金额是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币。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每一万元旧币折合一元新币。

（庞冠润写于2004年5月）

高州府人在北海

王 戈

北海是座移民城市，在近现代北海市的开发建设中，旅居北海的外乡人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解放前，高州府（今广东省高州、吴川、廉江、茂名、化州等县市）人士在北海的开拓业绩，便是其中一例。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门户洞开、积弱积贫。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时，外国商船大举向中国沿海港口倾销鸦片等商品，同时也肆意掠夺我国的白银等资源。清道光中叶，西江水道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受阻，粤桂西南及云贵等地的商品大多改道北海港外运，北海也逐渐成为粤西和桂南沿海的商贸中心。

那时，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葡萄牙等外国人，也被吸引到北海从事商业、航运、宗教等活动。同时，也吸引内地的广州、高州、潮州、琼州等地的客商来北海经商兴业。

据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北海杂录·商务》载，当时“北海一埠，店铺不下千间，而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以广府人尤占多数。本埠生意，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由于同治年间北海生意兴旺，商贾云集，内地的商帮或乡帮为协调内外部的矛盾，以及为维护商人或乡里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北海先后成立了会馆、同乡会等组织机构。

最早成立商会性质机构的是广州府人。广州府人包括广州周边的顺德、番禺、南海、佛山等地商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他们在北海创办了“敬义堂”。

堂址在今中山西路与沙脊街之间的海城区第五小学内。那时，凡广府人中的“钱债官讼及交涉事，均集堂会议”，他们聘请一绅士常驻堂处理日常事务。宣统元年（1875年）敬义堂改称为广州会馆。20世纪80年代，广州会馆因年久失修被拆毁，改建为小学。现在普度震宫内，还保存有花岗岩石质的“广州会馆”横匾一块。该横匾呈长方形，宽315厘米，高87.5厘米，厚14厘米。“广州会馆”四个大字为颜体阴刻，字径50至60厘米，文字走向从右至左横书。该横匾还配有直书小字上下款。上款为“宣统元年谷旦立”。宣统元年是1908年，谷旦，可能是谷雨日。下款为“陈洪范书”。

其次在北海成立商会性质会馆的是高州府人。高州府包括高州附近的吴川、廉江、茂名、化州等地。同治七年（1868年），他们在北海建成了高州会馆。据《北海杂录·局所》载：“高州会馆，乃高州商帮斂资建造，以为会议之所。初，高州之商于北海者，本属寥寥，故未议建。自梁安利、陈正和、黄新盛、张遂成、麦高昌、戚信兴、蔡宝轩七人为之倡，斂资生息，积累凡数年，嗣是该帮人日益众，赞成者日益多，或捐金钱，或助木石，遂于同治七年建成，共费不下3000金。会馆积蓄无多，故无聘请代表人。”

高州会馆是高州府旅居北海的商人及其他人士集会议事以及联谊的场所，旧址在今珠海西路194号。会馆原为三进三开间的砖木建筑，座南向北，南高北低，面向大海。中间有天井和两厢，屋脊上多雕有游龙飞凤等雕饰，会馆门前有一对石狮子。高州会馆曾设有理事会管理会务，但因会费拮据，并没有如广州会馆那样聘请绅士驻馆处理日常事务。以前在高州会馆住宿的，多为高州府的贫苦人家，如无家可归的搬运工人或抬轿工人等。抗战胜利前后，高州会馆曾租给北海水上联防队使用几年。据档案馆中有关高州同乡会的材料记载，于民国卅七年（1948年）5月17日，高州同乡会理事长陈伯英曾致函北海水上联防队的张队长，请该队择址搬迁交还会馆以便修理。函文如下：“查本会所有北海市珠海西路高州会馆中座已崩，亟应修葺，于本月16日理监会联席会议决议，请贵队于本月23日前择址搬迁，以便修理。”北海水上联防队也叫合浦水上联防处，是国民党八区

专署（驻地合浦）于1944年组建的，原设在乾体（乾江），不久迁至北海进驻高州会馆，有官兵40余人，配备有机动帆船一艘，枪数十枝。1948年后，该队曾改称为水上警察队、水上保安连等。北海水上联防队从高州会馆迁出后，便移驻北海独树根华光庙。

解放后，高州会馆北面进屋于1954年为市供销社拆建为仓库，南面进屋于1975年被外沙公社改建为办公大楼。其后，先后有海城区政府、海城区教育局等单位进驻办公，现为海城区城市建设监察大队和海城区民建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地点。

高州会馆拆建后，会馆的古建筑风格荡然无存。后来，文物部门将高州会馆内的花岗岩石刻“高州会馆”横匾，和“新建会馆捐题碑”以及用花岗岩精工雕凿的数根石柱移至普度震宫内保护。“高州会馆”横匾，宽217厘米，高69.5厘米，厚14厘米，“高州会馆”四个大字用楷书阳刻，刚劲挺拔，文字走向从右至左。上下款字体较小，阴刻，文字走向从上而下。上款为“同治丁卯仲春”，即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2月立。下款为“吴川陈兰彬书”。“新建会馆捐题碑”，刻于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孟春（1月），高185厘米，宽81厘米。碑文全部阴刻。碑头横刻有“新建会馆捐题碑”7个大字，文字走向从右至左。其下碑文直刻，文字较小，有一半的文字很难辨认。碑文记载有有关高州会馆的筹建简况，捐款人的芳名及捐款数量等。

解放前，在高州会馆曾祀奉有高州府人特别崇拜的圣母冼夫人等神像。冼夫人是南北朝时期岭南俚族中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是梁国高凉（今高州市一带）太守冯宝之妻。据《北史·列女·谯国夫人传》载：“谯国夫人冼氏者，高凉人也。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又据《中国南方民族史》一书载，冼夫人很早就参加政治活动，年轻时已勇谋兼备，嫁给汉人成为汉妇后，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更多及更大限度地参加国家政治活动，成为当时岭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因而岭南高凉俚族特别崇拜她。清光绪六年到南康经商的高州府（古称高凉）人，曾在三婆庙旁建有冼夫人庙。

每年春秋两祭，高州府人都到冼夫人庙祭祀及聚餐，共叙乡谊。在北海的高州会馆也一样，据《北海杂录·局所》载：为了祭祀北海高州会馆里供祀的冼夫人神像，高州府人“每月初二杓期（祭祀的日期），每人捐银三毫，约50余人，用二毫以办东（办理聚餐），存一毫以为会馆内费用”。据此，高州府人对冼夫人的崇拜可见一斑。

高州会馆对旅居北海的高州府人有着较大的凝聚力。高州府旅居北海的商人，从清同治初年的“本属寥寥”，后来逐渐增多，尤其是普通劳动群众大量涌入北海，成为高州会馆的主要成员。《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北海有两个商会，‘敬义堂’及‘高州会馆’，前一个较对社会有影响，后一个从名称上就知道是为高州人服务的……高州会馆的成员多数是劳动群众，主要包括小商贩、搬运工人及抬轿工人等……实质是工人俱乐部。”高州会馆成立后，到北海经商的高州商人也逐渐增多，人数仅次于广州府商人。《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北海当时人口降为2万人，在北海的商业网点上，有“40家商店是广州人的，是广州商号的分店，经营外国货。有8间高州店，3间汕头店，1间贵州店，此外还有阳江皮货站……又有许多沿街叫卖的货郎担，大多是高州人”。到解放前夕，高州府人旅居北海者更多，约占北海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据档案馆的“伪高州同乡会材料”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海为华南要港，士人辐辏，全市人口已达四五万之众。本会同乡旅居本市者亦有四五千人之多。”由此可见，旅居北海的高州府人，已成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社会群体。高州府人近百年来移民北海的发展趋势，反映北海这座城市所固有的移民文化现象，也反映了高州会馆起到对高州移民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推动作用。

旅居北海的高州府人，除了捐资在北海建有高州会馆外，还先后在北海创办了同乡会，国武堂武馆及高凉中学，显示了高州府旅北人士的实力和活力。此外，大革命时期，革命先驱江刺横（廉江人）还在北海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在北海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高州同乡会约成立于1947年。“高州会馆”是高州同乡会的前身。据合浦县

高州同乡会向合浦县政府申请法人登记的申请书载，该同乡会事务所位于北海市中山公园右邻合浦县私立高凉中学校院内，申请法人登记的目的是“为联络同乡感情，互助互励，共谋发展。”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24日，合浦县县长何迺英予以批复，同意该同乡会以法人登记。

高州同乡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何时召开不详。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于1948年5月23日上午11时，在高凉中学内召开，出席者120多人，大会主席陈桂鸿，记录袁应纯。大会议程主要有：选举高州同乡会理监事，报告财务情况，讨论修理高州会馆事。选举结果，推选陈伯英为理事长，推选鲁国清、杨兆南、凌德才、陈元珍、陈桂鸿、何庭兰、罗东华、袁应纯为理事，吕维敏、罗光复、朱朝明为候补理事，刘瑞燊、陈桃生、梁文修当选为监事，朱朝明当选为候补监事。

高州同乡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于1949年4月3日召开。召开前，高州同乡会理事长陈伯英曾呈报合浦县政府，要求县政府派员监选第三届理事会。于1949年4月2日，合浦县县长林朱栋批复，委派北海警察所所长张君崙前往监选，并指令选举后3天内造册四份，连同改选详细情形报告县政府核准。4月6日，高州同乡会将第三届当选职员呈报合浦县政府，当选的25名职员中，全部都是高州府人士在北海地区任要职的党政军及商界的知名人士，体现了高州帮在北海的地方势力。当选25名职员如下：陈伯英，常务理事兼理事长，男，38岁，廉江人，时任国民党第六师代师长；杨海珊，常务理事，男，35岁，廉江人，曾任北海商会理事。罗敏齐，常务理事，男，46岁，化县人，曾任北海商会顾问。陈元珍，理事，男，39岁，吴川人，任北海英昌隆企业行经理；凌德才，理事，男，37岁，吴川人，曾任北海自卫队队长；梁育光，理事，男，50岁，吴川人，曾任合浦县参议员；许玉书，理事，男，40岁，廉江人，任北海商会理事；鲁国清，理事，男，30岁，吴川人，曾任合浦第三党部书记；吕维敏，理事，男，24岁，廉江人，任北海协昌行经理；招德培，理事，男，33岁，廉江人，任海军驻北海巡防处处长；龙起，常务监事，男，24岁，茂名人，陆军少将，任第八靖剿区副司令；何庭兰，理事，男，38岁，廉江人，任合浦县党部执行委员；梁用玉，财

务委员，男，50岁，吴川人，曾任合浦县参议员；杨兆男，财务委员，男，56岁，吴川人，任北海海味业理事；黄允钦，财务委员，男，42岁，廉江人，任北海黄集利经理；陈永祯，财务委员，男，39岁，茂名人，任万瑞祥经理；邹文郁，财务委员，男，44岁，廉江人，任裕泰行经理；陈桃生，财务委员，男，60岁，茂名人，任永祯祥经理；蔡云堂，财务委员，男，32岁，廉江人，任云兴庄经理；梁文修，候补理事，男，40岁，吴川人，任北海广丰行经理；丁景尧，候补理事，男，35岁，茂名人，任高凉中学校长；朱朝明，候补理事，男，32岁，茂名人，任法院书记官；陆运祥，候补财务委员，男，37岁，廉江人，任北海同昌庄经理；黄腾洲，候补财务委员，男，33岁，廉江人，任北海黄泗和经理。

1949年9月28日下午，高州同乡会在北海中山公园内的高凉别墅（即高州同乡会办事处），举行恭贺陈伯英理事长调任海南特区保一旅副旅长茶叙会，通知同乡会各理事参加，其中有常务理事杨海珊，常务监事招德培，理事许玉书等23人出席。

在20世纪40年代，旅居北海的外乡人，在北海成立了5个同乡会，专理旅居北海同乡群众的各项事务。除高州同乡会外，还有广州同乡会、广西同乡会、阳江同乡会和琼崖同乡会。广州同乡会会址设在广州会馆内，负责人梁再三、邓展南。敬义堂和广州会馆是广州同乡会的前身，参加该团体的有数百名广府人。该会拥有十多间屋房产，每年收屋租2、3万斤大米，以此经费来支持开设“太和医局”、“爱群医院”和“广仁社”，以及扶持1946年秋兴办的私立敬和小学。广西同乡会负责人许绍敏、李文卿，参加该团体的有百多人，会址在博爱路。1947年秋创办私立旭初中学，该校打着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旗号，校址在北海一中校院内的双孖楼。阳江同乡会负责人为林述功，参加该团体的有30多人。琼崖同乡会负责人为林友桐，参加该团体的有80多人。也有人说，还有潮州同乡会。

高州同乡会也拥有一定的房产，据1947年高州同乡会法人登记申请书载，该会因早年同乡的自由捐资，已拥有“珠海西路高州会馆一连铺屋5间，中山路

铺屋 1 间，民族路铺屋 1 间”，以上铺屋出租，“除本会支出外，余款拨充高凉中学经费”。解放战争时期，高州同乡会的出租屋的租金，有时也难以收回。如 1949 年 3 月 23 日，高州同乡会理事长陈伯英曾致函北海警察所所长张君仑，说国民党海军巡防处租住高州同乡会会址及铺屋两间，每月租金 200 斤大米，但一直没法收到租，他们想请张君仑出面解决。但张君仑回复，说此案“无案可稽”，也就是说因兵荒马乱，此租金无法收回。

解放后，在北海的五个同乡会相继停止活动，标志着封建帮会和地方派系在北海已基本结束。1953 年，五个同乡会的房产，全部集中统一管理，1959 年 10 月交由市房产局接管。

国武堂武馆约成立于 1941 年，是高州会馆的会员出资兴建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海先后有国武堂、剑武堂、旋义堂、关帝厅等武馆成立，掀起了练武救国的热潮。国武堂的武馆设在旧猪巷，即和平路近二幼处。开初由林庆堂担任武馆师傅。教习的是少林洪门十大形功夫，其中有龙形拳、蛇形拳、豹形拳、象形拳、狮形拳、猴形拳、鹤形拳、虎形拳、彪形拳等。抗日战争后，国武堂的会员约有 300 人，会员的职业有军、警、政、工、商等，尤以码头苦力和小贩为多。籍贯多为廉江、吴川、化州等县，尤以安铺人最多。国武堂由于会员多，故练武时分为两个支馆，一个支馆由凌德才、冼永汉领导，另一个支馆由罗东华领导。1949 年 5 月 5 日，高州同乡会北海国武堂主任凌德才曾编制国武堂的会员名单，其领导的支馆共有 146 人。其骨干名单如下：

职别	姓名	年龄	职业	籍贯	住处
主任	凌德才	34	军	吴川	沙脊街
文书组	张家宝	32	商	吴川	三王庙码头
文书组	李中平	24	政	化州	福吉村
财务组	梁华记	42	商	吴川	珠海西
财务组	李金甫	48	商	茂名	国武堂内
交际组	凌均甫	30	军	吴川	中山西

职别	姓名	年龄	职业	籍贯	住处
交际组	凌贵龙	38	警	吴川	三王庙码头
交际组	凌梓霖	27	商	吴川	中山西
交际组	潘德森	30	工	吴川	国武堂内
交际组	陆镇英	36	工	吴川	大水沟
交际组	杨朝海	37	工	吴川	旧猪行
保管组	庞瑞利	54	商	吴川	文明路
保管组	龙英梅	36	工	吴川	中山西
保管组	彭永成	50	商	吴川	中山西
保管组	王锦祥	41	商	廉江	中山西
理事组	凌贞义	50	工	吴川	沙脊街
理事组	陆宏英	42	商	吴川	大水沟
国术组	冼永汉	36	艺	吴川	国武堂内
国术组	凌招兰	29	工	吴川	国武堂内
国术组	庄介澄	42	艺	吴川	中山中

北海国武堂还刻有支馆的印章。印章呈椭圆形，文字分两行，文字走向从右至左。上行刻“北海国武堂”5个字，下行刻“支馆图章”4个字。

凌德才主任同时还造了一份高州同乡会北海国武堂（支馆）器服清册。其分馆拥有器械服装清单如下：靛狮头一个，大鼓2只，小鼓1只，红裤54件，小腰刀1对，旧腰带2条，长统镖10把，旧京钹1对，月口铲4把，二号镖3把，旧京锣1面，大关刀1把，马刀1把，大小各色彩旗10面，三齿2把，单戟1枝，旧禾锣1面，双戟1把，袖镖2把，镜屏1幅，铍双刀1把，长腰刀1对，好禾钟1对，狮身布2件，铍刀3把，响钹1对，新马锣1面，佛头2只。

单从凌德才所领导的国武堂支馆来看，高州同乡会国武堂武馆确实有一定实力，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家底不薄，在北海的武馆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不但练武，在节庆日子他们的雄狮队还敲锣打鼓游街，作舞狮表演和武术表演，既得自

乐，也丰富了北海的社会文化生活，充分显示了高州同乡会在北海社会群体中的地位。

私立高凉中学，是高州同乡会于1947年9月筹资创办的。1947年7月，北海私立圣三一中学停办，搬迁回广州，这将有百余名学生中途辍学。为了解决北海学生辍学问题，高州同乡会发动会员捐资及利用同乡会的产业作为经费，筹办私立高凉中学，校址选在中山公园内。当时校舍较简陋，有一间四面坡瓦顶的大平房，前座是办公室，后座隔为3间教室，两旁回廊作乒乓球室及阅览室等，共有学生百余人，分为初中一、二、三年级共3个班。学校设董事会管理。董事长是董煜，董事有陈伯英等人。学校的重大问题，通过召开董事会解决。最初担任校长的有丁景尧（茂名）、黄宗俸。1949年春由罗绍周任校长，聘钟礼观为教导主任，陈锡辉为总务主任。解放后，私立高凉中学和私立旭初级中学于1950年初合并，更名为新民中学，租用圣公会的双孖楼作为校址，学生200余人。1951年新民中学又与合浦一中即北海中学合并。至此，由高州同乡会创办的高凉中学，在社会变革中完成了使命，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但也闪烁着高州同乡会为社会造福创办私立学校的光芒。

江刺横，廉江县南溪村人，1925年曾到广州农讲所受训，1926年入党后，受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的派遣，到北海组织革命群众运动。他曾领导改组了原国民党北海市党部，还在北海创建了钦廉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并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先后组织成立市总工会、农会、渔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组织，并组织了北海市首次捣毁庙宇菩萨等反封建行动，领导了全市工农群众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市政专员的革命行动。1927年5月，他和其他六位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杀害于北海海滨公园内。

（写于2004年6月）

陈铭枢生平事略

李家友

陈铭枢，字真如，1889年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璋嘉村，父亲是

清朝秀才，以教书为业，家境较清贫。

1906年，陈铭枢考入黄埔陆军小学。这时，同盟会在校内已秘密开展活动。陈受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很快加入同盟会，并成为积极分子。在他的带动下，同学蒋光鼐、李章达、邓演达等人也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陈铭枢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习。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起义，消息传到陆中，师生兴高采烈，同盟会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但苦无枪械，留在南京实属徒然。经大家商议，决定分三批前往武昌参加战斗。第一批由陈铭枢率领，同行者有李章达、蒋光鼐、李伴奎、范其务、陈果夫（时为江苏陆军小学学生）及闻声参加的非同盟会员等十余人。他们抵达武昌后，即向都督报到，被编入第二敢死队，投入汉口保卫战。不久，黄兴任革命军战区总司令，陈铭枢等人随黄到汉阳，并被改编为学生队，直属总司令部，参加汉口琴断口战役和黑山防御战。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不久，陈铭枢转入保定军校学习。1913年，国民党开展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陈邀集一些同学离开学校参加反袁活动。反袁失败后，袁世凯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陈为避害，即与同志十余人东渡日本。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陈乃得返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到广东军中任职。由于他英勇善战，不久就崭露头角。

1920年，陈铭枢任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林虎）游击队的营长，后转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师长为邓铿，师参谋长为李济深）。1925年冬，广州国民政府统一了两广，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升任该军第十师师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部与该军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在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率领下，参加西路北伐军向长沙挺进。陈、张、叶诸部在北伐中，士气高昂，所向披靡。特别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攻克武汉等战役中，打败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战功卓著，第四军被誉为“铁军”。1927年1月，第十师在武汉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升任副军长。该军辖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由蔡廷锴，戴戟分任师长，陈还兼任武汉警备司

令。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内部产生了矛盾。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多集中在武汉，他们力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对此则持反对态度，企图排斥共产党。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案》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等决议案，这些决议实质是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独裁权力。这次会议潜伏着宁汉分裂的危机。当时，陈铭枢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他的动向举足轻重。遗憾的是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认识不清，认为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合乎中国的国情，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由于他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而对全会批评蒋不满，便在会议尚未结束之时，悄然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见蒋，使蒋有恃无恐，悍然于4月12日密令白崇禧在上海进行“清党”大屠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在建国后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沉痛地说：我在宁汉分裂时期，从正面走向反面，成为蒋的帮凶，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才认清蒋的面目，并和他划清界限。

1927年4月18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21日，蒋介石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南京，并否认武汉国民政府，陈铭枢此时出任南京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14日，蒋因在徐州作战失利，又受到武汉和桂系两方面的压力，乃宣布下野。9月23日，蒋介石离上海赴日本进行外交活动，陈也离职赴日，他原率领的第十一军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重建。11月10日，蒋由日本回到上海，未几，陈亦由日归国。陈铭枢回国后，重任第十一军军长。1928年2月，陈率部回广东。3月，被任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6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11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陈铭枢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时，北伐军攻克平津，全国除东北外，已具统一雏型。陈认为北伐既已取得全面胜利，国家应该裁军，地方军权应归还中央，遂于12月上旬通电全国军人，倡议裁军，并以

身作则，辞去第十一军军长职，将该军的三个师缩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他的建议遭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极力反对，但却赢得蒋介石的欣赏。

1930年5月1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于中原，蒋命陈部蒋光鼐率第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津浦前线。是月底，两师占领济南，取得胜利。6月，桂军乘机再入湖南占领长沙，企图出武汉与冯、阎相呼应。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急调蒋光鼐、蔡廷锴师出韶关入湘，进占衡阳，结果桂军惨败，狼狈退回广西。战争结束后，蔡、蒋两师正式改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升任十九路军军长。是年冬，蒋、蔡奉命率部到江西“剿共”，这是宁粤合作的最好时期。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极为震动，大惑不解。当时在广东任第八路军总指挥的陈济棠，藉此掀起反蒋高潮，一时群情激愤，宁粤开始分裂。此时，陈铭枢虽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感到不满，但又认为陈济棠等为此而与中央对立，造成国家分裂也不应该。他这种观点不为当时广东各界所容，遂离广州去香港，经日本转南京。

1931年7月，陈铭枢到南京后，又与蒋介石合作，蒋任陈为“剿赤”右翼军总司令，除重领第十九路军（此时辖六十、六十一和七十八三个师）外，还有权节制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各部。正当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沈阳日本驻军于9月18日突然向中国驻军袭击，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9月30日，蒋介石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十九路军亦由江西“剿共”前线调到京沪一带。12月15日，陈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28日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袭击，翁部立即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自此正式拉开。在战争的第一周，由于第十九路军士气高昂，同仇敌忾，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司令盐泽幸一因此被免职回国，敌酋野村继任后，虽多次反扑，亦被第十九路军击退。延至2月中旬，敌又派植田谦吉为司令，于2月20日再次发动总攻。第十九路

军经昼夜奋战，伤亡很多，乃电请南京军政部增援，但军政部竟置之不理，十九路军遂迫不得已于3月1日退守嘉定、黄渡一线。3月3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自由城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淞沪抗战违背了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妥协求和的方针，十九路军又是陈铭枢的旧部，所以，淞沪抗战后陈被迫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出国赴欧洲考察。1932年5月23日，蒋介石调第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任蔡廷锴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十九路军遂移驻福建。淞沪抗战给陈铭枢一个很大的教育，他认清了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排除异己的独裁统治。作为一个爱国将领，他感到痛心和失望。自此以后，他便积极投身于反蒋的行列。

1932年7月，陈铭枢自欧洲考察返香港，开始联系各方面的反蒋力量，从事反蒋活动。他数次密往福建与蔡廷锴、蒋光鼐商量反蒋事宜，蔡、蒋即在福建进行扩军反蒋的准备工作。1933年10月，十九路军为了扩大与国内反蒋力量的联系，主动和江南的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反蒋协定，至此，反蒋抗日时机基本成熟。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公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下设军事、文化、经济三个委员会和财政、外交两个部，另设最高法院和保密局，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即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遂调蒋鼎文第二路军、张治中第四路军、卫立煌第五路军以及空军、海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同时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又率部在泉州降敌，福建人民政府即以失败告终，前后历时约三个月。1934年1~2月间，陈与蔡等人先后离开福州到香港，再赴欧洲，不久，又回到香港。

1935年8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李任主席，陈为副主席。1936年春，陈应第三国际的邀请到苏联莫斯科访问，随后往法国与陈柱天、吴克坚等人筹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

18日，该会正式成立，陈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旅欧华侨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并谴责蒋介石政府对日屈辱投降的行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31日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情况下，被迫释放政治犯，陈遂返国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陈铭枢被选为主席，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等人为名誉主席，邵力子、郭沫若、周恩来等129人为理事。2月6日，武汉地区各界、各阶层联合举行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并决定从6日至11日，依次由宗教、妇女、青年、工人、农民、商人、难民、伤兵、文化界负责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周期间，每晚除各界人士广播演讲外，史良、邹韬奋、于右任、王昆仑、陈铭枢、鹿地亘、冯玉祥、沈钧儒等人也先后作了演讲。7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响应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召开武汉各界代表大会，陈铭枢和郭沫若在会上讲了话，并通过了要求制裁侵略者、救济蒙难同胞等四项决议。1939年，在蒋介石的指使和纵容下，全国各地不断发生迫害爱国抗日人士的事件，陈对此极为愤慨，遂进一步团结各界人士开展反蒋抗日活动。

1943年，陈铭枢与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在中共南方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帮助下，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民主同志座谈会，与许多民主人士取得了经常的联系。是年8月，陈铭枢等人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经商定，陈铭枢、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人建立筹备小组，时称“十人小组”，这个小组就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的前身。“民联”与“民主同志座谈会”是紧密相联的，“民联”的第一批成员是从“民主同志座谈会”成员中挑选出来的。1944年，“民联”开始发展组织，吸收成员，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拟订政治纲领，磋商领导机构人选。1945年8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通过成立“民联”领导机构的决议，选举陈铭枢、谭平山、

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等人为常务理事。1946年5月，陈铭枢与李济深、冯玉祥、刘文辉、龙云、张澜、蒋光鼐、余心清等人在重庆举行秘密会议，就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斗争交换了意见，并商定要互相支持，共同创造条件，待机而起。

1948年元旦，“民联”与“民促”（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在香港正式合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出了它的领导机构，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陈铭枢、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蒋光鼐、朱蕴山等人被选为重要领导人。

1949年初，陈铭枢在上海时，曾策动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反蒋起义，可惜事泄，为蒋所知，遂令汤恩伯将陈仪逮捕，后被押至台湾杀害。陈铭枢还对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进行策反工作。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陈铭枢作为“民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愿意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铭枢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在“民革”组织内，先后任中央常委、“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铭枢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已于1979年改正），1965年5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本文作者系陈铭枢生前秘书）

纪念陈铭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屈 武 朱学范 侯镜如

陈铭枢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抗日将领、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值得缅怀的。

陈铭枢同志是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少年时代即关心国事，立志救国。

17岁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在校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三年后，与蒋光鼐同志一起转赴南京陆军中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该校同盟会对外联络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因参加讨袁斗争被通缉。

1915年，陈铭枢同志在广州策划暗杀广东都督龙济光，事泄被捕入狱，后在同志的营救下越狱逃往日本。1920年，他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当时邓演达先生为该师直属工兵营长，两人志同道合，交谊很深，并于1922年春一道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同年夏，陈炯明叛变，陈铭枢同志闻讯回粤救驾，途中部队被瓦解，他不甘附逆，辞去团长职务，改名真如，前往南京。

1923年初，经邓演达先生说服，陈铭枢同志重回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担任第一旅旅长。1925年，他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以战功卓著升任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接着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邓本殷的战斗，一直打到海南岛。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陈铭枢同志所在的第四军以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独立团为先锋，由粤入湘，直下两湖，击败吴佩孚主力。特别是在汀泗桥等著名战役中，他与叶挺同志、张发奎将军并肩作战，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陈铭枢同志任武汉警备司令、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以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他任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同志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他同驻沪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将领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此后，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陈铭枢同志被迫辞职，十九路军也被调赴福建地区“剿共”——这就引起了该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1933年1月，在陈铭枢等同志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同中央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又缔结了联合反蒋抗日的军事协定，从此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

1933年11月，陈铭枢、谭平山、梅龚彬等同志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一道，并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以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

钧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举李济深同志为主席，并发表宣言，号召“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陈铭枢同志是这次事变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担任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事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福建事变”后，陈铭枢同志避居香港，组织了社会民主党。1935年，社会民主党改组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积极响应共产党发出的团结御侮主张和《八一宣言》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陈铭枢同志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议，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和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领导人。他赞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还不断向全世界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呼吁各国支持抗日。

1943年2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陈铭枢同志与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杨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7年11月，陈铭枢同志应李济深、何香凝同志邀请，赴港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主席，陈铭枢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陈铭枢同志受民革指派回到上海，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做了不少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批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体现了同共产党人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精神。

陈铭枢同志为人公正、性情坦率，而且勤于学问，举凡哲学、军事、政治、文化以至佛学等方面的著作，他都广为涉猎并有较深的造诣。他交游广阔，生前好友遍及海内外；他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军界、政界，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很有影响。

陈铭枢同志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我们在纪念陈铭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应当学习他坚定的爱国精神，

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转载 1989 年 11 月 4 日《团结报》)

民国时期陈铭枢军政职官任免简辑

陈铭枢 (1889~1965 年)，号真如。广西 (原广东) 北海市合浦县璋嘉村人。

1925 年 2 月 1 日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当时，广东军政府组织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3 月底陈炯明部被击溃。第一次东征结束。)

1925 年 7 月 26 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

1926 年 9 月~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 (这一战役，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军长陈可钰。1926 年 8 月，国民革命军突破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的湘鄂防线，逼近武汉。9 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 3 镇，6 日攻克汉阳，7 日占领汉口，10 月 10 日最后攻克武昌。至此，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1926 年 11 月 27 日任 (1927 年 3 月 10 日免)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副军长蒋光鼐，该军由第四军第十师扩编)。

1927 年 1 月 10 日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任第十一军军长，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7 年 3 月 10 日免武汉卫戍司令。

1927 年 3 月~1928 年 2 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委员。(辖两广军政事务)。

1927 年 4 月 26 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7 年 4 月 26 日任 (1927 年 5 月 11 日免) 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6 月 27 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8 年 1 月~6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辖第十、二十四、二十五各师，补充师、新编第六师。属第八路军)。

1928 年 2 月 7 日推选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6月28日任（1929年7月8日免）广东省政府委员。

1928年6月后任第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北京后军制整编，取消集团军、军编制，改为师）。

1928年11月27日指定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8年12月4日特派任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

1929年3月2日特派任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

1929年6月12日替代广东省民政厅厅长。

1929年7月8日任（1931年4月免）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9年7月22日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

1931年6月14日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31年7~9月在第三次“围剿”参战部队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1931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再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至9月15日方石岭一战，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1931年9月30日任淞沪（上海）警备司令。

1931年9月30日任（1931年11月11日免）京沪卫戍总司令官（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成立前）。

1931年11月11日任（1932年1月6日免）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司令官。

1931年12月15日代理（1931年12月29日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1年12月28日推选任（1932年1月29日辞）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31年12月30日特任（1932年10月28日免）交通部部长。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大”选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2年1月28日选任（1933年12月15日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5月30日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中正）。

1933年在职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汪兆铭）。

1933年11月22日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中央政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1933年11月22日驻闽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

反蒋的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委员 12 人。公开反蒋，宣传抗日。1934 年 1 月 15 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分裂和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而失败。

1934 年春以后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重新编组后的军队，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参谋长：邓世增）。

1938 年 1 月 15 日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4 年 8 月以前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韦奇才辑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及有关方面的史料）

廖梦醒手稿《去看陈铭枢》

陈铭枢也是住在乡下，我去看他也是总理事先跟我约好，星期天带着我女儿到乡下去看他的。他住的是一所日式房子。总理在车上就对我说：“你父亲遇刺后，去看他的人中陈铭枢哭得最伤心，简直是号啕大哭。”我也记得听见他的哭声。陈铭枢是主张抗日的。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时，他和蔡廷锴、蒋光鼐在一起。无奈蒋介石既不给粮饷，亦不给弹药，十九路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入租界。

“那天，陈铭枢谈起当时的情况。总理说‘现在爱国将领应当团结起来，和共产党一致抗日。廖先生如果还在，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反共媚日的。’这正说到陈铭枢的心上。陈铭枢被迫退役后，曾与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然而这个‘政府’被蒋介石消灭了，此后他变得比较消沉。”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与再婚妻子已有两个小女孩。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的朝鲜服装。也许夫人知道我母亲和第一个陈伯母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她与我不大亲近。

“总理和陈铭枢谈话时，我一直在旁。总理鼓励他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后来他果然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可惜解放后他被划成右派。他很紧张，血压升高。一天，他在写一封信，来不及写完就突发脑溢血去世。听说总理知道后第一个赶到，看见他伏在未写完的信上，已经死去多时了。”

（辑自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 2 月《梦醒》一书 李湄著）

《北海市志》入藏天一阁史实追记

章国庆

2002年8月，刚刚完成编纂、出版的《北海市志》捐赠、入藏天一阁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一事，通过中央、自治区和北海、宁波两地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当时，笔者曾代表天一阁博物馆赴广西北海接受捐赠，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早在2002年5月，为使《北海市志》编纂、出版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史瑶先生只身飞宁波，对天一阁和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作了一番详细考察。天一阁独特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史先生，回北海以后，很快就酝酿了向天一阁捐赠《北海市志》方案，并于8月初正式发出了热情邀请，请求派员参加于8月20日在北海市海滩大酒店举行的《北海市志》出版新闻发布会暨向天一阁捐赠志书仪式。邀请书发出以后，史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开始了紧张的仪式筹划工作。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收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贵善本8万卷。特别是所收藏的二百七十一一种明代地方志，占全国现存明代地方志的35%，成为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1997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同志在宁波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地方志颁奖会议上提议在天一阁创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拥护和宁波市人民政府的热烈响应。此后，经一系列筹备工作，1999年12月落成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至此，天一阁同时成为了我国新编地方志收藏、展示和开发利用，开展方志文化研究与交流的主要基地之一。该馆建成以后，在全国各省市方志办、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至2001年年底，收藏全国省、地（市）、县（市、区）三级行政区新编志书二千一百余种，计四千七百余册，收藏专业志、部门志、名山大川志等三千多册。同时建立了编目系统、开辟了“中国方志发展史陈列”等一系列工作，还与全国各省市方志办、出

出版社建立了经常的业务往来。在所有这些收藏的新编方志中，大多是我们向各出版社或方志办订购邮寄的，北海是第一次通过这种隆重的仪式接收一个地方新编志书的捐赠。对于北海市志办的热情邀请，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北海志书编者对《北海市志》准确的价值定位，以及对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和中国地方志珍藏馆的信任和期望，更是北海、宁波两地人民友好情谊的象征。的确，我们馆内许多同志感到，作为我国地方志总汇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又增加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样本，这对我国方志事业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也是北海市政府、市志办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鞭策，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搞好方志馆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共同为我国方志事业作出应有贡献。事实上，这一事件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次年4月，洛阳市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向中国方志珍藏馆捐献了一部新近编纂完成的《洛阳市志》。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有意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捐献新修志书。正因为如此，馆里领导班子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为此，我有幸被指派赴广西北海代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接受捐赠。8月19日，我带着天一阁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的真诚谢意和美好祝愿如期抵达广西北海。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天晚上到北海机场时，竟然是史先生亲自接机。这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尊长。从机场到海滩大酒店，一路上，操着一口纯正东北普通话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北海市方方面面。在谈到《北海市志》时，更是珍爱有加，似乎修志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连他的名片上也通过最简练的文字向人们传递我国方志知识。不仅如此，他还把业务工作延伸到了北海市筹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领域——北海是中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让史先生引以为荣的是北海在“申遗”方面的优势所在：如位于合浦县境内的具有显著西亚文化交流特征的万余座汉、晋、南北朝时期古墓葬、古海运码头遗址，以及与海洋文化相关的众多外国领事馆旧址、海关大楼旧址、德国银行大楼、教堂、行业会馆、古炮台等等，并表示通过“申遗”，将提升北海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激发全市人民爱国爱乡热情，从而进一步推进北海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此刻，对于

初次到北海的我来说，不仅北海迷人的风光已经透过夜幕画像般映入眼帘，更体会到这位客籍北海人和他的同仁们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和对事业执著追求精神。在随后两天参观银滩、珠海路老街等北海著名景点时，都无不感受到这种良好氛围。

当天晚上一到宾馆，我用同样的热情，花很长时间阅读了《北海市志》，与平时读志书不同，今天格外地让我兴奋和难以忘怀。这是一部装帧精美，洋洋 289 万字合为二册，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北海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生活、地理环境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大型百科全书，可谓是北海的一代信史。全书由近 100 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余年，“搜寻往史，遍访耆老，历尽艰辛”编纂而成。从字里行间中，仿佛看到了当年络绎不绝的世界各国商船云集合浦港的繁华景象；听到了昔日在人头攒动的珠海路上渔贩们正在为刚刚捕捞上来的海产品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还有，展示了中法战争期间，北海子弟兵组成的边防团练成功抵御法国军舰企图强行登陆北海港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代表着桂南“首开西方风气之先”的英国产的“格拉斯哥”圆盘式锯木机、美国产的第一代“福特”牌轿车等这些新机器又开始启动……。在志书中，还给人展示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海市委、市府正确领导下，“勇抢机遇，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使北海这方热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部高质量的志书能得到社会的赞誉，读者的喜爱，在社会上必能广为流传，从而充分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这部志书就是近年来馆藏志书中少见的这样一部上乘佳志。

秦汉以来，北海一直隶属于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合浦县，历史源远流长。清康熙元年廉州府城设军事单位“北海镇标”驻于此地，清同治年间是“北海”一词独立确认之始。1951 年建立地级市。因此，《北海市志》的正式出版标志着北海历史上从此有了第一部市志，具有特别重大意义。

我生于宁波，长于宁波，深感宁波与北海同属滨海城市，有类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近代，又共同走过一段受到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侵略尤为深重的屈辱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秦汉以来，两地一直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主要门户之一，长期积淀起来的勇于开拓，海纳百川这种文化心理，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因此，越读越喜爱，越读越亲切。

这一夜我难以入睡。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编志工作拉开了序幕，经过广大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的20年辛勤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

《北海市志》的成功出版，无疑是对我国方志事业一大贡献。

此次来北海之前，我已经作了充分的书面准备，但当面对这样一部好志书时，感到原来准备的书面材料已经不能充分表达我此刻的想法和思考，因此不由自主地改写了发言稿。

2002年8月20日上午，时值盛夏，却凉爽宜人。这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北海市志》出版新闻发布会暨向天一阁捐献志书仪式在北海银滩大酒店隆重举行。各级领导，八方来宾，编志功臣以及中央、省、市各大媒体记者济济一堂，大家在节日般气氛中，共同庆祝北海市这一重大文化工程胜利竣工。时任北海市副市长刘新文（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在仪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北海市志》编纂、出版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副馆长晏源源在发言中提出：“北海市志的问世，使自治区志书系列又添佳品，北海文化建设又写出华彩乐章”。我非常荣幸作为受赠单位代表在仪式上发言，畅快地表达了我此时此刻难以平静的心情。当我从刘新文副市长手中接过这部沉甸甸的志书时，我感到接过的不仅仅是一部高质量的志书，接过的更是北海全市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同时也感到这是一份责任，我想我们一定要将这部志书永久入藏、展示于“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仪式上，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史瑶先生作了专题报告，对《北海市志》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中，史主任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发出开展“我读志书，我用志书”活动，使之能真正起到资治当代，惠及后世的现实功能，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8月21日，在北海机场，我和史先生在彼此长久的招手中，结束了难以忘怀的北海之行，登机回甬。

现在每当我走进地方志珍藏馆，被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系列志书中，编号为 K296.72Y1、K296.72Y2 二册《北海市志》显得尤为醒目，此刻就会想起在北海期间的美好情境。

宁波于明初取“海定则波宁”而命之。我衷心祝愿北海宁波，扬帆远航，在不久的将来跻身于世界强市之列。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供稿，2004年5月)

北海的庙、墓、园、亭、井、树

王 戈

庙

古庙宇，是某一地域民俗文化和人文史迹的重要载体之一，并非只是一处宗教迷信场所。因此，很多地方的有识之士，都重视对古庙宇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有效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过去，合浦县（含北海）在寺庙方面，有“一寺、三庵、七十二庙”之说。据有关记载，合浦县的寺庙有：东山寺、真武庙、玉皇阁、元妙观、三清观、药王庙、观音堂、三官庙、三圣庙、康王庙、准提庵、慈云庵、盘古庙、北山庵、三界庙、平江庙、镇海庙、武刀东庙、武刀西庙、西海庙、谭村庙、四帝庙、关帝庙、文昌阁、灵隐寺、平马三官寺、太军庙、沙场寺、永泰寺、北帝庙、满堂寺、太平寺、平隆寺、文武庙、接龙观、火神庙、龙王庙、孔庙、华光庙、地母庙、福寿庵、万灵寺、普云庵、三婆庙、真君庙、武圣宫、风神庙、惠泽庙、雷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学府圣庙、武庙、文昌宫、马王庙、罗公祠、忠义祠、陈五公庙、节孝祠、贤良祠、昭忠祠、府乡贤祠等等。时到今日，因种种原因，有些寺庙已不复存在了。现仅记述现存的部分寺庙。

能村三清庙

能村，位于营盘镇驻地西约 8 公里，西南距白龙圩约 2 公里。能村内有座“三清官”，又名“三清庙”。我于 2001 年 3 月，曾随广西考古队梁旭达等专家到该庙考察。

“三清宫”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两楹，前后进屋之间有走廊相连，两旁有天井。庙门上端，刻有“三清宫”三字。庙门两旁有庙联曰：“三才并峙；清福同膺。”把“三”、“清”两字嵌在上下联的上端。该庙始建何年不详，庙内有碑文记载，光绪年间重修。古庙的风貌很破落，庙内供奉有“三清”神，即“上清”、“太清”、“玉清”三神。庙的前廊墙壁上，画有“富贵绵长”、“满堂高官”等壁画。画风古拙，画面残旧，蕴涵着岁月的苍桑。

庙前，平整开阔，生长有五株逾百年树龄的古榕。古榕虽老态龙钟，尚遮天盖地的高耸碧翠，有如高德庙的数株古榕一样，彰显了庙宇的庄严肃穆。

在庙内东侧的墙壁上，横嵌有一方碑石，名曰“镇阳灵鼓碑”。碑石长 113 公分，高 63 公分，厚 11 公分。碑石上，阴刻有一篇“镇阳灵鼓”序文。因年代久远，碑文很多字已看不清，碑文刻于何年也不详。落款处只有“廉州府”三字可看得清，其余的字难以辨认。是谁写的“序文”也不清楚。“镇阳灵鼓碑”的序文后，还刻有为“三清宫”捐助银两的善男信女众名单。

石碑上的文字阴刻、直排楷书。碑题“镇阳灵鼓碑”五字，每个字宽 7.5 公分、高 8 公分。其他的文字比碑题的字小。碑文有些生僻字，文句较难理解，有些字模糊不清。

下面，我将抄录的“镇阳灵鼓碑”的序文列后，为便于阅读，为之加上标点，分段落，尽量用简体字。不一定很准确，仅供参考。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口表示：

镇阳灵鼓碑

且夫，鼓者郭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盖鼓为乐音之长，造自伊春氏。瓦为控，□为面，可以击也，历代□□□□。

人拾得古老铜鼓一面，重 120 余斤，面铸六蛤，周身花纹，声调铿锵。吾合寨人等四□，合议捐买，□□□□□□。

三清庙内，价银二十两正。但不知铸于何代，年湮世远，父老无传。或为汉代伏波之遗，或吾地属古蛮荒，□□□□未可考然。稽诸《周礼》载，有“六鼓”之名。按此鼓制，有似乎前朝之“灵鼓”，六面者也。故因□而赠之曰“镇阳灵

鼓碑”，垂不朽以为序。

廉州府□□□□□

以下为捐助银两之名单：(略)

序文中“且夫”为语助字，用于句首。“郭”有“外框外壳”，通“皮”等解法。“稽”，有“至”、“及”等解法。“诸”有“凡”、“之”等解法。

据民国版《合浦县志》载：“光绪四、五年（1878—1879年）间，白龙城南门外二里许有土丰，俗称烟墩岭。渔人从墩脚海沙内挖出铜鼓五面，形状花纹如前述，其最大者一送入白龙三清庙，一鬻（音玉，卖也）入城南李氏安园，一鬻入玳王宅，其较小者鬻入城南李氏平园，一鬻乾体（乾江）天后宫。”由此可见，三清宫内的“镇阳灵鼓碑”所说的“人拾得古老铜鼓一面，重120余斤，面铸六蛤，周身花纹”的铜鼓，也许是光绪年间出土送入白龙三清庙的。“镇阳灵鼓碑”也有可能是光绪年间建立的。

何谓“镇阳灵鼓”？“镇”，有镇守等解法；“阳”，有山之南，水之北等解法；“灵”，有神仙或关于神仙等解法。以前，由于人们对如此陌生和奇特的铜鼓不理解，认为这是神秘的神鼓，而“能村”处于南海之北，所以，“镇阳灵鼓”可理解为：“镇守在南海之北的神鼓”。“镇阳灵鼓碑”的序言，主要记载入驻“三清庙”的这面大铜鼓的有关事宜。

解放后，在白龙村一带也有几面铜鼓出土。在坪底村南面的沙滩上，曾出土有两面铜鼓。在湛江市博物馆内，我曾见到一面铜鼓是从北海地区出土的。

“镇阳灵鼓碑”，为古庙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然而，庙内的铜鼓早已丢失，只留下“镇阳灵鼓碑”与古庙共叹沧桑了。

高德庙

高德庙，又名庙山庙，位于高德镇庙山小学校园内，始建于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因年久失修拆除扩建，并由廉州的知府写“高德庙”三字。

该庙面阔三间（宽约24米），进深两楹，建筑面积约930平方米。前后进屋

之间有长 5.6 米、宽 5.2 米的走廊相连。走廊两旁有天井。庙两旁有小屋。庙的前后距离约 30 米。在古庙门前，有两根石柱顶着前檐。大门上端，刻有“高德庙”三字。庙门两旁有副对联：“高居临海北；德泽溥天南。”把“高”、“德”两字嵌在上、下联的上头。这种对联形式称为“嵌字对”。

该庙以前供奉有“龙皇”、“文昌”、“释迦”，以及“五谷神农”、“伏波将军”、“杨家诸将”、“关帝”、“华佗”等先圣贤达等神像。民国二年（1913 年）因遭火灾，庙宇主要建筑被焚毁。后来，曾由高德知名人士苏进，发动附近各村捐资重修。在庙内南侧的墙上，尚镶嵌有几方石碑，碑文刻有该庙重建的缘由及捐款人的芳名。

在该庙的屋檐墙上，以前绘有“鹤寿丰年”、“八仙过海”等古画，在封檐板上，还刻有缠枝花草等木雕。在屋脊上，以前雕塑有双龙戏珠、丹凤朝阳等雕塑。在庙内走廊的两端，架设有两条长约 5 米多的花岗岩条石作过梁，使建筑构架显得很稳重。庙内地板，原由青砖铺砌，后来部分改为水泥。在前后进屋的两厢，均建有拱门相连通。拱门上雕有龙头浮雕。在后进屋靠近天井的墙头上，还安装有古色古香的图案花板，使二进屋内通风透光。

以前，在庙门前的北侧，还建有一座戏台。解放前每年的六、七月间，均在那里演几日几晚庙堂戏的传统习惯，以求人神俱乐。这种活动，在民间影响较大。演出的经费全由附近的“翁山”、“军屯”、“岭底”、“螺壳村”、“开江”、“吉车”、“屋仔村”、“平阳”等八大村的村民捐助。

在开阔平整的庙前，生长有几株高大参天，为市园林管理处标有“古树名木”标志的古木，长得葱茏翠绿。其中有六株，都是树干直径超过 1 米的阔叶榕。另一株据说是稀有的“英哥树”，主干直径约 70 多公分。七株古树名木覆盖的地面范围，南北长约 100 米，东西宽约 38 米，形成了一处绿色的清凉世界。

2000 年前后，对这座历史悠久、环境清幽的古庙，很多村民及旅居加拿大等地的华侨，都纷纷要求捐款重修，恢复原貌。但据说，有些小官思想禁锢、目光短浅，把古庙的保护与学校教育对立起来，使古庙难以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使

古庙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维修。已成危房的古庙，只得听天由命了。

南漓武帝庙

位于南漓的武帝庙。原称关帝庙。创建于康熙年间，道光己巳年（1846年）移建于南漓村之东面某处。后来，听信风水先生说，此庙“高压峦头”，不利于居人，于是，在同治八年（1870年）又迁建于今址。该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曾重修，1990年也重修一次。庙内有石碑记载该庙的历史衍进。

武帝庙，面阔三间，进深两楹，建筑面积约330平方米。一、二进屋之间有长4.9米、宽4.7米的连接廊。廊两旁有天井和小屋。庙内后进的主殿，供奉有关公、关平、周仓等神像。在侧殿，供奉有华光大帝、三婆婆、千里眼、顺风耳等菩萨。

该庙紧靠公路。庙门有一对联曰：“浩气存天地；英风冠古今。”庙的屋脊，雕塑有双凤朝阳及花草等浮雕。庙门廊壁，有“仙女散花”、“桃园结义”、“渭水求贤”、“赵子龙单枪救主”、“三英战吕布”等壁画。在庙内墙壁上，镶嵌有几方石刻，记载有该庙重修的经过和捐款人的芳名。

该庙是北海市现存的一间历史较长、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庙。民间向有“先有南漓、后有北海”之说，该庙是了解北海民俗文化和了解北海历史发展的一个窗口。

地角大王宫

地角大王宫，又称地角大王庙，原建在地角小学校园内，1987年被拆除。1989年经市计委正式立项批复，迁移至地角岭重建。

该庙建于何年不详，但清代已有之。曾供奉有二郎神、金殿大王、四海龙王和郑氏夫人等神像。地角庙的建庙起因，曾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见《北海剪影录》中的《北海古庙宇的传说》）。

该庙面对大海，坐东朝西，面阔三间，进深二楹，建筑面积约780平方米。前后进之间有长廊相连。廊两边有天井。庙前约二十多米处，建有一座露天戏台，面对大王庙。地角渔民每年均请戏班演庙堂戏，在酬神之中，人神同乐，心安理

得，自我陶醉。

该庙的门联曰：“恩覃海角；泽遍天涯。”其门柱也有对联曰：“庙貌重新赫濯声灵昭宇宙；神庥广溥汪洋泽遍闾阎。”对联中有几个生僻字：覃，即深。庥，即庇荫，或保护。溥，即普遍。闾阎，即平民居住的地方，也称平民。

在庙的墙壁上，镶嵌有瓷砖壁画：八仙过海、游湖借伞、卧佛听松、文王访贤、一帆风顺、杨宗保招亲等等。镶嵌有瓷砖壁画的庙宇不多，说明地角渔民富裕。

在地角大王庙的左边（东南面），有座土地庙，名叫“海丰社”，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作为土地庙，可算大了。其前门有门联曰：“海深千世好；丰富万年欢。”庙内也有副对联曰：“海宴河清日；丰享乐岁时。”庙内墙壁上，挂满了渔民信士赠送的贝壳画。土地庙的墙壁上，镶嵌很多瓷砖宗教画，如天姬送子、天官赐福、八仙祝寿、五子登科、福满人间、恭喜发财等等。

地角大王宫，是地角渔村祖祖辈辈的宗教场所，向来香火旺盛，是地方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见证物。地角大王宫，与地角岭上的三座古炮台遗址，以及地角的海滨浴场等三个景点，已构成原拟建的“地之角文化公园”的主要风景点。不少游人和香客，都来参观朝拜。

白龙杨梅寺

白龙杨梅寺，位于白龙珍珠城东南方约2公里的杨梅岭上。民间故事“合浦珠还”所说的，太监三次携带夜明珠都过不了梅岭，这梅岭，即是指杨梅岭。杨梅岭下南面的海面，便是著名的杨梅珍珠池。

杨梅寺，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该寺庙供奉的，是守护杨梅珍珠池的海神。相传在杨梅珍珠池的深处，藏有颗夜明宝珠。为了不让夜明珠丢失，永远存在合浦，有位海神日夜专心守护。人们敬重这位海神武将，就在杨梅岭上建座寺庙来供奉他。这位海神因供奉在杨梅岭，故称为杨梅将军。

杨梅寺旁，有一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在寺庙四周，青树翠蔓，灌木丛生，蝶飞鸟鸣，似是一处原始山林。

寺庙早毁多年。在遗址上，尚残存有香炉、烛台、残砖和础石等，还有一条用砖石铺砌的，由半山寺庙铺落到岭底的残旧石阶。古榕的根系纵横交错，如同一张粗犷的大网，从半山的寺庙一直往下撒到岭底，面积约达几百平方米，委实奇特壮观。杨梅寺，已列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康的三婆庙、洗夫人庙

南康三婆庙，据庙内一方碑文记载，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位于南康圩镇四街的前进路。该庙的庙前有副对联曰：“三界显赫垂宇宙；婆庙威灵遍神州。”

该庙坐南朝北，占地面积约460多平方米。面阔三间，宽10.5米；进深三楹，深43.9米。一、二进屋之间有甬道相通。甬道两旁有天井。二、三进屋之间有天井相隔。天井旁建有小屋。

庙内曾供奉海神三婆婆等神像。以前屋脊雕有花鸟人物，在封檐板上，均雕刻有缠枝花草等图案，工艺较精致。庙内，还有雕花窗棂等构架。是南康一带影响较大的庙宇，以前香火兴盛。

南康三婆庙已列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洗夫人庙，又称洗太庙。紧邻在南康三婆庙的右边。据庙内一方碑文记载，该庙建成于清道光辛巳（1821）年孟夏（四月），主要是高州府籍的商人集资兴建的。该庙的庙前有副对联曰：“洗恩浩荡惠百姓；太庙巍峨普众生。”

洗太庙的规模、朝向、大小，均与南康三婆庙的建筑构架相似。洗夫人庙供奉的，主要有高州人崇拜的“洗夫人”。她是南北朝时代高凉太守冯宝之妻，是一位主张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首领。此外，该庙还供奉观音菩萨和关圣帝君等神像。每年春秋两祭，高州府籍在南康经商或谋生的群众，都到洗夫人庙祭祀和聚餐，共叙乡谊。在庙内墙上，镶嵌有几方碑石，上面刻有该庙的兴建缘由和捐款人的芳名。

高德康王庙

康王庙位于高德四街（称下低街），庙坐南向北，面对大海，离海岸约数十

米。该庙面阔三间，进深两楹，占地约400多平方米。前后两进之间有一盖有瓦面的甬道，甬道两旁有天井的小庑。

庙宇屋脊上，东西两头装饰有一对鳌鱼。鳌鱼龙头鱼尾，两鱼之间，有一居于正中的圆珠。前庙大门镌刻有“康王庙”三字，门左右有庙联曰：“康居乐地；王锡荣封。”

庙内右侧墙上，镶嵌有重建碑文及捐款者的姓名。据重建碑文载：该庙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民国13年重建，百十年来，灵明显赫，佑我北海民众，风调雨顺。我众民有感于康王庙神灵之德，于1993年全市各界民众集资出力第三次重建。鉴于康王庙基底浅，每逢雨季几成泽国，更遭早年台风侵袭，瓦开墙裂，未孚众望，纷要求扩大修建。1998年由陈初贤、吴肇梅、钟兰桂等人发起募捐，募捐者有千人，有一户捐资达万元。

庙正中大殿，立有两尊神像，一是红面康王，手举铜锤，脚踏双狮。一是粉面华光。两菩萨高约1.2米。左殿（西边）中立有包公神像，包公左有海龙王，右有刘海。在右殿（东边），左立有观音菩萨，其旁有红孩子和龙女，即称招才童子。右立有妈祖和水仙娘娘两菩萨。

在近庙门前两边厢房，左侧，有企相高约1.1米的车大元帅，其旁有不足一米的千里眼小菩萨。右侧，有企相高约1.1米的李广将军，其旁有不足一米的顺风耳小菩萨。

高德武圣庙

高德武圣庙，原称鲁班庙，位于高德外沙五街北面沙滩上。解放前已有之，建于何年不详。约重建于1987年。庙宇坐东北向东南，面阔三间，屋脊上雕有双龙拥珠。

庙门镌刻有“武圣庙”三字。门联曰：“武功昭汉代；圣德浦天涯。”二进的门联曰：“神圣传四海；高德震千山。”甬道的对联曰：“重复旧观开新界；长留胜迹在海天。”

庙堂的北面，有香积园。香积园的门联曰：“海风千古秀；神地四时兴。”

庙殿堂正中，供奉有鲁班、关帝、玉皇、令公等菩萨。左侧殿堂供奉有华佗、白马将军、四海龙王、花相老爷等菩萨。右侧殿堂供奉有三婆婆、观音等菩萨。

外沙龙母庙

外沙龙母庙，解放前已有之，建于何年不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革”期间被拆毁，后复建小庙。1992 年当地渔民集资，也得归国华侨阿英姐等人赞助 10 多万元，将龙母庙重建于外沙岛东南端。新建的龙母庙位于旧龙母庙旧址的东面，相距约 200 米。该庙坐南向北，面对大海。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

据说，龙母是古仓吾（今肇庆、梧州一带）人，生于周秦之世的战国时期，她是古百越南方民族中仓吾部族首领。她曾率领人民垦山治水，为乡亲造福，深得人民爱戴。秦始皇曾遣使邀“仓吾国”国王进京，龙母也应邀前往，但不幸在途中病逝。后人为纪念她而建了庙堂。

外沙龙母庙的门联曰：“龙北关令进宫普照五湖四海千舟旺；母帝将军古今灵感响应民间万户兴。”庙门走廊的柱联曰：“龙吟虎啸际风云之庆圣旦；母庙显威睹日月照耀万民。”

庙内大殿正中，有龙母娘娘神像，高约 1 米。其左边（西面），有北帝和千里眼两座菩萨。其右边（东面），有关帝和顺风耳两座菩萨。北帝和关帝高约 50 公分，千里眼和顺风耳高约 15 公分。

龙母庙的旦期有：三月初三北帝旦，五月十八龙母旦，六月二十四关帝旦。

龙母庙的侧边有座“海庆社”（土地庙）。“海庆社”有两副对联。外面一副为：“海震五方神正气；庆威四季驱邪魔。”里面一副对联为：“保境平安多吉利；佑坊四季偕兴旺。”

约于 2002 年，在开发外沙岛建设中，因龙母庙未办有土地证，政府已将该幅土地卖给开发商建“金银岛海景酒店”，龙母庙又被拆除。后来，当地群众又集资在龙母庙西南不远处，在靠近港口边，又建起简陋的龙母庙，“金银岛海景酒店”老板也给予一定资助，使龙母庙又得保存下来。新建的龙母庙坐北朝南，占地及规模都比原来的庙小。

现在，在龙母庙内，挂有“北海市东沙咀老人活动中心”的牌子，以及一块2005年由“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颁发的该协会会员的牌子。新龙母庙的身份似乎合法多了。

外沙鲁班庙

该庙解放前已有之，建于何年不详。1996年外沙渔民集资重建。位于外沙岛中部，原外沙渔业大队楼房的南边。该庙的规模较小，庙内供奉有鲁班、龙母、华光、大帝等神像。

庙的门联曰：“巧艺传千古；精通显万年”。庙旁有一露天土地庙，名叫“海岸社”。“海岸社”有两副对联。其外面一副对联曰：“社稷贴多福；神恩赐永祯。”里面一副对联曰：“海境多吉庆；安宁四季旺。”

鲁班庙的旦期有：五月十八龙母旦，六月十三鲁班旦，九月初九为大帝和华光旦。

西边垌二圣庙

二圣庙又名花猫庙。该庙位于西边垌（即以前南珠市场以东一带的地域）今谭屋村四巷68号东侧。从前，西边垌村有位来自合浦西场的农民，别名叫花猫。据说，他会耍法术，求雨也很灵验，人称为雨师。传说北海的七星江有五座坟山对准西场，造成西场鸡不啼、狗不吠。后来花猫用法术整死了五座坟的神灵，才使西场得安宁。

花猫死后，人们在西边垌建座庙宇纪念他。花猫庙，属北海本地神庙。

据二圣庙的历史记载，该庙是光绪年间遗留下来的小庙，在老宝石牌上，刻有花相爷爷、天后娘娘的神位。庙的落地名为古里寨，在今北海市谭屋村内。开头有一老人名许大池做庙祝。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初二重建，由各村民捐款筹资建庙，请道士做道场开光。文化革命期间被拆毁，1993年群众集资重建。庙宇面阔10米，进深13米。

庙内供奉两个菩萨，一是花相爷爷，一是天后娘娘（即三婆婆）。均用樟木雕塑，每尊高约1米。该庙的门联曰：“二神同心保障天南安全境；圣母厚德来

临海北荫群生。”其庙前有一土地庙，名叫“东成社”。“东成社”的对联曰：“万古乾坤重大；今晨福德加新。”

大墩海武圣庙

该庙位于大墩海村南面。庙坐北朝南，面对大海。面阔三间，进深一楹。此庙解放前已有之，文化革命时被拆毁，1993年群众集资重建。庙的门联曰：“武功昭日月；圣德配乾坤。”

正殿神台上有两排菩萨。前排正中的菩萨为天后圣母，其左边为把港大王，其右边为玄坛老爷（赵大元帅）。第二排居正中者为关帝，其左为康王，其右为四海龙王。神台上还有忠顺候王菩萨。

在正殿东边的左殿，摆放的菩萨有鲁班的神子牌，及曲尺郎君、墨子娘娘两个小菩萨。

该庙的旦期有：二月初四为把港大王旦，三月十五为王府玄坛赵王欧阳真君旦，三月二十三为宣封护国天后圣母娘娘旦，五月十三为关平老爷旦，六月十一为敕封义勇武安关圣帝君旦，六月二十四为玉封道果无漏康王旦，七月初七为真君旦。

该庙曾雇请一庙祝看护及兼经营占卦。

马鞍岭神农庙

位于冠头岭东南的马鞍岭上，离南漓公路约200米。庙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一楹，面对大海。庙四周旷野开阔。有一株古榕蟠曲苍劲，葱笼可敬的札根于庙边。

庙始建何年不详，清康熙年间已有之，晚清光绪年间重建。民国时几经修葺。1968年被拆毁，1992年4月开工重建，同年9月竣工。北海史学家黄家蕃先生，曾为之作“马鞍岭庙重建记”。该碑文刻在庙前的石碑上。该庙有庙祝看管。

庙门有联曰：“神庙濯濯；农庆生生。”庙内中殿，供奉有主宰耕稼的五谷王和海神天妃娘娘。两神均有坐相和行相。庙内的左殿，供奉有木匠先师鲁班。鲁班面前，有男曲尺和女墨斗两位小神像。此外，还有土地神。该庙神像，端庄持

重，身姿秀美、质朴生动、颇具神韵。

神农庙前，坡地开阔，面对碧海。神农庙后，乱草丛生，多有古墓。在近神农庙的西南方不远处，安葬有抗日战争中在冠头岭阵亡士兵黄阿全的坟墓。

菜园里三帝庙

位于北海菜园里新建五巷旁边。建于何年不详。庙堂较简陋。庙内供奉有华光帝、关圣帝和周文王三尊菩萨。其庙联曰：“立胆为义昭千古；存心从忠著万年。”据说三帝庙解放前已有之，规模还算不小。

2000年12月中旬，据说三帝庙因影响了某房地产商对该片房地产的开发，后来，以破除迷信为名，三帝庙被城市管理所等有关单位拆除。

九头岭天妃庙

该庙又名天后宫、三婆庙、九头庙。位于合浦环城九头岭的西边，与合浦氮肥厂相邻。据民国编的《合浦县志》载，此庙建于明朝初年。民国期间，已藏有一面从白龙海面出土的铜鼓，还有一口大铜钟。大铜钟相传流失在廉州某中学内。

该庙1992年重建。原庙在今址约几十米处远的东北角。庙坐东向西，面对南流江。据说，2000年左右，氮肥厂的工人在原庙址的周边煤渣堆中，挖出一对花岗岩石狮子，后来，乡里信徒将其洗净，座立于九头庙前。

据说，在九头庙前的南流江边，曾有汉代伏波将军征讨交趾时的造船厂遗址。

天妃庙主要供奉三婆婆神像。其庙前门有对联曰：“有意烧香何须远朝南海；真心拜佛此处就是西天。”其庙后门有对联曰：“天后威灵风调雨顺；圣母显赫国泰民安。”其庙门外也有对联曰：“吉日还福百业顺遂祈神保佑三春吉；神力庇佑万事亨通福至心灵四季安。”

堂排三官庙

堂排三官庙，位于合浦县环城堂排村公所东面，近邻清水江水库，在合浦至湛江的公路旁。该庙坐西朝东，庙外有山门面向公路。三官庙又名三元宫，清朝已有之。供奉的菩萨有：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以及老子、文昌、观音、关圣、天后、财星等菩萨。

三官庙山门的门联曰：“三官垂宇宙；庙貌冠古今。”山门由当地建筑商梁桂华捐资建造。山门前，雕有高约2米多的守门神。山门后，雕有高约2米、长约2米多的大弥勒佛。

庙内三元宫的门联曰：“三才凭鼓铸；元气毓生灵。”正殿供奉老子菩萨。其左殿有文昌殿，其右殿有观音殿。文昌殿的对联曰：“文明奇才，居然上界昭万古；昌盛翰墨，气运朝天显千秋。”观音殿的对联曰：“普度众生，玉萃瓶中出灵气；慈悲为怀，莲花座上显慧风。”

三官庙内还有关圣殿、天后宫、财星宫、钟鼓坊等处。关圣殿的对联曰：“万古忠心同日月；千秋义气壮山河。”天后宫的对联曰：“莫气遥屈江天外；坤德长垂泽国中。”财星宫的对联曰：“一手黄金财主老；满天白发寿星公。”

冠头岭王龙庙

王龙庙 位于冠头岭西麓的“廉阳古洞”（王龙岩）内，为一逼临大海的岩窟小庙。该庙依山傍海，外宽内狭，岩洞深约11米，高约4米，后有小洞。从前该庙香火颇盛，有庙祝看护。供奉有王龙公（海龙王）、观音、千里眼、顺风耳等菩萨。因古洞小庙里祀奉有海龙王神像，故称此处为王龙岩。

据明嘉靖编的《广东通志》载，洪武八年（1375年）明巡捡郭成驻军冠头岭，建有“廉阳古洞”和镇海庙。在“廉阳古洞”内的王龙庙，也许就是《广东通志》称的镇海庙。

以前，庙前曾有一副石刻庙联曰：“王恩周海角；龙气起冠头”。在“廉阳古洞”内，也有一副石刻楹联：“龙岩清幽英灵可寄；古洞深邃道德之居。”其横批为：“廉阳古洞”。1936年，地方商绅和渔民曾募捐修复该庙，后遭破坏。

庙前沙滩上，以前曾有一片高约二三米的礁石林。每当西南风起，浪击礁石林和峭崖时，潮涌澎湃，撼声回环，响若奔雷。但见珠玉四溅，雾雨升腾，蔚为壮观。若在小庙内听涛观潮，也颇有情趣。这些胜景，曾被称之为北海八景之一的“龙岩潮音”。可惜这些礁石林，以前在建港取石时遭到破坏。每年深秋重阳节，都有很多人到王龙岩一带观赏山海胜景。

南澳三婆庙和大王庙

南澳三婆庙和大王庙位于南澳浴场旁边，面对烟波浩淼的大海，背依层林郁茂的冠头岭尾，风景秀丽，香火兴盛。这两座庙是连在一起的。庙宇面阔两间，进深一楹，硬山结构，每庙各占一间。每间庙的面积约 40 平方米。

大王庙供奉水口大王、境大老爷、过海婆婆。其门联曰：“大德如山重；王恩似海深。”

三婆庙供奉海神天妃娘娘菩萨。其门联曰：“坤仪堪配地；水德可参天。”

这两座庙的左侧，还有一座露天的小土地庙，名叫“兴安社”。其庙首有联曰：“社地有尘风代扫；坛台无灯月照明”。里面还有一副对联曰：“风上浪潮笑笑；夜来海歌声声。”这些庙联，遣词工整，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濶洲岛三婆庙

濶洲岛的三婆庙，又名天后宫，位于濶洲岛南湾港西北岸峭壁下的一个岩洞内。岩洞呈斜三角形，据工程人员测，洞深 36 米，外高 46 米。庙宇面阔三间，进深三楹。庙的东侧，有几株古榕树，盘根札于悬崖上，浓荫苍翠。

庙内的后殿，正中祀奉有海神三婆婆。三婆婆神像的左右，分别是千里眼和顺风耳两尊小菩萨。后殿的左厢，祀奉三婆婆的哥哥三王爷爷。后殿的右厢，祀奉一块长约 70 公分高的神主牌。神主牌上写着：“三婆庙始创人黄开广大人位”。

此庙历史较长，历代曾作多次修复。据民国编的《合浦县志》卷一载：在合浦“南城外有座天后庙，相传来自濶洲，清初徙濶洲民于内地，神像为居民奉之俱来。”

此庙曾有这样的传说：以前有位朝廷武官黄开广，曾率兵船来濶洲岛征剿海盗，初因找不到海盗，一怒之下把小庙烧毁了。后因种种不顺，复又求请神庙保佑，许愿将海盗剿除后，再新建一座神庙。后来黄开广真的如愿将海盗剿除，在濶洲岛还愿再新建一座神庙。现在三婆庙内，还祀奉有黄开广的神主牌。

此外，该庙门前的一副迭字对联，也是很新巧奇丽，妙趣横生的：“神庙朝朝朝朝朝应；海水长长长长流。”据说，此副对联是某一状元撰写的。

这副选字对联，利用我国文字一字多音，同音假借的方法而写成的。“朝”字，可读为朝夕的“朝”（音“招”），也可读作朝拜的“朝”（“朝”与“潮”同音）。“长”字，可读为长久的“长”（“长”与“常”同音），也可读作长大的“长”（“长”与“涨”同音）。若从一字多义和古音通假的角度来解读，此联可用同字异音法去阅读：

神庙朝（音“潮”），朝（音“招”）朝（音“招”）朝（音“潮”），朝（招）朝（招）应；海水长（音“涨”），长（音“常”）长（音“常”）长（音“涨”），长（常）长（常）流。

上联可解为：神庙朝（向神庙朝拜），朝朝朝（朝朝朝拜），朝朝应（朝朝应验。朝朝即天天）。

下联可解为：海水长（海水潮涨），长长长（常常潮涨），长长流（常常潮流）。

三婆庙还有一副贴在门柱上的对联：“天后有深仁，东海筹添福永享；元君具大德，南山祝颂寿无疆。”

天后宫的庙前，还立有一块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立的封岛碑。石碑呈长方形，高约1.5米，宽约0.7米。当时两广都督堂，在碑石上曾刻有告示，意思是：“濶洲、斜阳两岛孤悬大海，最易藏奸，故永远封禁不准来此居住，敢违抗者定将问罪”。这块封岛碑，正是清嘉庆年间封禁濶洲岛的历史见证物。到此庙一游，读览碑文，将可重温这段封岛历史。这将有游庙，有如读史之情趣。濶洲岛的三婆庙，有专人管理，也有占卦算命的先生坐堂。

北海村的文武庙和天后宫

文武庙和天后宫，均位于海角路市淀粉厂东侧，在独树根造船厂内。两座庙宇并排，坐南朝北，面向大海。天后宫在西，文武庙在东。据说，两庙均建于1927年。因1925年大革命时，原位于庙后街（今新兴一街）北面的文武庙，以及位于外沙桥南面的天后宫，两庙的菩萨均被捣毁，后来，北海市群众捐款，迁建于北海村。即位于解放前北海村东头村与西头村两村之间的地段。

北海村，是一条较早的村落。1963年，在北海村附近基建时，曾有王莽改制

时所铸的“大泉五十”及“货泉”等汉代钱币出土。尔后，汉钱出土亦有所闻。1965年基建时，又挖出“大泉五十”一大瓦瓮，约有千余枚汉代钱币。这说明北海村这地方历史悠久。

解放前，北海村分东西两条村，均在海角路北面，靠近港口。东头村约在今广西区船厂至北海边防检查站这一段，西头村约在市淀粉厂及其稍西这一段。解放后，因建设的需要，政府将海角路北面的地段，安排作机关单位和企业用地，北海村相继迁到海角路南面建村。新的北海村，其范围东至酿酒厂，西至水产加工厂，南至独树根村，北至海角路。

位于老北海村的文武庙和天后宫，其建筑结构和新旧程度都是一样的，应是同时期的建筑。每庙均面阔三间，进深两楹；庙面宽约14米，进深约28米。两进屋前后之间，有一长为6米、宽4.5米有瓦盖的连接廊相连。每庙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庙前均立有两根花岗岩廊柱，廊柱上原有对联，文革时期被灰浆所填盖，已看不清字迹。庙门头“文武庙”三字和“天后宫”三字，以及两庙的大门两旁的对联也均被灰浆所填盖。前廊墙壁上，原绘有一些“八仙过海”“松鹤延年”一类的壁画，但现在已残旧模糊。解放前，两庙均香火较盛，有很多群众和船民参拜，还有一叫释云的尼姑管理。此庙宇，解放前也曾是我地下党经常活动的地方。

现庙宇已残旧，耳房已被拆建厂房，但主体建筑尚存。据说，解放后，两座庙均为独树根村公所所占用。大跃进时期烧菩萨后，水产公司用作职工宿舍。后来，北海村以土地与水产公司置换，将庙宇用作修造船厂的车间和办公室。在天后宫的西面，原来还有一座观音庙，后被市淀粉厂拆毁。

据北海村的村民反映，文武庙以前的门联曰：“芳名不朽；遗风犹存。”庙内以前供奉的菩萨，主要有文昌、关帝。一文一武。还有关平和周仓。第二进屋也有对联，但均为灰浆所盖。

天后宫以前的庙门对联曰：“清澄海北；惠溥天南。”该庙以前供奉三尊菩萨，坐正中者是天后，天后两边分别是天妃和清惠夫人。在天后宫的后进屋，在一根

花岗岩的石柱上，刻有“同治四年秋月穀旦立”等字。这说明天后宫和文武庙，很有可能是同治年间兴建的。清同治四年，是1865年。穀旦，即吉利日子。

北海村新的文武庙、天后宫和观音庙

这三座庙，均位于海角路南面的北海村庙宇大院内，距离位于海角路北面的北海村老文武庙和天后宫，约有几百米。庙宇大院的面积约有两亩多。文武庙和天后宫，建在庙宇大院的东北角，约建于1995年。观音庙建在庙宇大院的西北角，约建于2000年。观音庙前，还建有一座八角凉亭，供村民闲聚聊天。在庙宇大院的东南角，建有一座较大的露天戏台。戏台面向天后宫和文武庙，供演庙堂戏用。演庙堂戏时，庙宇大院可容纳观众约二千人。

这三座庙，均坐北朝南，都是小庙。庙宇面阔约五米，深约七米，每座庙的面积约35平方米。庙的前廊均绘有“花开富贵”、“松鹤延年”、“红梅迎春”一类的壁画。

文武庙，供奉关帝和文昌两位菩萨，还有关平和周仓。其庙联曰：“芳名不朽；遗风犹存”。与老文武庙的庙联相同。其门旁，还有一副做诞期时贴的对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眉。”这是称赞关公的对联。

天后宫，供奉天后、天妃和清惠夫人三尊菩萨。其庙联曰：“清澄海北；惠溥天南。”与老天后宫的庙联相同。其门旁，还有一副做诞期时贴的对联：“泽恩浩荡常流海；覃德巍峨独配天。”

文武庙和天后宫的旁边，还有座露天的小土地庙，是以前该村三座土地庙合并一起凑成的。在神台上，有以前三座土地庙的三块神石。这三座土地庙分别叫福安社、福海社、东安社。小土地庙有两副对联。外面一副对联曰：“福寿康宁歌盛世；安居乐业享太平。”里面一副对联曰：“福泽四海；保境平安。”

观音庙，供奉两尊观音，一坐相，一行相。其庙门的对联曰：“慈云永护莲花座；清雨匀沾紫竹林。”该对联的字，是北海书法家唐雄先书写的。其门旁，还有一副做诞期时贴的对联：“紫竹林中施妙法；莲花座下蕴玄机。”这是称赞观

音的对联。

这三座庙，一年有好几个诞期：二月初三为文昌诞，三月二十三为三婆诞，六月二十四为关帝诞。观音诞一年也有好几个：二月十九为观音誕生日，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十一月十九为观音出游日，这几个日子都叫观音诞。该庙宇大院，配有专人管理。

为了酬神祝福，以祈人神同乐，每年村民又集资请戏班演庙堂戏，一年约演一两次。

墓

清末二品将军墓

清末二品将军墓，位于市教育局办公楼往南约 110 米处，西距广东路约 110 米。墓主是清末龙门协水师副将李庆云将军，辞世于民国元年（1912 年）三月上旬。

李将军是广东嘉应州（现在梅州市）人，年轻时跟随大姐做小买卖，后从军，在钦州龙门协水师任职。据 1905 年出版的《北海杂录·职官》载：“龙门协，现任者为李协镇庆云，嘉应州人。衙署向设龙门，每年数月移驻北海。”协镇，即副将，隶属总兵，统理一协之军务。龙门协衙门虽然设在钦州龙门，但李庆云将军每年也有数月，到北海水师行台坐镇，处理海防军务。他还在北海置有房产，开设几间珠宝店，名为“春和堂”。

据说李将军去世半年后才下葬，主要是在这半年内选择墓地、修筑墓园。李将军的棺材共两副。大棺材长约 2.8 米，宽约 2 米。大棺材内又装有小棺材。小棺材是装殓遗体的。小棺材旁的空间，也许是放置陪葬品的。未下葬前，棺材用黄糖、石灰、细沙、青油等物拌匀密封，以防止泄出臭味。据说，李将军的家人曾在十二间屋村的东侧购地 10 亩作为墓园地。

李将军的墓园，座西北朝东南，由坟墓、后土、拴马柱等到三部分组成，用三合土构筑。坟墓的墓圈呈半椭圆形，墓墙前后距离，长约 18 米，宽约 8 米。

墓顶如帽状突起，坟墓前立有一方大墓碑，高 113 公分，宽 128 公分，厚 31

公分。墓碑顶部呈弧圆形。在墓碑两侧，各嵌有半葫芦形的装饰构件。

在墓碑碑额处，横刻有“首世兵”三字，文字走向由右至左。“首世兵”的意思是什么呢？莫非死者是他们家族中首次当兵的？墓碑两侧刻有一副对联：左边上联为：“龙门贻盛绩”；右边下联为：“马鬣喜荣封”。该对联，反映了墓主生前建树功业的地点和因由。

墓碑中间为一正方形石碑，石碑的高、宽均为 80 公分。在正方形的石碑上，直书阴刻七行字，其中石碑两侧阴刻一副对联。左侧上联为：“俎豆千秋鼎盛”；右侧下联为：“佳城万古流芳”。“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的器具，引申为祭祀、崇奉之意。此对联的意思大概是：“子孙后代如果都生活富裕，千秋祭祀一样兴盛；李将军的功业，将在美丽的北海万古流芳”。

石碑的正中阴刻有：“皇清诰授武功将军刚毅庆云李府君之墓。”李庆云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被皇帝授予武功将军，属从二品武官，比正二品官低一级。其官服面前绣有“狮子”图案，官帽饰有珊瑚顶。

在石碑的上联内侧，刻有“新汉民国元年岁次壬子三月上浣吉旦”和“戌山辰兼辛乙”等两行字。第一行文字说死者辞世于民国元年（1912 年）三月上旬某一吉祥日子。“岁次壬子”即农历“壬子”年，“上浣”即上旬，“吉旦”即吉日。第二行“戌山辰兼辛乙”，即表明坟墓的方位朝向：坐西北朝东南。

李将军墓地的选择和朝向，以前是经过国师风水先生确定的。我国古代地理方位表示，有几种方法，其中有：阴阳、五行、四季、五色、左右、八卦、数字、天干地支等，“戌山辰兼辛乙”是采用天干地支法表示地理方位的。

在石碑下联的内侧，又刻有两行字，说明后辈立碑的祭祀人。第一行是：“先逝男锦荣”。“先逝男锦荣”，即是李庆云的儿子李锦荣，因李锦荣死于其父亲李庆云之前，故说是“先逝男”。李庆云除了儿子李锦荣外，还有女儿，但过去重男轻女，女儿的名字不上墓碑。第二行是：“祀孙荣生、荣贵泣立”。单一“荣”字，“生”、“贵”两字并列于“荣”字之下。“祀孙”即祭祀的孙子，李荣生、李荣贵都是李锦荣的儿子。“泣立”，即悲痛地树立墓碑。

墓碑的背面，雕饰有双层圆圈，大圆圈内有小圆圈。大圆圈直径70公分，小圆圈直径46公分。

墓碑后面，是墓穴封顶，分两层圆台，高约80公分，其中上层高约26公分。上层圆台直径153公分，下层圆台直径约360公分。

坟墓四周建有圆形墓墙。在坟墓的后墙，又雕饰有一双套圈、大小圆圈相套。大圆圈直径40公分，小圆圈直径31公分。坟墓后墙的双圈雕饰，与墓碑后的双圈雕饰相对应。也不知其用意如何。

坟墓的后面墓墙高约40公分。后面墓墙外还建有矮墙。高矮墙之间留有小排水沟。

墓碑前建有四级拜台。拜台一级比一级低落，一级比一级宽阔。这可能与等级辈份拜祭位置有关。后辈份的人多，站在下级拜台拜祭，需要位置要宽阔一些。墓碑前的四级拜台长约13米。近墓碑的第一级拜台宽约5米，上筑有宽约1.5米的供放置祭品的小平台；第二级拜台宽约6.5米；第三级拜台宽约9米；第四级拜台宽约10.5米。在三、四级拜台之间，两边各建有一小截矮墙，矮墙相对处，各砌有一台墩。据说，以前在这两个台墩上，曾放置有一对石狮子，现已无存。

墓前两侧建有一对“拴马柱”，“拴马柱”离坟墓的前墓墙约有16米。拴马柱是供扫墓人拴马用的，以前有钱人家去扫墓，大多都是骑马的。“拴马柱”高1.7米，四方形，一面宽16.5公分，另一面宽18.5公分，花岗岩石质。拴马柱树立在一团馒头状的三合土的土墩上，其直径约1.8米。

在两根“拴马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东北这根“拴马柱”阴刻上联为：“忠骨瘞佳城，山川增色，绩著清邦，此日已骑鲸去”；西南这根“拴马柱”阴刻下联为：“将才居绣壤，草木知兵，形归吉穴，他年应化鹤来。”瘞，音意，埋尸体或随葬物。拴马柱上刻的这副挽联，对得还算工整、贴切，意蕴不错。

李将军坟墓后面，相距约16米，是该墓的“后土”。“后土”，即坟墓的土地神。“后土”呈长圆形，长8米，宽6米，“后土”有墓碑及拜台两部分。“后土”

石碑高 90 公分，宽 60 公分。石碑上阴刻有：“本山后土龙神位”等字，在“本”字两旁，刻有“李”和“姓”两字，即注明是李家坟墓的后土龙神位。拜台有两级。后土墓碑两侧，建有高约 90 公分高的墓墙。

过去，在婚配上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据说，二品官李庆云，也与同时代的钦州名将刘永福、冯子材有姻亲。刘永福的干女儿嫁给李庆云的儿子，冯子材的儿子娶李庆云的女儿。在刘永福的公馆“三宣堂”内，悬挂有额匾“建威第”，可见刘永福是建威将军。而冯子材，曾被诰授荣禄大夫建威将军。这两位建威将军都是正一品武官，相当于内阁大臣。

李将军去世后，据传李府曾雇请专人，在李将军的墓园早晚烧香照料。

我国历代盗墓风行。李将军的坟墓也难幸免。据说，于 1990 年 1 月 14 日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将军及其梁三夫人的坟墓，均遭到盗墓贼的洗劫。李将军的后人，后来曾沿着坟墓的盗洞深入到李将军的墓室查看，随葬品已被劫掠，只剩下两副棺木及先人的骸骨。

李将军是外乡人，以二品官的身份埋葬于北海，其规格之高，实属少见。该墓园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清末二品夫人墓

清末二品夫人墓，位于李庆云将军坟墓西北约 30 米处，北距北海市教育局办公大楼约 80 米，西距广东路约 100 米。用三合土构筑。

该墓主是清末二品官李庆云将军的第三夫人，死于民国二年（1913 年），即是李将军去世后的第二年。

二品夫人墓，由坟墓和后土两部分构成。坟墓的墓圈呈半椭圆形，座西北朝东南，坟的朝向与其丈夫李将军墓朝向一致。坟墓的墓圈前后长约 11 米，宽约 7 米。墓穴封顶呈马鞍形。坟墓封顶的前面，立有一石刻墓碑。碑高 90 公分，宽 60 公分。在墓碑左右，各嵌有半葫芦形的三合土装饰构件。

该墓的石碑上，阴刻有四行碑文。中间这行是：“前清诰授二品夫人显祖妣梁三夫人之墓”，表明墓主的身份。因墓主死于民国，是清朝诰封的二品夫人，

故称“前清诰授二品夫人”。

诰授，亦即诰封，根据明、清两代对官员及其先代和妻室授予封典的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员用皇帝的命令授予，称为诰封。五品以下的官员用敕命授予，称为敕封。“显”，即对已去世的人的美称，“妣”，是已故的母亲。“显祖妣”是对已去世祖母的美称。“梁三夫人”即墓主姓梁，排行第三的夫人。墓主的丈夫生前有五位妻子，前两位妻子没有男孩生育，只有第三位妻子生有男儿李锦荣，故第三位妻子被立为正房。皇帝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诰封时，只授予第三妻室为二品夫人。

墓碑的左边，刻有“中华民国二年五月中澣吉旦”，表明墓主去世的日期，即去世于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中旬某吉祥日子。“中澣”即“中浣”，一月之中旬。唐代制度，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沐一次，浣，即洗也。后来因此沿习称每月的上、中、下旬为上、中、下浣。吉旦，即吉日。

墓碑的右边，刻有两行字，靠近中间的这行是：“先逝嫡男李锦荣”，因亲生子李锦荣死于其母亲梁三夫人之前，故曰“先逝嫡男”。第二行字为：“祀孙荣生、荣贵跪立”。表明立碑祭祀人为墓主的孙子李荣生、李荣贵。

梁三夫人墓有三层级拜台，墓碑前建有一宽约90公分供放置祭品的小平台。

坟墓后约8米处，有该坟的后土。后土有二级拜台，拜台宽约3米。后土石碑高60公分，宽30公分。碑石刻有两行直书碑文，中间一行为：“本山后土龙神位”，其右侧一行为“李氏立”。碑石两边筑有一高60公分的墓墙抱着前级拜台。

虽然“清末二品夫人墓”的规模，稍比“清末二品将军墓”小，但也不失为一处具有人文价值的墓葬。二品夫人墓与二品将军墓相距不远，古色古香，已构成了一处人文景观。

皇恩仕郎安人墓

清同治年间二次葬的仕郎、安人墓，是座夫妻合葬墓。位于高德镇横路山村的东北方，西距横路山小学约1.5公里。该墓坐东朝西。墓前立有一方墓碑。墓

碑前，有用三合土筑成的拜台及有石香炉。墓前方的两旁，立有两根栓马柱。

该墓碑高 106 公分，宽 62 公分，厚 12 公分。墓碑两旁，用三合土筑有半葫芦形的护碑装饰构件。

墓碑上，刻有三行直书碑文。分别标明下葬时间、墓主身份及祭祀立碑人。左边一行标明了下葬的时间：“同治庚午季春中浣吉旦”。即同治九年（1870 年）三月中旬吉日。

中间一行标明墓主的身份：皇恩仕郎安人耆寿有三显考护厚陈妣俭顺洪太府君孺人墓。这行碑文，承蒙皇帝恩泽的“仕郎”与“安人”两行字，并列于“皇恩”两字之下。“考护厚陈”与“妣俭顺洪”两行字，并列在“显”字之下，“太”字之上。“府君”与“孺人”两行字，并列在“太”字之下，“墓”字之上。

该墓为夫妻合葬墓，男的有“仕郎”官阶。据《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常识》关于“清代文武官阶简表”载，文官有“征仕郎”及“登仕郎”，却未见列有“仕郎”这个官阶。“征仕郎”为从七品官，“登仕郎”为正九品官。

女的封为“安人”。据《辞海》载，“安人”，明清时为六品官之妻的封号。按照明清的封典制度，妻子封六品，丈夫也应是六品官，那么“仕郎”也应是六品官。但找不到“仕郎”是六品官的出处。是不是刻墓碑时搞错，将“侍郎”刻为“仕郎”呢？看来也不可能，因明清时代“侍郎”的官阶为正二品官，正二品官妻子的封号不会是六品“安人”的。

“耆寿有三显”是什么意思呢？古称六十岁为耆，“耆寿有三”，即是死者寿年为六十三岁。“显”是对已逝者的美称，“显考”是对去世父亲的美称，“显妣”是对去世母亲的美称。“显考护厚”，即去世的父亲为人宽厚；“显妣俭顺”，即去世的母亲勤俭温顺。“陈太府君墓”，“陈”是去世父亲的姓，“太”是对辈分高或身份高的人的一种尊称，“府君”，是旧时子孙对其先世的敬称。“洪太孺人墓”，“洪”是去世母亲的姓，“孺人”，旧时通用为妇人的尊称。孺人，也有说是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等。但在这里，孺人应是妇人的尊称，因前面已有“安人”的封号了。

右边一行碑文标明祭祀立碑人的称谓。有子、孙、曾孙的名字：“祀男陈家（行、泰、吉）孙克（渊、从、生、湘、材、嵩、参、清）曾孙（可、所、以、静、定）培跪立”等字。儿子“家”字辈，“家行”、“家泰”、“家吉”三个儿子，只写一个“家”字。“家”字之下，“行”、“泰”、“吉”三字并列。孙子“克”字辈，分两行，“克渊”、“克从”、“克生”等只写一个“克”字，“渊”、“从”、“生”以及“湘”、“材”、“嵩”、“参”、“清”等并列。曾孙“培”字辈，“可培”、“以培”、“所培”等，只写一个“培”字，“培”字之上，有“可”、“所”、“以”、“静”、“定”等字并列。

栓马柱，是祭奠人用于栓马的，也有装饰墓园，提升墓主身份的作用。位于墓前两边的栓马柱，距墓的墓圈约有 28 米，两根栓马柱之间的距离约 20 米。花岗岩凿成的栓马柱，高出地面 158 公分。栓马柱呈四方形，一面宽 18.5 公分，另一面宽 14 公分。栓马柱筑立在一直径约 70 公分的三合土的土墩上。

在两根栓马柱上，均阴刻有对联。左边这根栓马柱刻有上联为：“龙迴顾祖千年成，水聚山明真毓香；”右边这根栓马柱刻的下联为：“虎抱联峰百世兴，龙幡虎踞实钟灵。”这副对联在字、词、句等对仗方面还算不错。但在平仄声处理方面，该上联最后一字应“仄”声，今已成“平”声字“香”，有违于上（联）仄，下（联）平的对联声调规律。

这座仕郎、安人墓，是那方人士的呢？是横路山村人士的。我在横路山村一间破旧老屋的神位牌上，见到一方神主牌上木刻有：“皇恩仕郎、安人耆寿有三显……”等金粉字。这与该墓碑的墓主身份是相同的。

皇清国学生墓

该墓位于高德镇横路山砖厂的东边，距砖厂约 200 米。墓坐西朝东，面对西村港。墓圈长圆形，东西长约 17 米，南北宽约 6 米。墓圈周围用三合土砌有半圆形的低矮墓墙。圈内用三合土构筑三级拜台。有三座坟墓平列。每座坟均立有石碑。石碑两旁用三合土筑有半葫芦形的护碑墙。每块墓碑均高 116 公分，宽 66 公分，厚 9 公分。坟墓前两旁，立有两根栓马柱，栓马柱距离墓圈约有 8 米。

从三块墓碑的碑文看，中间这座墓主人是皇清国学生，其左边这座坟为皇清国学生的妻子，其右边这座坟为皇清国学生的妾（小老婆）。

中间这块墓碑上，刻有三行碑文。中间这行阴刻有：“皇清国学生陈太晚公之墓。”左边这行应刻有下葬的日期，因该墓左右两边的妻、妾碑文，均刻有“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吉旦”等字，故中间这块碑文便省去下葬日期。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岁次戊申吉旦”，即农历戊申年吉日。

“皇清国学生”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大清国子监的监生。皇清，即大清。皇者，大也。国子监，简称“国学”，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能选入国子监读书的，都是官僚贵族子弟。国子监可称作是贵族学校。凡有入监读书资格的，称为监生。监生的获得，有几种途径：一是皇帝特许，一是地方保送，一是捐纳而得，一是凭借上代余荫得官的资格而获得。有些监生，作为出身，都不一定在监读书而给予一定的官职。监生的官职有多大呢？可从他妻子的封号中可知。“陈太晚公”是什么意思呢？“陈”是死者的姓，“太”是对身份高或辈分高的人的尊称，“晚公”是死者孙子对死者的称呼。

该墓碑右边两行碑文，都是祭祀立碑人的名字：一是“灰世男克鹏”，一是“祀男克（孚、雍、忠、雄）孙（左、以、佑、逗、俱、汝、造、万、彩、果）培跪立。”“灰世男克鹏”，是墓主的儿子陈克鹏，因陈克鹏比父亲死得早，故称“灰世男”。另一行祀男“克”字辈的有“克孚”、“克雍”、“克忠”、“克雄”，墓碑只刻一个“克”字，“克”字下有孚、雍、忠、雄等字并列。墓主的孙子是“培”字辈，称“左培”、“以培”、“佑培”等，故在“培”之上列有左、以、佑等字。“跪立”，“跪”，即后辈立碑人对先人的孝敬之辞。“立”，即是树立墓碑。

陈晚公妻子的墓碑，刻有四行碑文，左边一行为下葬的时间：“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吉旦”。中间这行碑文为墓主：“皇清安人耆寿有六勤慎陈母郭李孺人墓”。“安人”，明清时为六品官之妻的封号。“耆寿有六”，即终寿六十三岁。“勤慎陈母”，即勤俭慎重的陈家人的母亲，死者的儿子称死者为母亲。“郭李”，是陈母的姓（复姓）。孺人，即对妇人的尊称。右边两行字为：“先逝男克鹏”和“祀

男陈克（孚、雍、忠、雄）孙（左、以、佑、逗、俱、汝、造、万、彩、果）培跪立”。“先逝男”与“厌世男”意思相同。

陈晚公妾的墓碑只刻有三行碑文。左边一行是下葬的时间，与陈母郭李碑文相同。中间这行为“皇清庶母耆寿顺直陈太母姚孺人之墓”。“庶母”，是子女称父亲的妾。“耆寿”，即寿年六十岁。“顺直”是“温顺正直”。“姚”是死者的姓。

“顺直陈太母姚”，即陈家太母姓姚，生前温顺正直。右边这行是祭祀人立碑人的碑文，基本与陈母郭李的碑文相同，只少了“先逝男克鹏”，因先去世的陈克鹏是大婆陈母郭李生的，故庶母这边碑文便省去了。

墓前的栓马柱，离地面高160公分，石柱四方形，一面宽18公分，另一面宽14公分。两根栓马柱均阴刻有对联。东北这跟栓马柱刻上联：“双凤朝阳，聚气藏风皆盛代，郁孚一手，固收千红水；”东南这根栓马柱刻下联曰：“一龙纳甲，明山秀水俱流芳，美矣三胎，脱嫩万里山。”这副对联对仗非常工整，含义也好，不失为一副墓园佳联。

皇清国学生三人墓，是横路山村人葬的。我在横路山村一座老屋的神位牌上，见到一木刻神主牌，刻有与这墓碑碑文相同的先人身份：“皇清国学生耆寿和厚君陈晚公……”和“皇清例赠耆寿有六庄顺显妣郭李孺人……”等。上述这些神主牌位，并与“皇恩仕郎、安人耆寿有三显……”等神主牌位在一起，可见“仕郎、安人”应是“皇清国学生”的先辈。他们都是同一家族的。

“皇清国学生墓”和“皇恩仕郎安人墓”，都是晚清墓，虽然规格和官职不算高，但在北海地区亦不多见。

在横路山村的周围，现在还散落有几座明代墓葬，在横路山村村内，尚存在有明代风格的木构老屋。面阔三间、进深三楹的老屋旁，还残留有不少石板、石条、石柱等古构件和古树。由此可见，这间明清老屋，当属以前的大户人家。

横路山村，是条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村庄。这些古墓葬及老屋等历史陈迹，对研究乡村发展史、民俗史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皇清待赠墓

皇清待赠墓，位于南康圩东北方约7公里的“下担村”东头。是一座颇有气派的三人合葬墓。用三合土构筑。

该墓坐西朝东，面对铁山港。其墓圈前后长约10多米，外圈砌有半圆形的墓墙，墓圈内砌有拜台。

这座古墓墓圈内，平列有三座坟墓，应当是二次葬的。均是清乾隆年间下葬。其中一座墓立碑于乾隆庚辰年，即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一座墓立碑于乾隆丙申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一座墓立碑于乾隆甲寅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墓碑上的碑文，因年代久远，已残缺不清，较为容易认出的字有：“皇清待赠……”等字。“皇清待赠……”即是去世于清代的先人，还有待皇帝赠予荣典。“皇清”，即大清。

按清代的封典制度，皇帝给予官员封典，官员本身称为“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妻室，存者称为“封”，已死的称为“赠”。上面这座古墓，墓碑上有“皇清待赠……”几字，看来这三人合葬墓应是比较有权势的人家所葬。“待赠”，即是将要按家人不同的官阶对死者赠予一定的荣典。我曾在横路山村一间破旧老屋的神位中，看到姓陈人家的一座神主牌，上面写有“皇清待赠……”等字。这座“皇清待赠”墓，是不是横路村姓陈人家的，还未详尽考究。

明末曹大公墓

庙山的曹大公墓，位于高德庙南侧约350米处。坟墓坐北向南。墓碑高120公分，宽60公分，厚15公分。墓碑顶呈半圆形，是明代墓葬的标志。

墓碑上刻有“□□德庄显政功曹大公”等字，前头两字已模糊不清，用□□表示。这位曹大公显然姓曹，名德庄，可能是一位有地位、有名声、有政绩的知名人士。该墓葬于明末崇祯乙亥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听说墓主是军屯村的大户人家。简历不详。

据传，该墓初葬时，墓地选在今“高德庙”址处。很多风水先生都看中这个地方，认为是白马地。但下葬时，发现挖开的墓穴中滚出一个香炉，而且风雨突

来。墓主家人认为，这可能是神灵不许葬于此地的暗示。于是，在离墓穴南侧约350米处另行安葬。

2000年前后，该墓地因邻近北海二级公路，墓地周围被征用作汽车维修厂，该墓迁走。

园

瑞园

瑞园，位于北海市政府大院东边，解放前是北海豪绅、五区区长刘瑞图的私家住宅。今为市妇联、市共青团和市党史办等三个单位的办公场所。

瑞园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一长方形、三层楼、四合院式的建筑。长38米，宽18米，建筑面积为548平方米。中间有一长10米、宽6米的长方形天井。天井四周的三层回廊均为卷廊式结构，墙体及门框均有雕饰线，具有西式建筑风格。该建筑以中间天井，营造明亮通透的空间，底层又似四合院式，故又具有中国建筑的特色。

瑞园这幢建筑，具有如下特点：

1. 是解放前北海近现代富有代表性的豪绅私家住宅。解放前，北海有瑞园、桂园、柏园、梅园、黑楼、吴家园等知名豪绅私家住宅，这些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所剩不多。瑞园算是保存较好的一幢，是北海近现代豪绅私家住宅的历史见证。

2. 是北海近现代建筑技艺的见证。瑞园这幢建筑，为北海著名的建筑师衡兴隆设计建造的，该建筑在体现北海近现代建筑技艺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 造型优美，环境清幽。瑞园以中西结合的组群布局，产生多层次，大深度的序列空间。其空间艺术、视觉艺术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其周围有古树名木衬映，环境优美。

2004年3月24日，北海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梅园

梅园，位于中山东路204号。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南北长约40米，东

西宽约 20 米。该园建于民国 1912 年至 1913 年间，园主是梅弼如，广东省台山县人。清末民初，梅弼如曾任广东海军的管带（即舰长），常随军舰到北海驻泊，后在北海购地建私家庭园。

在梅园内，建有一组中西合璧的仿四合院建筑，即在一 60 多平方米的天井前后，建有两幢两层小洋楼。在天井两侧，又建有书房，小屋等。两幢楼房的建筑面积，约 500 多平方米，建筑风格中式西式均有。园内还植有一些名贵花木。梅园门前，以前挂有“梅福庆堂”匾牌，彰显了大户人家的风范。

梅弼如年青时，曾随父母在新加坡生活，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8 岁时离开新加坡回国，先后在香港英国军舰和广东海军服役，在轮机、驾驶、枪械等技术方面比较精通。

曾任广东海军“广金”、“宝璧”、“保民”等军舰的舰长。经常驻泊北海和在北海至越南的洋面巡航。

《北海杂录·职官》曾有一段有关“广金”兵轮的记载：“广金、安澜兵轮，派巡廉属洋面一带，无事则驻泊北海口岸，以资镇守。凡廉钦属兵饷，多借该轮由省运到。”

梅弼如去世于 1926 年，终年 62 岁。墓碑上刻有“弼如梅府君之墓”等碑文。梅园，是外地军官在北海建造的遗存不多的一处私家庭园。

柏园

柏园，位于文明里一小巷内，门牌为 105（旧牌 101）号。占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园内建有一座两层小洋楼，建筑面积约 800 平方米。还建有一些杂物房。在较为宽阔的私家庭园内，花木映衬，环境较清幽。

该庭园约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据说是地主林绍生所建的。该园的小洋楼，呈正方形，楼房四边均约 20 米。二楼中间开有一东西走向、宽约 4 米的通道，以便通风透光。在该楼南北向的窗户顶上，均安装有用钢筋水泥建成的遮荫挡雨的窗棚。这种装置在北海并不多见。

柏园的大门建在庭园的东南侧。大门顶上，雕有一幅约 40 公分直径的八卦

图，八卦图雕塑呈八角形。在八卦图雕塑两旁，各雕有一朵盛开的花蕾，使大门显得比较神秘和讲究。

柏园，解放前曾是有钱人家的私人住宅。解放后，一度作为北海中学的教师宿舍，现已成危房。

桂园

桂园，位于朝阳里24号，约建于20世纪20年代。据说是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合浦白沙人）在北海所建的私家庭园。以前，园内生长有两棵百年以上的大桂树，桂园也许因此而命名。

该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坐北向南。以前，前门的门楼两旁有小屋。园内建有一幢二层小洋楼，在小洋楼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一排西式平房。西式平房有回廊、有拱形大开窗，门口有多级台阶。东面西式平房一般用作客房、书房等用。西面西式平房一般作厨房、雇员宿舍用。另外，还在后园建有些杂物房。在宽阔的园内，种植有含笑、杨桃等花草树木，环境清幽、恬静。

于1927年前后，北海市政筹备处，曾设在“桂园”办公。1938年11月，中共广东省派特派员周楠来合浦，曾在“桂园”召开了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多人，选出了中共合浦县工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领导机构，是中共合浦县工委成立的旧址。

解放后，桂园一度作为市政府的宿舍，后来落实政策归还沈载和的后人。约于1999年，卖给北海海关。“桂园”因年久失修，北海海关将其拆除新建海关宿舍。

除了以上瑞园、桂园、柏园、梅园之外，北海还有好几处私家庭园：

“邓园”。位于朝阳里今市政府宿舍大院东面。园主邓世增，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广东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原籍南康，是本地的官僚地主。

“吴家园”。位于北部湾路与文明南路交汇处的西北方，今市二医院内。园主是北海富商吴炳荣，“胜隆庄”的经理，曾是北海商会会长。其园门有对联曰：“吴本金陵称胜地；家居浦海建芳园。”

“东方园”。位于北部湾中路与文明北路交汇处的东北方，北海中学的西南角，园主为苏东舫。东方园以前园门有副对联曰：“东箭南金成伟器；方言国语亦经纶。”

“柏香园”。位于文明北路一处机修工场。园主是广府商人“均隆”老板谭某。其园门有副对联曰：“人海此藏身，半亩初开聊种菜；园林堪涉趣，四时不断喜栽花。”

“大有花园”。位于中山东路正对着的海关路口处。园主李大有，以前是茶楼酒店老板，经营花园茶座。其园门有对联曰“大可评花消永日；有闲把酒问青天。”

“孙早园”。位于四川北路与中山西路交汇西南处。已毁。园主陈子秀，其园门前以前有棵百年酸枣树，有人称该园为酸枣园。该园有副对联曰：“孙贤绳祖武；早起惜春华。”

“振园”。位于北部湾路与文明南路交汇西南处，即市电机厂内，园主吴家振。其园门以前有副对联曰：“振奋在精神，漫诩箕裘能继武；园林得幽胜，好倾樽酒共论文。”

“麦园”。解放前某归侨所建，位于北部湾路与文明南路交汇处的西北方，今市二医院内。

亭

北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亭

该纪念亭位于解放广场东侧，原在中山公园内，1999年冬辟建解放广场时，该亭纳入解放广场内。该亭建成于1946年元旦，是北海人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集资兴建的。

与纪念亭同时建成的还有一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纪念碑在纪念亭的南面，与纪念亭相隔不远。可惜这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该碑上题有“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几个大字，原是国民党蒋介石高级将领张发奎（曾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职）题写的，当时

被认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树碑立传，故在当时政治运动中被毁掉。该纪念碑为长方体，高7.7米，象征“七·七”事变的抗日战争，其四周筑有铁链相围。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亭”，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被毁，只是该亭座四周的石碑上有些涉及到刘瑞图（解放初被定为官僚、地主恶霸）的碑文受到破坏，四块石碑当时均被灰浆所覆盖。

该亭呈八角形，由亭的底座、亭身及亭顶三部分构成，高约10米。亭的底座直径约8米，高约1米，有五级步阶从四面上落。该亭身，由八条方柱在亭底座与亭顶之间连接支撑，高约7米，形成八面敞开的空间。在亭中四周，建有供人闲坐的围栏长凳和走廊。亭顶平沿呈八角形、中部隆起，似八角形的帽状，“帽顶”冠以榄核形的尖顶。

该亭是由北海著名建筑商陈兆衡承建的。纪念亭的四周，花木苍翠，环境清幽。

在该亭底座的四周，镶嵌有四块石碑，每块石碑长1.8米、高0.4米。石碑上镌刻有“北海抗战史略”一文，记述当年北海抗日战争的部分史实。

在解放广场修建时，2000年1月13日，我和市文物管理所的同事朱谦，到该亭考察碑文，作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调研工作。为了将碑文记录下来，我们先请工人用电飞轮将四块石碑上的一层灰浆磨掉，然后，我们再用竹木片小心清除碑文中的灰浆，再将镌刻石碑上的“北海抗战史略”一文整理出来。当时我读碑文，朱谦作记录。记录本用方格纸，按碑文直排每行七字填记。如有难辨文字，则留下空格待后考证校补。有时，两人又一起琢磨商讨。

“北海抗战史略”碑文，文字直排，阴刻，无标点，繁体字，每行七个字，有少部分字已看不清。全文不足1,000字。该碑文记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时间，北海军民抗战的史实。着重记述1939年日军攻击冠头岭、地角炮台的北海保卫战、1941年3月日军占领北海一星期奸淫劫掠的暴行，以及1944年冬日军战略撤退经过合浦、北海等地有关史实。该文所载北海抗战史实，大体都较简略清楚。

由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亭”，是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建的，在其亭底座四周的石碑上，又镌刻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北海抗战史略”一文，所以该亭不失为一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2004年3月24日，北海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该碑文有些记述与史实不符：

1. 记述的时间不够准确，与史实不符。如民国二十八年冬（1939年11月14日）日本军舰轰击地角炮台，碑文却写在民国二十九年季秋（季秋，秋季最末一个月，即农历九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钦县（今钦州市）沦陷，碑文却写在民国二十九年仲冬（仲冬，冬季第二个月，即农历十一月）钦县沦陷；日军溃退经过合浦、北海，是民国三十三年冬或三十四年春（1944年冬至1945年春），碑文却写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季冬。此外，碑文在记述地理方位上，也有搞错的，如将珠海西路的“贞泰号”商铺，说在珠海中路。

2. 在1939年11月北海保卫战中，碑文说刘瑞图“奉行焦土工作指挥执行，防军175师则派员在珠海中路“贞泰号”准备起火，即被制止”，将在关键时刻反对举火烧毁北海的功劳归于刘瑞图的身上，这与史实不符，功劳应归于驻军175师524团团长巢威。

这在《广西文史资料》22辑巢威团长在《桂南之战的回忆》一文中记述：“……在情况紧急之际，李营长、刘区长、黄镇长、工兵排长都认为时机紧迫，请求我下达破坏北海市的命令，希望从速达成任务，好及早撤退。同时，武利秦副师长和邓专员纷纷来电询问战况，并指示不失时机实施北海之破坏。当时我认为，破坏容易建设难，北海市是数百年和无数血汗建起来的，如果经我手彻底破坏了，将来不知几多人失掉生活依靠，造成的困难是难以设想的，我的臭名也会千百年留在北海人民的心中……经再三考虑，决定保留北海，不实施破坏。”当事人这段记述，说明巢威团长不执行“未抑寇先残民”的消极焦土抗战政策，在关键时刻反对举火烧毁北海的，应是巢威团长，而不是刘瑞图。

此外，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六日，钦廉守备司令部制订实施的“坚

壁清野实施办法纲要”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应予破坏之建筑及其破坏之时机，由当地最高军事指挥长官以命令定之。”而巢威团长，是当时北海最高军事指挥长官，故轮不到刘瑞图在关键时刻决定是否举火烧毁北海。所以，在关键时刻反对举火烧毁北海的，应是巢威团长。

3. 《北海抗战史略》碑文，没有署撰写碑文的单位或作者名，也不署碑文的撰写时间，这显然是个欠缺。据黄家蕃先生考证，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亭的碑文，原是北海前清秀才劳谦五撰写的，碑文名为《北海抗日事迹碑》。因不合北海权势人物刘瑞图的口味，后来，很可能叫刘瑞图的私人幕僚李宝珊重写，或将劳谦五撰写的碑文篡改而成《北海抗战史略》一文的。故碑文多有褒扬刘瑞图之处。碑文也没署撰写碑文的单位或作者名，也不署碑文的撰写时间。碑文末尾，只写承建员陈兆衡。作为建筑商，陈兆衡当然乐而为之。

4. 有些文字表达欠当，有些句子过渡略显生硬。如民国二十八年，只写“民二十八年”，是民运二十八年还是民主二十八年？飞机掩护，只写“机掩护”，是机枪掩护还是机船掩护？这样过简的文字，表达是欠清楚的。再有，在“旋以【察】我将有大军来援，敌乃自退，方【撤】登陆本市也。”与“纵兵【更】迭、焚劫奸杀，无所不为”这两句文字之间，句与句的过渡略显生硬，应加一转折词“然”，以表示上下句之间的转折过渡。

5. 碑文忽略记述部分北海抗战重大事件。如“中野顺三”事件、日本飞机轰炸“大水沟惨案”、台湾兵与涠洲岛群众“光复涠洲”事件等。之所以忽略记述这些事件，很可能与作者当时的政治观点有关。

《北海抗战史略》碑文，有少部分文字已被破坏，我试将一些缺损文字校补，不敢说全对。有【】符号内的文字，是我校补上去的。有些未能核实的缺损字，空出字位在【】符号内。

根据什么校补缺损字呢？主要根据手头掌握的史料和对上下文意的推断。如“惟于三十年三月【三】日，适此两日海岸远近大雾，目前潜形，忽有敌【舰六】艘”这几句，为何填上“三”字和“舰六”等三个字呢？主要根据《北海港史》

一书 170 页，关于日寇于 1931 年 3 月 3 日登陆北海的记载：“三月三日凌晨二时，日军派来航空母舰 1 艘，驱逐舰 5 艘……偷袭北海港，分三路登陆”等记载而校补的。为何有个别字又留空不校补呢？主要是未找到历史依据。如“旋奉【】元戎电令”，这句的元戎是谁呢？是钦廉守备司令部长官莫树杰的“莫”元戎，或是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邓世增的“邓”元戎，抑或是驻军 175 师师长冯璜的“冯”元戎呢？都查不出，故只好空缺不填，而不滥竽充数。

现将《北海抗战史略》碑文抄录如下。因原碑文直行、无标点，为便于阅读，今作横排、加标点、分段落、用简体字。

北海抗战史略

自“九·一八”后，倭寇日深，人人敌忾，神圣抗战，国家总动员相继而出。所有华北、华中、华南各志士，或散出以游击，或相助以巷战，以创敌而卫社稷。献身而为国殇者，亦不乏其人。况有任守土之责者哉！其时战云所布，又遍及海山陬。我北海一方为通商口岸，自不能无事也。

民二十八年，以相邻涠洲岛既陷，本市告急，人心惶惶，混入战时状态。为减弱目标，扫清射的起见，将地方所有碉堡一律拆卸，并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计划。随发燃料煤油【一】千罐，并征集导火物禾秆五万斤，备必时之需。如矢在弦，一触即发矣！

至二十九年季秋，有敌舰麇集冠头岭海面，先驶二乘，机掩护指示目标，鸣炮三十余发，轰击地角炮台。是夜七时许，敌舰集中八艘，有敌兵百余，分乘橡皮艇向王龙岩海岸登陆。当时情势紧张，北海区长【刘瑞图】兼支队长，奉命焦土工作，指挥执行。防军一七五师，则派员在珠海中路“贞泰号”准备起火，即被制止。【令】待午夜十时后，【如】有敌舰运输舰集中，【方予】执行。届时，敌舰无增，登陆敌兵反被击退，卒保全北海不致为烬，此亦不幸之幸也！

二十九年仲冬，钦县沦陷，北海市与有唇齿相关。市中所有教育界及知识青年，奋起集中，组织学生队，由【刘】兼支队长指挥，枕戈待命，保卫北海。

至闻钦县敌兵，欲向合浦乌家进攻，时【刘】奉命，将北海各军粮仓储米尽

【将】焚毁，及将全市【建筑破坏。刘】兼支【队长吩咐】学生队及警察，待敌兵【缓】冲，至乌家后绕行，【焚城】权暂停止。结果乌家安稳，本市亦【得】保存，尚不沦为【毁】天。且借【此】惊，【抗战、保城，刘兼重为】是。

厥后，防军调去，自卫队接防，仍本着抗战精神以卫北海。虽领空中时有敌机来袭，自炸地角炮台及高德七星桥后，复炸北【海英】国煤油局及【洋关】、公馆、商会、【民房街道等】，全市【均】设有警钟及嘹望【哨，有】警先报人民【以躲】其锋，即投弹几许亦不得逞。在海港方面，则早暮时间有一二橡皮艇恃蛮驶入，守军【抗击】于外沙，以机关枪扫射之，敌亦回枪而后踉跄以遁。

惟于三十年三月【三】日，适此两日海岸远近大雾，目前潜形，忽有敌【舰六】艘，载马步敌【兵】千余，乘鸡鸣时已登陆，守军仓促应战不利，乃作军事上之暂退。本市竟沦陷七日。旋以【察】我将有大军来援，敌乃自退，方【撤】登陆本市也。纵兵【更】迭、焚劫奸杀，无所不为。于敌已【撤】也，各【守军】、及警察、【乡】镇、机关，即维持治安。查有前为敌【向】导及通敌、奸抢等不法者，均【处重刑】，以昭炯戒。

至三十二年季冬，又忽有邕败退敌【日军】数百，窜来本市。【其】状疲敝。越日，即【东】向南康退走。【如埋】有伏击【奇兵】，有望擒其兵【将矣】。【料】此时敌寇南【进重挫，军士】气已成【弩末】，我国各地预作反攻之国军，已精神满腹，即使无两颗原子弹之【轰日】，亦望气而知敌寇之全军皆墨矣。乃竟于三十四年九月一日，最后胜利归于吾国吾民，良有以也！

承建员 陈兆衡

井

接龙桥双水井

接龙桥双水井位于珠海东路112号门牌的对面空地，此地原名接龙桥，井因桥而得名。据说此井原为北海一姓庞的家族所开发。据庞家的后人说，该井建于清中期，已有200年的历史。

两口井南北排列，相距约3米。北面这口井呈八角形，每边长约70公分，

现在井口已被封堵一部分，但水源尚充盈。南面这口井呈六角形，与北面这口水井相似。两口井的井口均用花岗岩石砌建，水井内壁用青砖砌建。

据庞家后人讲，双水井以前均装有双吊桶打水，并用水槽将打出的水流往海边，卖给出海谋生的船家人。据庞家后人庞宝成说，其先辈曾说过，此双水井的井底，曾埋有花岗岩的石碑，该石碑可能刻有该井建造的具体时间和有关情况。

双水井周围场地，南北长约 10 米，东西宽约 8 米，有用花岗岩砌建的 12 级台阶，由双水井通上珠海路，并在出口处建有一水井牌坊。

2004 年 3 月 24 日，北海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观音堂双水井

位于和平路西端。此井解放前曾邻近观音堂，故称观音堂双水井。此井又因有所谓圣人在上，甘露降而醴泉出的古训，故又名甘露井。甘露井由两口水井构成，两口水井相距 2 米多，故名双水井。

甘露井始建于何年不详，重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4 月，井深数米，水井内壁用青砖砌建，井面由三合土构筑，井口用条石铺砌。在甘露井北边数米的墙根上，镶有三块碑石，中间一块碑石竖立，阴刻有“龙泉井之神位”六字，石碑前有一香炉，是当地群众供奉之井神。左右两边的碑石横立，长约 80 公分，高约 33 公分。左边这块碑石阴刻有“重修甘露井记”碑文，约 300 多字，记述该井修建之缘由，是光绪十三年（1887 年）由地方文人陈濬业撰写的。右边这块碑石阴刻有重建甘露井捐款人的芳名。

双水井的两口井南北排列。北面这口水井呈六角形，每边长约 90 公分。南面这口井呈八角形，每边长约 60 公分。每口井都有一石条架设于井中间，将水井分为两半，以利于担水人吊桶取水。

为何“观音堂双水井”和“接龙桥双水井”一样，都开有六角形和八角形的双水井呢？是不是想以“六”和“八”的谐音来取好意头呢？即“六”，有福“禄”的内涵；“八”，有“发”财的内涵。为何两处井的南北两口井的形状都截然不同呢？即“观音堂双水井”的北面这口井为六角形，而“接龙桥双水井”的北面这

口井为八角形；“观音堂双水井”的南面这口井为八角形，而“接龙桥双水井”的南面这口井为六角形。它们的深层用意是什么？玄乎玄乎！有待诸公解谜。

2004年3月24日，北海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树

库林树

“库林树”，又名假芒果、库林木、华库林木，是一种稀有树木。该树位于南康圩镇东北6.4公里的大塘村委的“下担村”，生长于该村的东北方丘陵坡地上，离铁山港海边不远，与野生乔木和野生藤草杂生在一起。1980年为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梁盛业同志所发现，已编入《中国珍贵树木图谱》一书。“库林树”，多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前我国尚无纪录，隶属于卫矛科库林木属植物的种类，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发现不仅说明我国植物资源种类的丰富，而且使我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植物区系之间得到联系。

该树高约14米，主干树径约0.7米，枝繁叶茂，树皮黄褐色，种子黑褐色，叶长圆形，开花结果，花小呈淡白色，是一种常绿乔木。

该树已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我下乡考察时，据当地村民反映，在“下担村”东头近海边不远处，还有一棵稍小的“库林树”。“库林树”这种稀有树种，由于很少开花结果，正处于濒危状态，是物种的“孤儿”。保护好这两棵库林树，对研究我国的植物区系、植物生态学，都提供了一定的实物依据，有很大的科研价值。

天楠树

“天楠树”，属楝科木坚木属，又名“香港木坚木”。当地村民称之为“顶天楠”。该树位于合浦县公馆圩镇东北方的“六甘村”，在六甘村的客家土围城内。距公馆圩镇约有8公里。

该树高约30米，树主干胸围约须五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据说该树龄约有300年。其根、叶、皮均可入药，有清热解毒之功效。该树寄生有大叶榕、木菠萝树和杨桃树。大叶榕的几排条状气根，紧贴该树干两旁而钻进地下。在岭南地区，

该树在高大和树龄方面，或许能称作“天楠树”的“树王”了。

崩啷树

崩啷树，位于营盘圩镇西南 9.8 公里的白龙村委坪底村东南方的沙滩上，距坪底村约有 1.5 公里，当地村民称之为“崩啷树”，这种树很少见，当属稀有树种。2001 年 3 月，广西考古队一行考察铜鼓出土地点时发现。

该树高约 10 多米，树主干胸围约 3 米多，枝繁叶茂，有如一把雨伞独立在沙滩上。在该树周围，杂生有露兜筋、仙人掌等沙土植被。该树龄已超过百年。

见血封喉树

“见血封喉树”，又称箭毒树、弩箭王，属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及中南半岛一带。其树汁液有剧毒，是木本植物中较毒的一种。如有人或牲畜将其汁液误入口中或伤口中，将会丧命，故称“见血封喉树”。以前曾有猎人将其汁液涂在箭头上狩猎，中箭的动物便会很快毙命。这种“见血封喉树”对研究古植被、古生物都有参考价值。

北海市曾发现三棵“见血封喉树”，一棵在山口圩镇西南 7.9 公里的永安村，另两棵在福成圩镇东北 5.5 公里的卖兆村委的“村儿”村。

位于山口镇永安村的这棵“见血封喉树”，是 2002 年秋广西区博物馆有关人员到永安村，考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士阁时意外发现的。该树挺拔高耸，树干直径约 2.2 米，躯围约 7 米，高数十米。当地村民又称“孤独树”，树龄有数百年。由于该树很高，渔民出海作业，往往将其作为行船的航标。

“村儿”村的两棵“见血封喉树”，树龄约有 300 年。树高约 30 米，树主干直径约 2 米。两树相距不足 10 米。树长得高耸挺拔，少枝杈，树冠如伞，当地村民称之为“毒树”，但不知其毒性有多大。“毒树”几百年来与村民和睦相处，然而，从未发生过意外伤害。物种毁灭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物种的生命也是不可逆转的。保护好植物王国中珍稀的“见血封喉树”、“库林树”等物种“孤儿”与“独生子”，是尤为迫切的。